



# 小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四 2023.10

精英家庭的教育问题 | 田野中国

这个月要说的话不多 | 小鸟问答

我没有兴趣认识别人，但我开放了自己的家 | 接力访问

冰路狂花 | 新书





## 小 说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05 伊河两岸 吉利  
新书试读 | P.15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 本·勒纳  
P.21 洛杉矶河畔的故事 科尔姆·托宾  
P.27 光之领地 津岛佑子

## 非虚构

田野中国 | P.35 温水煮青蛙，是青蛙对温水的信任 | 邓小平的信徒⑤ /  
P.39 通往自由之路 | 邓小平的信徒⑥ /  
P.43 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家庭里 | 邓小平的信徒⑦ /  
P.49 一个精英家庭和它的教育问题① 伊险峰  
新书试读 | P.57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杨樱  
P.63 “雪豹的眼睛在山上看着我们，这就足够了” 彼得·马西森  
P.69 两个女人、一辆卡车，穿越 666 千米致命冰路 埃米·布彻  
P.79 一座纸上动植物园，走近诗意图怪的微观宇宙 艾米·里奇  
P.85 萨义德：一片土地，两个民族 蒂莫西·布伦南  
P.93 “她”的力量：鸟类“天后”和狐獴女族长的故事 露西·库克

## 专 栏

接力访问 | P.101 071 徐雅珺：既然我们都是有不同症状的人 /  
P.105 072 郭晓东：他不曾看到自己所期待的电影生态，于是自己做了一个 /  
P.111 073 羊羊：为土地、空气和水打官司，为人而坚持 杨樱



题图为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剧照

## 小鸟问答 Vol.33

### 小鸟 | 小鸟问答

十月是好季节。桂花很香，栾树很漂亮。

i

#### 24 小时文学聚会呢？

读者来信问，好久没看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连小鸟问答都不提它了，是散会了吗？当然没有。唯一的原因是没有好作品。不过，好消息是最近投稿数量在恢复。

九月刊发了一篇“小鸟文学地图”，是“24 小时文学聚会”的作者刘雨萌写的昆明城。我们挺喜欢。

ii

#### 一只锤子。

另一位打算永远爱我们的读者也很关心 24 小时文学聚会，TA 担心我们抛弃了虚构文学，手里捏一个锤子，成天想找那些我们看不惯的恶状丑行，试图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之，看起来很不健康。

TA 担心我们丧失了对文学的爱，还想知道是否可以把没通过的小说偷偷地发给 TA 看看，也许看了就明白为什么这栏目没更新了。

我们觉得关于锤子的提醒很有道理。引以为戒。在一个变态社会里做一个健康的人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不时提醒自己，你有没有一起变态。

回到投稿的问题，我们打算作如下回应：

第一，我们还是期盼有好作品。投稿数量的增加会提高好小说出现的概率。

第二，过去将近三年时间的前两年，我们感觉好小说源源不断而来。现在想来，可能因为过去有趣的小说、让人眼前一亮的小说缺少发布渠道，积攒了若干年的好作品。如今我们肉眼可见刊登小说的新渠道多了那么一些，报酬似乎也不错，就市场而言，大约是好事。作者永远可以感到安慰，只要写得好，就是紧俏的。

第三，我们确实对非虚构投入了很大的热情，看起来应该保持一个平衡。我们在规划 2024 年的内容的时候，会一并考虑进去。

iii

#### 关于永久会员

夏天的时候小鸟作过一些内容调整，为了平衡这个调整，我们把在付费期内的年费会员都变成了永久会员。有读者很惊恐，觉得是 App 出了问题，而且担心我们会不会因此倒闭。在此统一回复，别担心，就当朋友之间多个长线联系的方式吧。

iv

#### 关于“写得好”和近期“田野中国”的内容

有读者说，某某篇里某个人写得好，我问为什么。听下来，他说的好，是觉得里面一些观点和自己想的一样。以前也常有人说一本书、一篇文章好，因为“看见了自己”，或者，“是自己同意的观点”。

听多了，就觉得有点危险。

我们在 2020 年的时候与很多人聊天。其中一位革命向的左派年轻人说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生活的社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当你这么问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对这个“样子”是不满意的。他说确实如此。我们其实也是在问那些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也不满意。

后来，2021 年来了，2022 年来了，2022 年到了 4 月，5 月，11 月，12 月，2023 年来了。我们继续寻找答案。

“田野中国”的近期内容差不多是我们当时的了解和现在的思考。

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知道自己主张什么，很多人也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还能更有力地表达自己主张什么。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些立场和主张不尽然是一样的，有可能还是截然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看到什么东西觉得和自己类似，就是好，很不一样，就是不好，就会巩固所谓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互联网本来就是一个大回音室，因为摆脱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太容易了，而且算法还会“猜你喜欢”，久而久之，连摆脱都谈不上。立场太容易了，“站”与“粉”，代替了更复杂的思考。思考太难了。我们总是喜欢做更容易的事情。

一个朋友来聊天，提到那些爱举报的年轻人，毫无过渡，“这些姐”。说好几遍。一个理所当然的主语。朋友是个讲究人，用词如此，可见恨之入骨。

我们也不喜欢举报别人的人，不管出于怎样的目的。但是我们更希望知道，事已至此，接下来会怎样。仇恨不解决这个问题。回音室还会加剧仇恨。如果你仔细看看，你就知道真要深入了解什么人，放在如今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一切都让这个世界加速分裂，而不是趋于弥合。我们更多是在互相猜忌，而不是彼此理解。

这些都是危险的。

v

#### 一个故事。

博尔赫斯说是他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

这是一个要求被法律承认的人的故事。第一道门的看守对他说，里面还有好多道门，每个大厅都有一个看守把门，他们一个比一个强壮。那人就坐下来等。日子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那人就死了。临终时他问：“在我等待的岁月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进去，这可能吗？”看守回答他：“没有人想进去，因为这道门是只为你而存在的。现在我要关门了。”

看完之后，不知为什么感觉到巨大的孤独。想到最近看到多篇作家自我剖析，有理想高远者，有岁月静好者，都一样，你不知道那门只是为你单独而设，你还想着如何找到结伴而行或者抱团取暖的人，等着等着就是倏忽一世。

vi

#### 封面的鸟是伯劳。

如果需要联系我们，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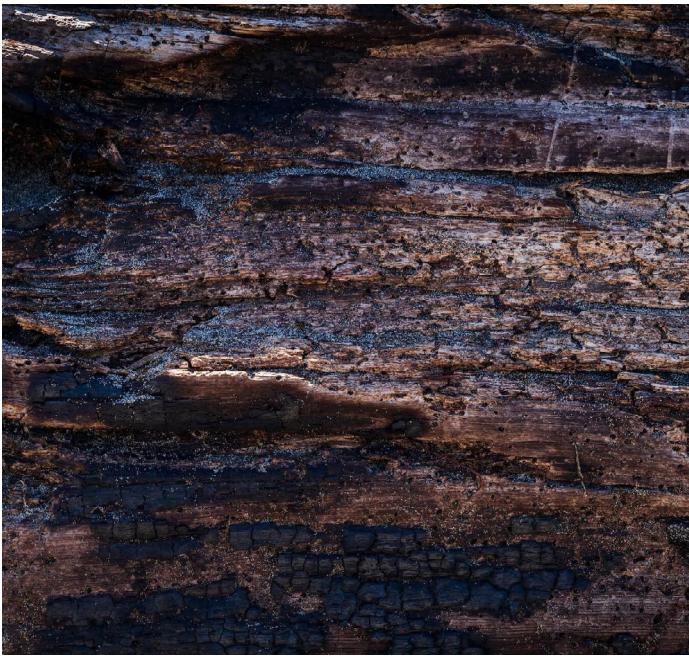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Kai Grader](#) on Unsplash

## 小说

# 伊河两岸

吉利 | 24 小时文学聚会

流经他们的河水就像一条沸腾的血管从东向西，  
从海沙尔流向黑子

海沙尔藏在葡萄架和墙面的缝隙里，顺着蓝墙一路摸下去，靠近大门的第三个防盗窗就是巴哈古丽的宿舍。她的窗口挂着一袋碎成渣的糖馓子和馕，窗台上那个沙色塑料水壶像一个金色的路标，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焕发出绚烂的彩色波纹。海沙尔想喊一声妈妈，话到嘴边却突然有些难为情。他往后撤了两步，把身子藏在葡萄架的阴影里轻轻喊了一声：“阿帕？”

七月正午的街道上没有一点人声，沿街富丽的院门都大敞着，英买里的居民都在自己的葡萄架下享受短暂午休时光。此时唯有房檐上各种鸟类叫得猖狂，但鸟声越是噪杂得可怕，海沙尔越是感到来自内心深处的平静。在鸟类陶醉的恰克恰中，海沙尔扯开嗓子喊了一声：“阿帕！”房檐上的茶会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声清脆地应答。巴哈古丽打开窗户，搜寻了一圈才看到蹲在窗沿下的海沙尔。

“妈妈。”海沙尔猛地站起身，肩膀重重撞在防盗窗上。

巴哈古丽把手伸出栏杆摸了摸儿子的肩膀，“怎么没睡觉。”

海沙尔额前的水珠在叶片投下的光斑里骄傲地宣示着自己的存在，他的卷发在腮边拧成一个一个坚硬的螺旋，手上还拎着湿透了的球鞋。巴哈古丽踮起脚拽了拽海沙尔身上沾满污渍的白色尼龙二条，问：“怎么还穿这件，为什么不洗一把？”

海沙尔惊讶地低头看了一眼，“刚在河边洗的，才干。”说着，他伸手去够窗口的塑料袋，“你今天晚上回家吗？”海沙尔像是在和那一袋馓子说话，他始终没有和巴哈古丽对视。

“主任还没通知。明天开学要用的东西准备好了吗？”还没等儿子回答，巴哈古丽又警觉地问道，“哪个河，伊犁河？”

“伊犁河舒服。”海沙尔敏捷地躲开了巴哈古丽迎面劈来的巴掌，他一下被妈妈逗笑了，海沙尔靠在葡萄架上笑着说：“晚上我想吃汤饭。”

金色的光斑在蓝墙上随风晃动，巷口漫步的哈迪克传来轻盈的铃声盖住了巴哈古丽的回答。海沙尔吹了声口哨，转身追着哈迪克往家跑。英买里的居民在穿巷而过的马蹄声中清醒过来，他们通过打扫门前的灰尘和把水泼在路沿来迎接夏日的午后。海沙尔沿街滴下的几滴水印无人在意，它们在日光的渐渐蜷缩，很快便沉默地蒸发在空气中了。

海沙尔现在时间很充足，他几乎没有什么课程紧张感。自从被爸爸转到双语班，很久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似乎都就此推翻了。没有假期作业，没有需要预习的篇目，没有英语补习班，毕竟他未来的同班同学需要补习的就是如何把汉语说好。暑假开始前吾斯曼带他和未来的班主任见了一面，班主任很和蔼地问了些琐碎的问题，然后就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孩子汉话好得很嘛。”那天班主任让他拿了几本教材，海沙尔回家路上就在翻看。全维语的教材读起来有种特别的感觉，此前海沙尔几乎没有读过全维语的书，日常生活中也接触得很少，一定要说，大概还是汉字写起来会更顺手，其实维语文字掌握得不熟练这件事，对于海沙尔这样从小在汉语班上学的民族学生来说是多数。但几乎作为两个极端的存在，比海沙尔大很多的哥哥从小就在民族学校读书，本来就对学习不上心的哥哥不仅汉话没学好，甚至汉字也不识几个，以至于现在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多不便。巴哈古丽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在大儿子上到初中的时候就尝试说服丈夫把孩子转到汉校，虽然这件事对吾斯曼来说不难，但他坚持民族学生就应该上民校。大儿子高考落榜后，吾斯曼发现即使自己想尽办法也不能给儿子安排到一份好工作，这才开始重新思考孩子上学的问题。海沙尔是家里第二个孩子，那时候还没有民汉合校，他从小就在汉校读书，小学四年级以后汉语能力就远远超过了全家人，他的汉话不仅说得没有一点口音且十分流畅，吾斯曼发现他有时候甚至很难反应过来自己在说汉话。吾斯曼对着小儿子摇头，他在古扎丽准备上小学的时候又重新思索了一番再次把女儿放进双语班去打母语基础，初中之后再上汉语班，然后跟随海沙尔的步调。

一开始吾斯曼和他商量调班这件事的时候，海沙尔是十分抗拒的。海沙尔觉得自己成绩也不差，为什么爸爸一定要让自己转去双语班。但吾斯曼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你现在维语都说不利索了。学了别人的语言，忘了自己的语言。”这话听在海沙尔耳朵里有些不舒服。“别人的语言”像个严肃的告诫，就像一些没有来由的奇怪训词，把自己和“他们”紧张地划分开。海沙尔把这句话作为自己转班的原因告诉黑子，黑子说：“你少给我搞民族分裂啊，小心我让我爹把你抓起来。”

海沙尔被逗得哈哈大笑，他一边笑一边用肘部去挟黑子的脖子把他往身后摔。黑子的爸爸是警察，公安家庭的孩子对这种隐晦语言下可能埋藏的信号总是过分的敏感。黑子拍拍身上的土，翻身起来正色说：“海沙，这话你可不能给别人说啊。”

黑子是海沙尔最好的朋友，班主任说他俩是连体婴，只要出现一个就不会少了另一个。他们看起来感情深厚，事实上认识才不过两年。此前海沙尔只是一直听妈妈说单位有个同事的儿子和自己年龄相仿，总想让两人认识一下，初三的暑假，两家人终于一起吃了顿饭。同龄人在大人的饭局上相见总是十分尴尬，两位母亲问东问西，从中考成绩讨论到分班问题。巴哈古丽说她联系了自己现在正在中学教书的同学，那边答应把海沙尔调去自己班里，同事也点头说自己也是专门找人打了招呼，两人再一对竟然是同一人。

阿姨扭头对儿子说，哎呦？你俩以后是同班同学了。

黑子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吃了半晌却突然抬头对海沙尔兴奋地说：“骚啊兄弟！”

正在喝水的海沙尔忍不住爆发出一阵开水壶般直冲云霄的笑声，他还是第一次见反应这么迟钝的人，那口白水再嗓子眼里打转，海沙尔笑得半天喘不上气。

那天两个人默契地填饱肚子后立刻表示要结伴出去，他们说要去一起去找朋友打球，实际刚出餐厅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把目的地定在了伊犁河边。

“别人的语言”像个严肃的告诫，就像一些没有来由的奇怪训词

八月炎夏恰是最适合成天游荡在伊犁河边的季节，这条河为本地人带来的精神慰藉远超过了它的现实意义。它初春从天山浩浩荡荡奔流而来，在坠入这片谷地时爆裂成无数交错的细流，像遍布河谷的毛细血管，流经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最终汇入心脏。伊犁河作为一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对这个塞外小城来说实在太大了，更何况它并非一位慈爱的母亲，每年春夏它带走的孩子和羊群数不胜数，也因此成为了这个小城里所有母亲共同的敌人。

河水两岸布满了低矮的植被昭示着这片难得丰饶的沃土，这些奇异的灌木类植物枝叶稀疏、长相畸形，它们紧紧抓住河床的边缘，挤在一起成片生长，一副脆弱而惊恐的样子。这条河跋涉而来非但没有给予这里以上游高山草原富饶的财富，它在流经伊宁市的时候

还为这片平坦的土地开凿了一片布满岩石的河滩，做完这一切后它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敞开胸怀裸露在伊宁市区，彻底截断了南北两岸。

午后三点左右的伊犁河和所有本地人一样暂时陷入了金色的梦境，河水呈现出一片宁静的木绿，日光飘落在河面上静默地顺流而去。黑子跟在海沙尔身后从老桥北岸的公路上翻下来，他们找了一块相对平整的河滩，脱去上衣和裤子滑进水里，老桥上方的天色在明暗之间缓慢的交替，但只要潜入河心再探出水面，那些难以消磨的时间都会被疾驰的河水飞速卷去。当海沙尔和黑子再次浮出水面，老桥上的太阳就像一颗剔透的玛瑙泛着忧郁的红光。伊犁河的表面镶嵌着无数闪烁的红宝石，海沙尔和黑子被淹没在一片血色的火焰里。流经他们的河水就像一条沸腾的血管从东向西，从海沙尔流向黑子，他们的友谊以这条奔腾的伊犁河为纽带，以两岸畸形的次生林为背景，在这片河滩上生根发芽，这段跨越了血缘的友谊在河水的浇灌下生长成了一条坚韧的藤蔓，是跨越两岸不可撼动的桥梁。

那天下午海沙尔和黑子在老桥以北挥手告别。海沙尔往南走，他住在伊犁河南岸，那里被称为新区，人流稀少，安静而空旷，拥有大片的湿地和果园，道路两旁种满了白杨。海沙尔每天乘车跨过二桥到北岸的市区上学，伊犁河对他来说是近邻，是血亲，他的对万物的问候都通过这条河水传达。黑子往北走，他住在伊犁河北岸，是繁华的中心地带，那里住宅密集，集市繁华，歌舞不歇，手鼓长鸣盖过了远处河水的咆哮，伊犁河对他来说只是永不干涸的湿地公园。

回家后他们两都从各自母亲的口中得知，今天的见面不只是简单的同事之间的饭局，而且是一场没有血缘的亲人之间的会面。这是一场带有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特色活动的展开，这个名叫“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主题活动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这片神奇而颓圮的土地带来浪漫的温情与喜剧色彩。两个家庭在这场宣传扩泛至全疆的轰轰烈烈的“民汉结对子”活动中被神奇地链接在一起，成为了跨越民族与血缘的亲人。

## 二

海沙尔一直在家等到八点半才忍不住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巴哈古丽还是中午见面时说的那句话：“主任还没通知。”

“主任没通知可以回家，就得在社区待着，”巴哈古丽说，“你给妹妹弄点饭吃。”

海沙尔可以想象到妈妈在电话那边穿着迷彩服、带着头盔的样子。海沙尔觉得奇怪，派她们坐办公室搞文书工作的人去小区门口当保安是什么。他也知道这些不该问他，于是答应了几声就挂了电话，海沙尔把早饭剩下的奶茶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灶上，然后跑去巷子口买了两个馕，又打了一公斤牛奶。他回到院子把牛奶往杏树一挂，就扯开嗓子喊古扎丽出来吃饭。连着叫了几声都没人答应，心想妹妹是不是睡着了，于是推门进了里屋。

海沙尔刚推开门就听见古扎丽正在朗读课文，课文讲的是他从未听过的少数民族英雄的故事。古扎丽声音洪亮，情绪激动，一字一句都和着窗外的虫鸣一起撞击着海沙尔太阳穴。故事的最后七个维吾尔族女英雄最后被汉族士兵逼上悬崖英勇就义，古扎丽把书一合，抬头望着哥哥，似乎是早就知道海沙尔站在身后，正在安静地等待他做出评价。然而此时海沙尔还未回过神来，他的脑袋依旧突突地跳，那几个维吾尔族女英雄的名字缠绕在心头，他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海沙尔把妹妹的课本拿起来，画像中七个面容姣好的女英雄眼神坚毅而哀伤。日光在室内收缩，两人很快被笼罩在一片压抑的蓝色里。海沙尔问，你们课上怎么讲的？古扎丽摇头说，今天是预习，海沙尔把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这样悲伤的故事有很多，海沙尔看得心情沉重，他把书放下，拍了拍妹妹的肩膀说，走吧，洗手吃饭。

话音未落，只听屋外铁门嘎吱响了一下，有人在院子里喊，奶茶要烧干了！

古扎丽尖叫着跑出去，吾斯曼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院子里，他弯腰把女儿抱起来，又对海沙尔笑了笑，展开了另一条胳膊。

吾斯曼去南疆出差有一个多月了，这次带回了一皮箱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古扎丽分到了玛瑙手串，海沙尔分到了一只猫头鹰木雕。木雕不大，但猫头鹰身上的每一片羽毛都雕刻得栩栩如生，拿在手里很有分量。海沙尔把它摆在卡塔的小桌子上，看着猫头鹰两只油亮的眼睛映着院里的光。吾斯曼说：“咱们出去吃烧烤，你妈说她也能出来吃个晚饭。”古扎丽挥舞着胳膊从卡塔上跳下来，木雕应声而倒，底座一下暴露在海沙尔面前。海沙尔仔细看去，木雕的底座贴了一个绿色的标签，写着“清真”二字。海沙尔疑惑起来，心想这难道是能吃的？他拿着木雕对吾斯曼说：“爸爸，这咋是清真的？”

吾斯曼在水管边洗脸，他看都没看一眼，说：“清真好啊。就是要买清真的。”说着他起

身朝儿子走去，用湿漉漉的手在海沙尔脸上抹了一把，说，“出门。”海沙尔咯咯地笑起来，他从卡塔上跳下来的时候犹豫了一下，重新拿起木雕把它塞进口袋里。

英买里的傍晚交织着浓郁的果香与刺鼻的香料味，融化在浓烟里的孜然和辣椒粉宣告着伊宁市夏日夜曲的奏响。整个英买里像一锅熬开的杏子酱，散发出灼热而诱人的香气，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不能自己地陷入这片甜蜜的金色沼泽。

那几个维吾尔族女英雄的名字缠绕在心头，他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

他们常去的烧烤摊就在巷子口，店主把烧烤摊开在了自家院子里，白天葡萄架下摆着卡塔，到了傍晚他们把卡塔一撤，换上塑料桌椅和烤炉迎接伊犁河两岸寻着香味摸来的客人。尽管现在不过九点左右，院子里已经坐着很多人了。几个人踏进院子的大门，海沙尔就一眼看到了妈妈。他把位置指给古扎丽，然后对吾斯曼说，我去打两杯卡瓦斯。吾斯曼点头，侧着身子带女儿从桌椅的夹缝间朝巴哈古丽挤过去。巴哈古丽还穿着迷彩服，像是出来巡逻的样子。她看到吾斯曼第一句话就是，“今年不会再把你派出去了吧。”

吾斯曼摇头，“这说不好，上级命令。”说着他从巴哈古丽手中接过烧烤单上下看了看，“我去前面点，这单子上没啥吃头。”他刚准备起身就听见了一个男孩的惊呼，一转头便看见儿子正高高举着两杯卡瓦斯，海沙尔旁边那个大个子男孩握着海沙尔的肩膀说：“哇耶——吓死个人！”

海沙尔说：“我碰见黑子了。”

黑子说：“我爸妈在那。”他侧开身子超两桌外指过去，黑子的妈妈正笑着向巴哈古丽招手，她也穿着迷彩服。

巴哈古丽笑着说：“我和你妈刚还在宿舍里聊天，这会儿又在这碰面了。”

吾斯曼拍拍黑子的后脑勺，换了个方向朝黑子一家的方向挤过去，黑子的爸爸也笑着站起来和吾斯曼握手，两个许久未见的好友商量着怎么在这么拥挤的环境下把两个塑料桌椅拼在一起。

烧烤吃得尽兴，吾斯曼问黑子的爸爸，“你们局里怎么样。”这个指意不明的句子却让黑子爸爸会意一笑，“还是那些事。”他说，“你看看她们就知道了。”吾斯曼摇头，说：“怪得很。”他又对巴哈古丽说：“你们领导咋通知的。”

巴哈古丽说：“轮着下访惠聚，一人一年说的呢。”她顿了一下，“一天一个样。”

两盘烤肉撤下去又上了两盘肝子，海沙尔吃得半饱，从兜里掏纸被连带着把猫头鹰木雕摸了出来，黑子凑过去看了一眼，说：“好看，拿来。”于是伸手去抢木雕，他翻转了一下便看见了底部的标签，还没来得及仔细辨认，海沙尔就夺了回去。他迅速在木雕的底座抠了一把，又将木雕重新塞回黑子手里。

“送你了。”他飞快地说。

“真的假的。”黑子把木雕举起来对着葡萄架上微弱的灯光看，猫头鹰羽翼轻盈而饱满，似乎随时都会飞进黑夜中去，黑子蜷起掌心，学了两声猫头鹰的叫声，然后兴奋地说：“那我真拿走了。”海沙尔拿起一串肝子朝黑子点头，他的左手正悄悄攀上自己胸前的校牌，把那个秘密的标签用拇指抚平贴在校牌背面。

夏日傍晚的终曲将在日光与灯光最后的角逐中奏响，音乐一响起大家立刻兴奋起来。人们先是随着音乐缓缓地扭动脖子，接着就耸动着肩膀从座位上站起来。音乐像漂浮在蓝色傍晚的丝绸轻轻攀附上院子里所有人的手腕与脚踝，缠绕着人们的脖颈和腰肢，人们随着手鼓和琴弦颤动的声音在拥挤的桌椅间有节奏地踏着脚步寻找自己的舞伴。巴哈古丽忍不住放下手中的烤肉，她笑着去拉吾斯曼的手，海沙尔也立刻吹了声大胆地口哨向爸爸示意，然而吾斯曼的表情却变得烦躁起来，他说，吃东西的呢。巴哈古丽的脸色一下沉了下去。海沙尔惊讶地挑了挑眉和黑子对视了一眼，然后挤开凳子站起了身，他对巴哈古丽说，“咱们去跳。”说着，海沙尔把两只手插在腰间开始耸动自己的肩膀，他放弯了膝盖回身向巴哈古丽倒仰过去，视线越过肩膀对着母亲做出一个滑稽的鬼脸。

那天晚上是吾斯曼在整个夏季最后一次出现，海沙尔对那天爸爸回家后的记忆几乎仅到烧烤结束为止，后面的吾斯曼只让他感到陌生。他在回家路上对巴哈古丽说：“不能跳舞，这都是经里写的，我才听来的，我都是为你们好。”听完这句话，和妹妹走在前面的海沙尔回头对吾斯曼投以困惑的目光，然而吾斯曼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只是冷漠地再次告诫道：“你们也一样。”

那天之后他只听妈妈说吾斯曼很忙，忙到无暇回家。可进入双语班的第一周他有很多话想对吾斯曼说，比如他还是无法习惯班里上课的环境，无法习惯新的课程内容，也无法融入身边的同学。班里唯一能说上话的依米然却是从小就和他结了梁子的“仇人”，他的

爸爸作为吾斯曼的同事却也与他们一家并不交好。双语班在四楼，可他现在有时候还是迷迷糊糊地往三楼的老教室走，黑子在班里起哄，他说，海沙尔回来喽！海沙尔总会被逗笑，他通常会在班里和老同学寒暄一会儿再默默地回到四楼的双语班去。

三楼四楼之间隔断的那层水泥地让海沙尔感到难过，踏在脚下的地砖始终提醒着他，自己已经被强行阻断那一个熟悉的世界之外了，他在听汉语课的时候总会走神，课上讲的都是一些对他来说已经简单到不必被拎出来再学的东西。这时候海沙尔会悄悄把头埋起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一睁眼就会坐在以前的老教室里，黑子用圆珠笔捅他的脊背，问他：“哎这个单词怎么读的。”他尝试了无数遍，这件事当然不可能发生，却是有一连串猫头鹰的叫声总会在他的耳边响起，又孤独又哀伤，他一睁眼，那声音却又消失了。

### 三

随着夏日的终结，海沙尔已经习惯了和妹妹单独在家的日子。

不出所料，吾斯曼很少打电话回来，他几乎失去了父亲的消息，而访惠聚也没有一天放巴哈古丽回来，每晚八点后的等待经过了整个夏日的检验已经成为了不必存在的环节。倒是黑子和他爸爸来频繁，邻居都知道海沙尔和他妹妹这段时间都是“亲戚”照顾着。黑子的爸爸总是穿着制服，肩上的星花闪闪发光。他常带来一些米油和一袋一袋包装好的牛羊肉，帮海沙尔拎进茶棚或者放进冰柜里。他沉默寡言，黑子和海沙尔谈天说地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抽烟，最后在出门时轻轻拍一拍海沙尔的肩膀。

海沙尔总是和妈妈每天早晨在社区门口匆匆见一面，他为了路过英买里社区而绕过苹果园，那条小路边上的白杨长得忘我，笔直地往天上长，不肯投下一点荫影，今天他远远就在看见妈妈站在路口，海沙尔忍不住咬着嘴唇笑起来，快步跑过去，还没站定，只听巴哈古丽说：“你爸晚上回来。”海沙尔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眯了眯眼睛问，“撒？”

踏在脚下的地砖始终提醒着他，自己已经被强行阻断那一个熟悉的世界之外了

“你爸晚上回来，你放学和黑子一起，你爸去接你们，两家吃个饭。他爸爸今天也调休。”巴哈古丽笑着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她说：“是不是该剪发了？自觉点，别让学校给我打电话。”

海沙尔一边点头一边焦急地问：“你们可以出来吃饭吗？”

巴哈古丽敲着儿子的额头说：“我们两家亲戚，吃饭是任务。”

海沙尔站在原地傻笑，巴哈古丽在儿子背后拍了一下，说：“不怕迟到嘛。”

海沙尔于是一边笑着朝巴哈古丽挥手，一边往公交车站跑。他突然觉得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舒服，英买里的鸟鸣声简直比得上一曲节日的麦西来普，他把右手握成拳贴在嘴唇上，眯着眼睛在指缝里吮吸出一声响亮的口哨。

海沙尔一个早晨头也没抬，他凭借自己的猜测完成了大部分作业。但依米然此时把桌子敲得笃笃响，“别学了哎，找你的人门口等的呢，汉语班的。”海沙尔抬头看见那人正在教室门口朝他招手。

黑子靠在门框上，斜着眼睛问：“中午去哪吃？”海沙尔被问得一愣，反问：“你不回家吃饭吗？”“来不及了，今天没人接我。”

“你爸不是今天调休吗？”海沙尔疑惑道，“我妈说咱们不是晚上还要一起吃饭吗？”“不知道能不能吃得成，我爸执行任务去了。”黑子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抓人。”黑子的爸爸临时去执行任务倒是很常见的事，海沙尔点头，“好。”他说，“我吃炒米粉。”黑子把手插进口袋说了声“霍西”，转身下了楼。

点炒米粉是门学问，带着点不言自明的比赛在里头。两个人咽了咽唾沫都点了爆辣，吃得头上的汗珠一粒一粒往外冒。

“你多久没见你爸了？”海沙尔问。

“一个多月吧。中间我去了他们单位一次。”

“我也是。”他觉得炒米粉怎么这么呛，海沙尔吸了吸鼻子，“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的呢。”

黑子停下了咀嚼，他把剩下的半块馕拌进米粉里，说：“我爸就抓坏蛋呗。”

“抓哪种坏蛋？”海沙尔忍不住笑起来。

“哎就是……呢种……啧，极端势力。”黑子犹犹豫豫把这几个字吐出来，他说得心惊胆战，“唉你不知道，他妈的现在一块桌布都要分清真不清真，搞这种分裂。”黑子艰难地咀嚼着嘴里的那一块馕，“真是牲口玩意儿。”他起身走到冰柜前取出一听奶啤，咕嘟咕嘟灌了下去随之发出一声豪放的满足声。“而且，你知道吧。我妈你妈为啥不能回家，天天穿个迷彩服做值班室里。”黑子捏扁了罐子，扔在垃圾桶里。

“你看着吧，外松内紧，所有单位都派人下去了。”他说，“暗流涌动。”

这话被他说出来也不奇怪，海沙尔抬头看了黑子一眼，没有接话。他挑了挑眉毛，低头挑着碗里的酸菜。黑子看起来吃得很饱，此时已经开始走神了，然而他刚才说的话却在海沙尔的脑子里来回播放，海沙尔把校牌翻过来，那个带着复杂花纹的绿色标签像一道屏障，严肃地把他圈在一个黑子无法理解更无法踏入的狭小的空间里。“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海沙尔在心里这样想。他把校牌翻回去，那个绿色的标签重新隐匿在海沙尔校服的缝隙里。

短暂的午休时光如果排除了午睡时间就显得格外漫长，他们去学校的地下街买了酸奶和烤肠，慢悠悠晃到教学楼，两人在三楼碰了碰拳，海沙尔独自上了四楼。然而他还没进班就被拦住了，依米然的脸上挂着一种让人不适的同情，“你爸咋啦？”他小声问。海沙尔侧了侧脸，眯起眼睛表示困惑。

“哎你也别难过，应该没啥事。”依米然扬了扬下巴说。

海沙尔莫名被劝了一顿，搞得一头雾水，他嘴角尴尬地抽搐了一下，说“依米然，你没病吧。”

这下反倒是依米然一脸不可思议，他说：“你爸的事你不知道？算了，你回家就知道了。”“傻逼。”海沙尔骂了一声。

海沙尔攥着手中酸奶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他觉得此刻自己浑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像在冰水里泡过一样冰冷异常。他沉着地把酸奶放在桌洞里，然后伏在桌面上午休。三十多度的夏日午后怎么这么冷，冻得海沙尔牙齿都在打颤。“我爸爸有什么事。”他心想，“他在政府上班，南疆北疆两地跑，半年回不了几次家，他能有什么事。”海沙尔站起身，把敞着的窗户用力拍上，“你爸才有事，傻逼。”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主题班会，内容依旧是“民族团结一家亲”。开学三周，这个主题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海沙尔觉得这一下午筋疲力尽，此时正昏昏欲睡。班主任在敲黑板，她说，海沙尔，我们在讲什么。海沙尔慌乱站起来，眯着眼睛辨别屏幕上的内容。他正欲开口，只听依米然在后排低声说：“他爸就是两面人。”

海沙尔的脑子嗡嗡响了两下，他还来不及对这句恶毒的污蔑做出任何反应就听见了猫头鹰的叫声。那声音低沉而绵长，像都塔尔最粗的琴弦弹拨了几下，是不详的预感突然降临的悲伤。老师对此一无所知，在一片沉默中，她担忧地观察着海沙尔苍白的脸。“行了，”她说，“海沙尔你坐下吧。”海沙尔梦游似地坐下，此时他的心思全在那沙哑的叫声上。他把头扭向窗外四处搜寻，目光扫过楼前的一排失落的白桦林，越过远处烟雾缭绕的巴扎，眺望游荡在科古尔琴山上醉醺醺的牛羊，直到雪山在夕阳下散发出五彩的光，他才渐渐屏蔽了耳内猫头鹰的不肯停歇的哭泣。

放学后海沙尔在南岸下车却并没有打算回家，他在黄昏的伊犁河南岸下水，又在傍晚从火红的伊犁河再次游回南岸，老桥下的河水看起来这么窄，北岸那么平坦，可偏偏怎么也游不过去。在夕阳与暮色的角逐之际，海沙尔拎着湿透了的球鞋往家走，刚到的巷口就看到自己家的灯光一直亮到了三楼。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家里的灯这样亮了，直觉告诉他这是妈妈回来了，海沙尔积攒一个下午的紧张感在这一瞬间得到了彻底的缓解。他把球鞋藏在墙外的桑树后面，悄悄地去推院子的门。刚靠近院子，他就听见了巴哈古丽的哭声，像河水中心突然吸上脚腕的暗河，海沙尔耳边的猫头鹰叫声又再次响起来。他强压住恐惧带来的恶心感，轻轻推开门，巴哈古丽背对着大门靠在老杏树上，妈妈穿了一身正装，左手拎着手包，右手把手机蜷在怀里，弯着腰呜呜地哭。海沙尔叫了一声妈妈，对方没有回应。他又走上前去，喊了一声：“阿帕。”巴哈古丽这才缓缓停下了哭泣转过身来，她肿着眼睛，沙哑地对说出了一句海沙尔其实已经在自己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的对话。

那个带着复杂花纹的绿色标签像一道屏障，严肃地把他圈在一个黑子无法理解更无法踏入的狭小的空间里

巴哈古丽说：“走吧，陪妈妈去一趟公安局。”

海沙尔惊讶于自己的反应比想象中的平静，他问：“古扎丽呢？”

坐在出租车上，巴哈古丽的情绪似乎已经渐渐平静下来。古扎丽对家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巴哈古丽在接到这边通知的同时就联系了女儿的班主任，让她转告古扎丽放学以后去奶奶家。出租车开上二桥，海沙尔看着窗外沉醉在一片橘色的夜空下的伊犁河，一阵从未有过的陌生感席卷而来。河水从桥下穿过，带着含混不清的劝诫，带着喃喃不息的祈祷，飞驰而下。

公安局门口有一名警察在等着，看到母子两人就打了个招呼走过去问候了两句，然后把他们引至楼内一间办公室。巴哈古丽推开门，室内站着几个警察，神情严肃，看到巴哈

古丽和海沙尔后很礼貌地又拿来一把椅子让两人坐下,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位温和的女警,她递上来几张文件,对巴哈古丽说:“电话里已经基本告知基本情况了,具体情况目前还在侦查期,您先看一下这些文件,然后签字。”她从笔筒里抽出来一只圆珠笔递过去,“这是笔。”说着,她抬头看了一眼海沙尔,“这是您的儿子吗?”她微笑着说,“一会儿可能还要说明一些事情,需不需要让他在外面坐一会儿?”

巴哈古丽回头看了海沙尔一眼,眼里充满了犹豫。海沙尔读懂了母亲的疑虑,他立刻站起身说:“我想出去等。”他自以为自己情绪调整得很平静,但实际上话说出口的时候舌头还是被冻住了一样磕了三下,海沙尔弯腰去搬自己身下的椅子,以此用最快的速度瞥了一眼巴哈古丽面前的文件,密密麻麻的印刷体他只看清“极端”两个大字,这两个字像一声巨雷在海沙尔脑内炸响,他一瞬间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理解这两个字的意思,却突然感到鼻子一酸,眼泪像抛了光面在眼眶里打滑。他把椅子搬起来往墙边一靠,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保持平衡走出去。

现在海沙尔只能尴尬地站在公安局院子里,他四下张望了一会儿,远远看见有两个警察正站在花坛前抽烟。其中一个转过身来,吓得海沙尔正准备把眼睛挪开,却看到那警察朝他招了招手,借着傍晚微蓝的光,海沙尔认出那是黑子的爸爸。

他低头小跑过去,“叔叔好。”海沙尔尽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正常。黑子的爸爸掐了烟,对着黑子点了点头。

黯淡的暮色里,海沙尔看不清他的表情。黑子爸爸没有说话,海沙尔也不敢再抬头看他。他暗暗在胸口蓄着一口气,安静地等待着任何一句可能将他击垮的带着告诫的安慰。夜色流动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里逐渐蔓延开,就在海沙尔忍不住开口的时候,黑子的爸爸突然沉默地把右手搭在海沙尔肩上,轻轻拍了拍。

这一举动让海沙尔感到惊异而茫然,肩头传来的重量使在他一瞬间想起了潜入伊犁河时透过浑浊的河水看河面上浮动的灯光时的脱离感。这是他第一次清晰地看见心里压抑着的那层朦胧的浊雾,那些从土耳其带回来的发光的银饰、猫头鹰木雕、古扎丽课本上悲怆的故事此刻被浓雾裹挟着在海沙尔的思绪里汹涌的翻滚。这些他早已觉察的不安与困惑,在这一瞬间彻底铺陈在自己面前。海沙尔感到腹部一阵剧痛,剧烈的呕吐感直至喉头。他一张嘴,却惊讶地发现猫头鹰的叫声从自己的喉咙里断断续续传出来,咕—咕—,是粘黏着浑浊痰液的沙哑哭声,像最常见的夜鸦的啜泣。

他听见黑子的爸爸说,我和你爸爸是很好的朋友。

公安局对面是人民广场,晚饭后的闲暇,广场上人声嘈杂,歌舞喧嚣,口哨声、手鼓声、热切的乐曲声,欢愉而哀伤。人们缓慢地从不同方向挥舞手臂,踏着碎步聚集起来,缓慢地转动手腕,踏起脚跟,咚哒—咚哒—咚哒,他们随着节奏打响的指节和扭动的肩膀,用刺耳的长调和轻快的呼喊声回应着和谐而安宁的塞外之夜。

#### 四

伊犁的秋季比夏季路得更加仓促。院子里的葡萄没有人吃,全部原封不动地挂在架上风干成一个个干瘪的尸体。英买里街道两旁的鲜花和爬山虎一夜之间全都蜷缩起来,四处都是坠落的花蒂和藤类的触角。当傍晚巷口也不再传来乐曲声和口哨声,海沙尔知道伊宁的秋天也过去了。

他以为自己会适应这样的生活,他早晨上学的时候依然会绕过果园去蓝墙下和妈妈打招呼,放学后便徘徊在伊犁河边,一次一次从南岸入水潜入河心。如果可以,海沙尔希望不用回家。奶奶爷爷的陪伴似乎让家里的气氛更加压抑。奶奶的眼泪却像流不完似的。她坐在茶棚里哭、伏在馕坑沿上哭、靠在老杏树上哭、对着茶具架上的瓷碗哭,爷爷也不肯出门,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仅剩每天早晨拦住打牛奶的三轮车,对别人竖起两个手指说“两公斤奶子嘛,打给我哎。”社区的人几乎每天都会来慰问老人,她们通常握着老人家的手说些安慰的话,偶尔进屋检查一圈。她们昨天刚刚带走海沙尔窗台上的一个花盆底座,那个方形的银盘,繁复美丽的花纹环绕着中心那个圆顶的精巧建筑,是吾斯曼从土耳其带回来的。海沙尔匍匐的门缝里看着她们把银盘踩在脚下折断后叠了起来,扔在路边的垃圾车上。等社区的人走远,海沙尔便出门去看那个垃圾车里的银盘,它蜷缩在高高堆起的垃圾上一闪一闪呼唤了海沙尔一会儿,便很快就陷在了黑色的渣滓中了。

古扎丽的课本突然被学校统一收走,海沙尔从黑子的口中听到了教材问题的模糊传言。商场内随处可见的标语除了民族团结外还多了一些譬如杜绝吉里巴甫服饰,警惕三股势力的警示。海沙尔凑上前看,图片中的女人带着头巾裹着黑袍,只露出了眼睛,让人害怕,“为什么不穿艾德莱斯呢?”海沙尔觉得困惑。

马路两旁的警亭多了起来,停在路边的打闪的警车常吸引得他连续错过几次红灯。他能感觉到这座城市里的人都在警惕着从那条边界线以西吹来的一块黑色的幕布,那些暗暗渗透进砖瓦缝隙的可怕“律条”已经吞噬了一些本来活泼而浪漫的人。海沙尔能看见所有人都在伸出手尽力将这座小城环抱在胸口,但每当海沙尔想伸出手时就想起吾斯曼,于是伸出的手又失落地放下。

他一张嘴,却惊讶地发现猫头鹰的叫声从自己的喉咙里断断续续传出来

黑子从前口中总是说形势紧张,如今却不说,他有时候还是会焦虑地提起他爸爸今天又在执行任务,但说完之后就仿佛犯了错事似的沉默。海沙尔知道黑子所回避的东西,他知道吾斯曼是一大早开会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下从会议大厅里直接带走的。他猜测黑子口中他爸爸当天执行的“任务”,十有八九就是这个任务。他很多次想开口告诉黑子自己并不在意这些,但话题比他预想的沉重,他也开不了口。

吾斯曼的事情发酵后市委的整栋大楼都提起来二十倍的精神来自我筛查。海沙尔知道依米然的爸爸是组织部的,出了这件事没少被问责,估计也是常常忙到回不了家。他也预料到依米然和他的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但当依米然真的指着他的鼻子叫他“恐怖分子”的时候,已经模拟过无数次压制自己情绪的方式被彻底冲垮,海沙尔的胸口猛然起的火一直烧到了喉咙里。

依米然说:“要不是他,我爸也不会回不了家。”他说,“要不是这种人,什么都会比现在好得多。”那时候海沙尔正被班主任安排去走廊里贴新的标语,依米然就站在他背后对身边的人说。

“他爸搞分裂的。”依米然在撂下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被海沙尔拦住。“说清楚。”海沙尔死盯着依米然的眼睛,“我爸没有。”

依米然愣了一下,这是吾斯曼出事后海沙尔第一次和他说话。他晃了晃脑袋,问:“那你爸怎么被抓了?”

“他是,”海沙尔正打算说他爸爸只是受到了那些不好的东西煽动时,突然想起吾斯曼在很早以前就常说“经里说”,他发觉这件事早已显露了征兆,那些诡异的经训早已不知不觉根植在其中。

“他是……”

依米然甩开海沙尔的胳膊顺势推了他一把,“你们一家都是恐怖分子。”说完径直从海沙尔身边绕了过去。这句话比伊犁河心猛然拍来的浪还让海沙尔感到惊慌,他鼻头发酸,愤怒和恐惧叠在心口,海沙尔强忍着喉头的收缩感,生怕嗓子里会再次传来猫头鹰的夜啼。然而在大脑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冲上去从背后用手肘挟住了依米然的脖子用力往地面拉过去。两人扭打在一起的时候,黑子正走到楼梯口。

楼道里围满了学生,却没有人上前劝和,两个人的力气比想象的更大,黑子用尽全力拉开两人,他按住海沙尔的肩膀说:“我操再别打了。”海沙尔双眼通红,他说,依米然你信不信我杀了你。依米然说,然后进去陪你爸是吧。黑子说,你他妈谁啊,你也闭嘴会不会。依米然说,装吧你就,你爸就是抓人的。

那个本在两人共同努力下正在愈合的伤口突然被这个陌生人再次撕裂,黑子的脸上第一次泛出恐怖的青色,他说:“你再说一遍?”

依米然说:“你爸就是抓人的!”

他话音未落,只觉得眼前突然天旋地转,猛烈的撞击还未转化为痛感,脸上便陡然绽放出一朵血色的花。在海沙尔错愕的注视下,那片殷红安静地顺着依米然的唇角淌下去,在下巴上凝成了一道黑色的斜线。

四楼所有的学生都围观了这一场打斗,直到上课铃敲响老师们从办公室走出来后才裁决了黑子的“胜利”,汉语班的学生和双语班的学生打架,没人敢当作一般性质的争执处理,他们被带到机房一帧一帧看录像,分析是谁先动手,直到三个人互相道歉后,黑子才着急地说,老师我还没吃饭,晚上还有晚自习。年级组长头也没抬,他说,别学了,回家吧今天,上什么晚自习。

两个人走在校园里,觉得昏黄的夕阳都在躲着自己。黑子说:“太早了,这时候回家肯定会被问。”

他跟着海沙尔上了公交车,穿过二桥一直抵达伊犁河南岸。

初冬伊犁河边的次生林已脱尽颜色,呈现出一片萧索的枯黄。那些干瘦的林带,伸出自已可怜的枝干试图挽留飞奔的伊犁河。两个人在河岸褪去衣服便立刻与荒黄的芦苇融为一体,芦苇丛呆滞地围观着他们不断潜入河底又浮上水面。黑子说,这么窄的河道,我可

以直接游到北岸去。海沙尔说，下面有暗河，游不过去的。话还没说完，黑子便不见了踪影，海沙尔慌了神，他大喊了两声黑子的名字，又潜下水寻找。只听水面上突然响起一串响亮的笑声，海沙尔忙浮上水面，只见黑子赤脚踩在北岸的草坪上，“我就说吧！”黑子大喊。

黑子能感觉到海沙尔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于是他说：“你也可以，小心一点。”

海沙尔再次潜入水中，但一切还是和他预想的一样，当脚下的暗河像一个巨大的吸盘攀上他的小腿时，他就不得不挣扎着浮起来。

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游过这条河了。在伊犁河两岸，每一只长居于此的野禽都知道这个男孩每天下午都在尝试游到对岸去。然而河水依旧不动声色，它在这个温柔的黄昏里还是面色铁青地以河心为轴立起一道无形的屏障。那里水流湍急，漩涡暗涌，把海沙尔隔在这边。

“下午你为什么突然到四楼来。”海沙尔抹了一把脸。

“哦对了。”黑子说，“你翻我书包第一层。”

海沙尔疑惑的向岸边游去，他甩甩胳膊上的水，拉开了黑子的书包。暗袋里躺着的猫头鹰木雕，眼睛映着漫天橙红的光。

“这个猫头鹰有时候会叫，”黑子在河那边喊，“今天下午也在那咕咕咕，哭了一样。”他说，“想拿给你看。”

海沙尔听完，愣愣地看着手中的木雕，在他的注视下，一粒金色的水珠顺着他的鼻梁落在猫头鹰的羽毛上，像一滩灼热的黄金在羽毛间蔓延开。在河水整耳欲聋的咆哮声里，猫头鹰的叫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海沙尔揉揉眼睛，从校服上摸起自己的校牌。他把校牌翻了一面，那个绿色的标签边沿已经脱了胶朝里卷曲起来，海沙尔一点一点把它抠下，粘成一团扔到了河里。

他站起身说：“我要游过去了。”

他声音不大，对岸的黑子也立刻站起来拢着耳朵喊：“你说撒？”

海沙尔像鸟类伸展翅膀一样用胳膊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直到两臂和不远处的伊犁河大桥平行才缓缓停下。日光在他身后忽明忽暗，飘落的夕阳像撒在他肩头的金粉。在北岸的视角里，海沙尔与河岸上的影子融为一体，看起来有三米多高，像一只准备飞翔的鸟。在混乱的马蹄和汽车的鸣笛声中，海沙尔环住自己的肩膀，纵身一跳，像往常一样，连水声都没有留下。黑子折断身边的芦苇，坐在河坝上等待着海沙尔拨开河水游向伊河北岸。月亮的轮廓投影下来，直到最后的日光也融化晚霞里，伊犁河上的浮光像迁徙的鱼群极速向河流的尽头游去，每一只金色的大鱼身下似乎都潜伏着海沙尔的影子。



吉利

1999 年出生于新疆伊犁伊宁市，现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就读硕士研究生。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周六见。  
投稿请发送至 jingrui.li@aves.art，录用必复。



题图来自 [Rodion Kutsaiev](#) on Unsplash

## 小说

#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

本·勒纳 | 新书试读

一个社区爱恨交织的世情画卷，  
一场深入我们时代的“精神分析”。

来自美国堪萨斯托皮卡的高中生亚当·戈登，辩论高手、诗人、偏头痛患者，即将登台参加全国演讲和辩论锦标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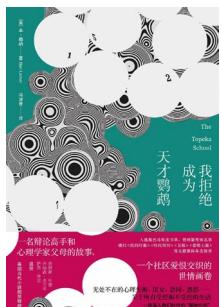
他的父母正坐在台下紧张地等待观看——乔纳森和简，二人都是心理医生。

乔纳森明白心理医生的愚蠢错误：他们以为，既然他们能分析自己的情感，就能超越和克服这些情感。但事实上，他们更多时候是在喂养这情感。

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场漫长的心理分析。但它并未带来治愈，反而引发情感失衡，直到压力爆发，光滑的表面断裂，一切才又渐渐回到正常……

那是 1997 年，像一场热烈、喧嚣、不知为何结果不太美好的派对。像是偏头痛、光幻视和永恒。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透过书写辩论赛选手和他的心理学家父母的生活，描绘了四十年来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况，揭示了中产阶级虚假脆弱的优越感和更根深蒂固的焦虑，以及保守和自由之间的巨大裂隙。作者本·勒纳语言风格十分独特，抒情中充满幽默与嘲讽，在极简与繁复之间自如穿梭，在人物内心世界描写与世情画卷的描绘



之间巧妙编织，形成当代小说叙事的华丽高峰。

以下文字经世纪文景授权，选自《语速压倒（亚当）》一章。

他们在她继父的小船上随波逐流，在一个人工湖中间，四周空荡无人，宽大的小区住宅围绕着湖水而建。早秋时节，他们直接用酒瓶喝着金馥力娇酒，亚当坐在船头看着水面上一道变化闪烁的蓝光，那很可能是电视透过玻璃窗或者玻璃门发出的光亮。他听见她打火机的咔嗒声，然后看见烟飘在他身上，散开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了。

等他回头去看自己说话的效果时，她已经走了，留下一堆牛仔裤和套头衫，还有烟斗和打火机。

他叫她的名字，突然意识到四周很安静，他把手放进水里，水很凉。下意识地，他拎起她的白色套头衫，闻着那晚早些时候在克林顿湖边留下的木头烟熏味，还有合成薰衣草的气味，他知道那是她的沐浴露。他再次叫她的名字，声音大了些，然后四下看看。几只鸟掠过一动不动的湖水。不，那是蝙蝠。她什么时候跳下水或离开船的，怎么可能一点水花溅起的声音都没有呢，万一她淹死了怎么办？现在他在喊叫了，远处一只狗在呼应。因为兜着圈子寻找她，他感到头晕，坐了下来。然后他又站了起来，顺着船沿看去。也许她就在旁边，忍着笑声，但是她不在。

他必须把船开到码头去，她肯定在那里等着。（每隔两三个分区就有一个码头。）他觉得看见了一只萤火虫在岸上慢慢地发光，但是这个季节不对，太晚了。他感到一阵愤怒涌上来，庆幸有这种感觉，想要它淹没自己的恐惧。他希望安帕在他啰啰唆唆情感告白之前就已经跳进水里。他曾经说过一旦他离开托皮卡去上学，他们就可以在一起，但是现在他知道不会了。等他在岸上找到她，发现她平安无事时，他就会急切地表现出自己的冷漠。

看见外置马达在月光下闪亮。对他任何一个朋友来说，操控船只都很容易，可能除了贾森之外，他们全都展示出一种中西部人掌握机械的基本能力，都能自己换油或者擦拭枪支，而他却连手动挡车都不会开。他身上有太多戴尔的基因。他找到了他想应该是启动绳的东西，扯了一下，没有动静。他把大概是风门杆的东西推到另一个位置，又试了试，还是没动静。他开始想到是否必须游泳了——他不确定自己水性如何——然后他看见了点火器上面的钥匙。他转动钥匙，引擎发动起来。

他尽量缓慢地把船开回岸边。靠近陆地时，他关上引擎，但无法让船与码头平行。玻璃纤维撞到木头上声音很响附近的牛蛙顿时安静下来似乎没有损坏什么他也没认真去看。他匆忙把船上堆着的绳索扔到固定在码头的木桩上，迅速地随便打了几个结，然后下了船，他祈祷没人从某扇窗里看他。他没有去拿钥匙，也没拿她的衣服、烟斗或酒瓶，他跳上通往她家的斜坡，经过湿漉漉的草地。如果那条船在水上漂走，那也是她的过错。

面对湖泊的那些大玻璃门从不上锁。他轻轻打开一扇门走了进去。现在他才感到身上的冷汗。他能够看见沙发上她哥哥的身影——头顶着枕头，在大电视机的亮光中睡着了。静音播放着新闻。房间其他地方都在暗处，他想要叫醒他，结果还是脱下添柏岚靴子——他觉得它们肯定沾满了泥——悄悄穿过房间，走上铺着白色地毯的楼梯。他慢慢地走上去。

虽然不允许他在这样的时点来她家，但是如果被发现了也不是什么灾难。过去他也在这家待过两三晚，她告诉父母他喝多了。他们以为他睡在客房里。他们猜得不错，他给家里打过电话了。但是现在一想到可能会碰见谁——当他甚至都不能确定她是否在家时——他吓坏了。她妈妈吃安眠药，他见过那个超大号的处方药瓶，知道她每晚把药跟酒混在一起。上次的派对那么吵闹，她继父照睡不误。他们不会醒的，他安慰自己，只要不撞倒什么东西就行。他很高兴只穿着袜子。

他走到一楼，打量了一下黑黢黢、宽敞的起居室，然后又上一层楼走到卧室所在的地方。他几乎能看到屋子另一头的墙上那大幅常见的打猎场景，日落时分湖泊旁的树林里塞特种猎犬惊散一群野鸭。他能够看见报警系统面板上的红灯闪烁，好在他们从来没启用过。壁炉上家庭照片镜框的银色镶边有点亮光：十来岁的孩子在落满树叶的草地上摆姿势，她弟弟拿着一个橄榄球。巨大的厨房里什么东西咯咯响了一下，然后又安静了。他走上楼。

她的卧室在右边第一间，开着门，他没有打开灯，在走廊上也能看见安帕睡在床上，盖着被子，沉稳地呼吸。他放松了肩膀；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松了一口气结果又更生气了，也意识到他好想撒尿。他转身穿过大厅进了卫生间，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没有开灯，掀起了马桶盖。想了想又放下马桶盖，坐了下来。外面慢慢驶过一辆车，车灯光透过百叶窗帘照亮卫生间。

他曾经说过一旦他离开托皮卡去上学，他们就可以在一起，但是现在他知道不会了。

这不是她的卫生间。电动牙刷、吹风机、这些特殊的肥皂——这都不是她的盥洗用品。一时间他以为，并迫切地希望，这可能是她母亲的东西，但是不对劲的地方太多了：淋浴房的门不同，玻璃是磨毛的；现在他闻到了马桶水箱上放着的一罐凝胶球的柠檬气味；墙上挂着的一个紫色布袋里装着异域干花。他打个激灵一瞬间回想起来，他对这幢房子的印象变了：钢琴（从来没人弹过）在什么地方？他不是应该看到那盏枝形吊灯的吗？楼梯上的地毯——绒面是否太厚了点，在黑暗中看上去也太暗淡了点，不像是真正的白色？

意识到不同之处、发现自己走错了房子已经够骇人了，伴随而来的感觉是，他同时置身于湖边所有的房子里，因为这些房子全都一模一样，登峰造极的相同格局。在每个房子里的床上都有她或者像她一样的人在睡觉或者假装睡觉；法定监护人在大厅另一头，大个子男人打着呼噜；壁炉上家庭照片的面孔和姿势可能不一样，但全都属于根据同样原理打造的面孔和姿势：油画上场景的元素可能会各有不同，但是熟悉和平庸的程度却差不多；如果你打开任何一台巨大的不锈钢冰箱或者察看人造大理石的厨房岛台，都会看見配套的预制产品，只是外观构造搭配略有不同。

他置身于所有的房屋，但是正因为他不再拘囿于一个离散的身体，也就可以飘浮在这些房屋上方，仿佛小时候观看克劳斯送给他的迷你火车的感觉，他对火车不感兴趣，几乎没法让它们动起来，但是他热爱那个背景，那在木板上铺开的绿色静电植绒：小而高耸的松树和阔叶树。当他观看那些细节极其逼真的树木时，同时占据着两个优势：他想象着自己在树枝下，同时又从上方观察它们；他抬头看着自己正在朝下看。然后他能够在这些视角、这些尺度之间快速转换，这样的连续变换使他游离于身体之外。现在他既在这个特定的卫生间里，同时也在所有的卫生间里恐惧到浑身僵硬。他从一百扇窗子里往下看着那个乏味的人工湖上的小船（干了的丙烯上面有些白色油漆，给表面增加了一种动态和泛着月光的感觉）。

他游移回到自身。他感觉仿佛什么地方启动了定时钟，他只剩下几分钟，也许几秒钟，逃离这幢他无意间闯入的房子，否则马上就有人朝他迎面放空一梭子弹，或者警察到来发现他在一个沉睡的女孩卧室外面徘徊。恐惧令他呼吸困难，但是他告诉自己他只需要摁一下倒带按钮，悄悄地原路返回，不打扰任何人。他这么做了，尽管现在当他走下楼梯时，那些小小的差异之处不断提醒他注意：有一张他先前没注意到的 L 形状的沙发；他能看出来这里的咖啡桌是玻璃的，而不像她家的那样是深色木材。在楼梯底下，他犹豫了一阵：大门就在那里，向他召唤，他马上就自由了，但是他的靴子留在楼下，要取回靴子必须经过那个睡着的陌生人。

尽管他害怕可能随时会被发现，还是决定去取靴子，并非因为那是证据，可以追寻到他身上，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么光着脚回到她身边，有可能会受到嘲笑和羞辱。他凭直觉也能大致勾勒出这个故事，能够感到故事会传开——她如何离开他，先是让他自己去胡乱对付那艘船，然后又在某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倒霉的冒险经历中丢失了他妈的鞋子。嘿，戈登，你鞋带系好了吗？穿了拖鞋？他想起了中学时代的盖伦·麦凯布，穿着袜子回家，哭哭啼啼，因为穿了飞人乔丹运动鞋而被人捉弄——这样的记忆突然冒出来。盖伦现在还为这事气恼，尽管他现在可以仰卧推举三百磅。

曾被他认作她哥哥的那个年轻人已经翻了个身，脸对着沙发靠背，枕头掉在地上。他溜过去时，鲍勃·多尔巨大的脑袋正出现在屏幕上，动弹着嘴唇。他捡起靴子，慢慢推开房门，滚轴有点滞涩。他只好用了点力气，弄出了很响的吱呀一声。沙发上的身体动了动，开始坐起来（在整个舍伍德住宅小区都有身体在动弹，并开始坐起来）。他没有关上门就奔了出去，手里拎着靴子，跑在湿淋淋的草地上——不顾地面凹凸不平，不顾地上的木棍和石头——速度快得空前绝后，身体因为一些肾上腺素的释放而愉悦。没有人在他身后叫喊，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耳内血液轰鸣。他激活了一些运动感应灯，跑得靠近水边了。他用尽全力跑了一分钟，然后意识到自己并不确定要去哪里。他单腿跪了下来，胸口灼烧，回头确认没有人跟着他。他尽快穿着湿袜子套上靴子，没有系鞋带，然后起身跑过一幢幢房屋，一直跑到了街上。

但是正因为他不再拘囿于一个离散的身体，也就可以飘浮在这些房屋上方

现在他唯一的目标是找到自己那辆停泊在她家车道上的 1989 年红色凯美瑞，开车回家，回到床上。他还在害怕——任何时候都可能听见警车声——但是远离湖水和可笑的闯入私宅的情景，他觉得最糟糕的事已经过去了。他拍拍口袋确定钥匙还在，快步沿着路边走——没有人行道——但他没有跑，以免万一有人看见他起疑。他走了又走，找不到自己的车，找不到她的家，他肯定把船停在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搜寻了差不多半小时，在湖

边兜了半个圈，他才看见，心花怒放地看见，自己数小时之前停泊的那辆车。车门打开的声音叫人深感欣慰。他上了车，在后座上找到了自己那包红色万宝路，拿了一支。他把钥匙转到开车的位置，但没有启动引擎。他放下车窗，从杯架上拿起一个黄色比克打火机点燃香烟，吸了一口，感觉仿佛是自从发现她不在船上以来第一次深呼吸。

他发动引擎，打开车灯，发现她站在、一直站在她家大门前，身穿超大号套头衫。她几乎长及腰际的暗金色头发放了下来，他能够看到她的绿色眼睛描了眼影，肯定是又重新描过了。他思忖着关闭引擎，关上灯。她光着脚走到车边，打开后车门，自己取了一支烟点上，好像他只不过是赴约晚了几分钟而已，问道：你去哪儿了？

他怒不可遏。他无法承认自己吓坏了，无法说他没本领对付船，也没法说他几乎在别人家里撞见了别的年轻女子。他需要她解释。这他妈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想游泳。”她说。他再追问时，她耸耸肩继续抽烟，烟草味与她的护发素香味混合在一起。然后她拨弄着他的头发，他觉得这种表现既自信又亲热，这两者的结合他在自己班上的女同学里面是找不到的。

我继父过去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大发议论滔滔不绝，现在他几乎不说话了，反正我们也不在一起吃饭了。我觉得他抑郁，好像他需要一个治疗师，去基金会让你的父母给看看。现在他这么安静有点怪怪的，因为从前他会把每餐饭都变成他妈的长篇大论，只不过不是真正的讨论，因为没有人讨论任何事情，他只是对着我们这个方向说话。他会不时问我哥哥一个问题，但总像是突击考试：我曾说过是什么让航空业日子很难过的？（你知道他靠别人的发明发了财，是某种没有任何重量的螺丝什么的。）我哥哥从来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回答了自己的狗屁问题。答案总是中国，基本如此。然后去年夏天有这么一个晚上，我妈妈让我偷偷喝点白葡萄酒，我哥哥不在家，结果我成了餐桌上听人家说话的人，这委实让我烦躁。也许我有点恼火，要不就是因为长大了一些，更在乎我妈妈。她受过一些罪，从我自己的老爸开始。但是总之我做了一件愚蠢却又了不起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缓慢地，我开始在椅子上慢慢低下去，就好像溜下去那样，他还在边吃他的意大利饺子边聊着什么。我妈妈已经在厨房里了，在往洗碗机里放碗盘。她从来不吃饭的。像这样慢慢地溜下去需要很好的耐力。那些嘎吱嘎吱的声音，全是玻璃碴子（开玩笑）。跳舞的时候他们总跟我说做动作时要想象这个动作，现在我就想象自己是一股液体从椅子上流下去。一点点离开椅子，直到我真的已经在桌子下面了，我继父还是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我妈妈还在那里洗碗，我忍着不出声。

也许是忍着不哭出来吧？亚当问，她看着他。

如果哭，大概就是因为他妈的这个家伙有多么可悲。哦对了，还有我妈妈这样的，居然嫁给了他。好像他都没有意识到观众全都回家了，他还在那里说了又说。然后我在桌下一点点蠕动着，爬过地毯，屏住呼吸，一直爬进了厨房。我妈妈已经洗完了碗，在岛台的另一头，没有看到我，我静悄悄地站起来。她端着那杯桃红葡萄酒在窗口眺望湖泊，或者更可能是看自己在窗玻璃上的身影，因为已经是晚上了。我从冰箱里拿出酒瓶，把大部分酒倒进一个塑料杯，端着我这杯“巨无霸”走到她身边，她回过神来，想要对我说什么，但是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让她别出声，轻轻说：听。我们可以听见继父还在餐厅里对着空气谈论罗斯·佩罗。（他对罗斯·佩罗着迷，罗斯·佩罗，还有中国。）我妈妈可能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蹑手蹑脚走到门边，站在那里望着餐厅，看他对空气说个不停，就像个调频收音机，酒差点从我鼻子里喷出来。我们在那里不知站了多久他才抬起头来，好像我们逮住他手淫似的。他看看我的椅子，然后又看看我们，现在我妈妈和我真是笑得肚子痛了。然后他脸上露出那种糟糕透顶的笑容，是彻底地光火了。好像说你们这两个婊子怎么敢取笑我。但是我给了他一个继女的笑容，挺住挺住，我们基本上是在比赛谁更能忍住不眨眼，我妈妈的笑声变得神经质起来，直到他的表情终于放松下来，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但本来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因为没有人讨论任何事情，他只是对着我们这个方向说话。

亚当是在哪个时刻才意识到她从椅子上溜走和从船上溜走之间的相似之处呢？

他问了一些关于她爸爸的问题，她回答了。他想着是否要告诉她自己走错了房子的事——也许他能够说得富有诗意——但他还是没说，不想冒这个险。为了保护他自己（究竟保护自己躲过什么他也不清楚），他设想着自己从某个模糊想象中的东海岸城市回望现在，那时再谈他在托皮卡的经历只会带着极大的嘲讽了。现在他试图超前召唤这种嘲讽。超然的态度，他想，才能使她更加受他吸引，使他对他她更加无动于衷。

但他们吻别时，他与自己的身体还是共时的。她潮湿的头发拂在他脸上，舌头在他嘴里，

舔着他的牙齿，烟草和薄荷，清口牙膏。深吻起来，他的手移动到她运动衫里面，他看见眼睑里面黑色背景上亮闪闪的图案突显。光幻视，视网膜静止不动时产生的内在电流形成的小小罗夏墨迹，是没有光照时所感知的光。他儿时遭遇脑震荡、后来偏头痛发作时以及最近和人有这种接触时都看见了这些形状。他年幼想要睡着时也会看见它们，看着灰色的圈圈在黑暗中移动。如果他在靠近太阳穴的地方挤压闭着眼睛，那些形状就会亮起来。他好奇这些形状是否他独有的，是否某种特殊性或者损伤的证明，或者是普遍现象，大家都看得到。但是这些形状如此微妙，如此难以形容，以至于他从来无法了解他的父母和朋友们是否也有这种仅仅位于认知之上一点点的相同体验。这些形状在语言的重量下消散了，始终是不可抹去的私人体验。他听过人们在撞到头时说“眼前金星直冒”，但是他看见的不是金星，他看见一圈圈红色或黄色光亮或羽毛形状的格子纹影斑，如果他努力关注的话它们就会开始摇晃，有时会有暗金色螺旋在他的视野（或者无论你把你紧闭双眼时的视野叫什么）里旋转而过。他没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样将手移到她大腿内侧，而是将双手移动到她脸上。他捧着她的头，拇指抚摸她闭着眼睛，小心翼翼地用了一点力，可以让她感觉得到，不过断断续续。她是否也能看得到几个红色火星，还有微妙线条组成的网络呢？

她往后躲了躲，笑着，你在干什么。他告诉她他从克劳斯那里学来的词，克劳斯说光幻视可能会引起精神异常幻觉，有些人曾经尝试画出来，图画看上去奇怪地像那些岩洞壁画，最古老的艺术。她喜欢他从中得出的诗意，喜欢他希望她也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想象同她一起或像她一样看——能揭示他人心灵困境的、世上最微妙的焰火。他们很快又重新吻起来，他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上床。但是那晚在位置便利、位于西湖商场的优选住宅小区里，她温柔地、坚决地同他分开。也许她来了例假，也许她并不真在乎他。她离开副驾驶座位，带着他的一支香烟和打火机。她走到车头前，从车窗外把打火机递给他。船在哪里？他说他把船开到湖那头喝了点酒，不大能确定船停泊在什么地方。他又紧张起来，担心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驾船的各种失误，但是她无所谓。

明天为我赢个奖，她笑着说，他再次启动引擎。不久他就快速离开了乌尔利希大道上那片伪豪宅，凉爽的风从他打开的天窗呼呼吹进来，在乌尔利希与 21 街的交叉路口，他在闪烁的红灯处停了下来，看见左边的罗林希尔护理院，是幢一层楼的装配式建筑，他基本上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的外祖父自从两年前从凤凰城搬到——自从被搬到那里之后，一直是里面的住户、病人、囚犯。他外祖母身体状况很好，住在南边数英里之外的优选辅助生活社区。他把烟头扔出窗外，看着烟灰在柏油路上飘散，然后迫使自己去看那幢房子。明亮的街灯照在几乎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周围漆黑一片。想到那个老头现在就睡在那里，这感觉有些怪异。一时间他想到了医用机械床与活动驾驶座之间可怕的类比，这念头很快又消失了。他把《万视瞩目》放进磁带卡座，把声音放得很大，好奇护理院里是否会有听得到。然后继续开车。



本·勒纳

美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生于堪萨斯州托皮卡，富布赖特奖金、古根海姆奖金和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现于纽约布鲁克林学院任教。诗集《偏航角》曾入围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入围 2020 年普利策奖短名单。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Marek Piwnicki](#) on Unsplash

## 小说

# 洛杉矶河畔的故事

科尔姆·托宾 | 新书试读

献给在疫情时期陷入困顿的每一个人，  
有关爱欲、生死、衰老、日常生活

《十日谈》由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作家的薄伽丘撰写，于 1353 年完成，以黑死病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七女三男到佛罗伦萨郊外的山上躲避瘟疫，为打发时间以及与世隔绝的乏味生活，便决定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故事。最后，十天过去，一百个故事也讲完了，是为《十日谈》。

2020 年，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纽约时报》杂志就以《十日谈》为主题，邀请 29 位作家创作短篇小说，书写这时代的疫症。主题涉及爱情、生死、衰老、日常生活等。不仅仅聚焦于疫情本身，这本书的主旨立意也在于，在这个全球被按下暂停键的时刻，所有知识、观点也许没有那么重要，面向生活本身的体验、感受更为重要，这些也许只有小说能触达。

经浦睿文化授权，我们摘选了科尔姆·托宾所作的这个故事分享给读者。



封锁期间，我写了一本日记。我首先写下闭关开始的日期——2020 年 3 月 11 日，以及地点——洛杉矶，高地公园 [1]。第一天，我抄下那天早上在一一辆露营车上看到的句子：“微笑。你正被拍摄。”

这第一条之后，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可写的。在那之后，没什么事情发生。

我真希望我说的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在日记上写下新的一章。但其实我早上都躺在床上，之后，随着一天中时间的流逝，我开始忙于痛斥我男友的音乐品位。H. 新买的音箱让他的音乐品位变得更具破坏力，本来模糊的刺耳喧响现在变得愈发清晰。

人类分为两种：从青春期末尾开始听巴赫和贝多芬的人，还有没这么做的人。H. 属于后者，相反，他拥有一大堆黑胶唱片，其中几乎没有古典乐，也没多少我喜欢的音乐。

而且，H. 和我从不读一样的书。他的母语是法语，他的头脑是思辨性的。因此，他在一个房间里忙着研究雅克和吉尔 [2]，而我在另一个房间读简和艾米莉 [3]。他读哈利道奇 [4]，我读戴维·洛奇 [5]。

\*

有位作家住在美国中西部的某个小镇。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两本书，我喜欢他在小说中的感情流露。虽然从未见过他，我却打心底希望他能幸福。我在网上读到他有男友，还看了一些他发的帖子，内容是他们快乐的家庭生活，这让我很高兴。事实上 H. 曾经见过这位作家，H. 也为他能和他爱的人一起安定下来感到高兴。

很快，我们开始一起看那位作家发在网上的东西。他回到他们家时，他男友准备好花等着他。我们看了一张花的照片。

那位小说家还烤曲奇饼，至少他在网上发的照片里是这样。他和男友每晚一起看电影，他们两人都觉得那些电影是令人愉快的意外发现。

\*

每个人心中都有影子般的人、影子般的地方、影子般的情节。有时它们占据的空间比苍白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更大。

那种苍白让我寒战，而那些影子让我兴奋和赞叹。

我喜欢想象那位影子般的小说家和他的男友。

我试图想象一种关于幸福家庭生活的叙事，其间我们共享空间、音乐、小说和电影，把两人的爱情发到网上。

但不管我作何梦想，事实是，我们无法就晚上看什么电影达成一致。第一周，我们决定看以洛杉矶为背景的电影，包括《穆赫兰道》和《粉红色杀人夜》。对我而言，前者节奏太慢，后者则包含太多不祥的隐喻。H. 不仅热爱这两部电影，还想跟我讨论一部电影的影像如何渗入另一部电影，以及电影中包含了多少隐秘的引用和修辞，因为他很懂电影。

而我去电影院从来只为了娱乐。睡前一小时，家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因为 H. 四处追着我，告诉我这些电影的真正含义。

那是我最爱他的时刻：他对电影、对银幕上产生的观点和图像如此认真、如此激动，他如此迫切地希望把我们的谈话维持在严肃的层面上。

但在那些糟糕的夜晚，我难以自制。当他详尽又切题地引用戈达尔、戈多和居伊·德波时，我只能如此回应他：“那部电影是垃圾！它侮辱我的智商！”

\*

我梳理历史上伟大的同性伴侣的名字——本杰明·布里顿和彼得·皮尔斯，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B·托克勒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唐巴沙尔迪。为什么他们总会一起下厨，画下彼此的肖像，或者写歌让对方来唱？

为什么只有我们是我们这样？

或许我和 H. 应该趁此时机，像个成年人那样做出改变，就此愉快地开始阅读对方喜欢的书。但我们没有，我们依旧阅读更多自己喜欢的书。在文化方面，他是杰克斯普拉特，绝不吃任何肥肉。而我是杰克的妻子，绝不吃任何瘦肉 [6]。

\*

我最喜欢的事莫过于我认真看待的事被人嘲笑，或者我认为荒谬的事被人认真看待。

封锁开始时，我认为洛杉矶河及其所有支流都很有趣。但我很快便会领教现实的滋味。整个保持社交距离的事情过去一半时，我只希望再也不要听到超级投手那首名叫《小狂人》的歌的哪怕一个音符——如果那能叫音符的话。那是一首 H. 非常喜欢且经常大声播放

的歌。

“我不会开车，也不会烹饪。我不会跳舞。我不会扫描一页书，也不会用电子邮件发送一张照片。不到万不得已，我没主动用过一次吸尘器或铺过一次床单。”

要向同住人解释这一切有其合理性，可相当困难。我暗示我的一切失败都源自童年创伤。当这么暗示不管用时，我便毫无证据地指出邋遢是思想深刻的人的专利，是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的专利。马克思很不爱整洁；亨利·詹姆斯是个邋遢鬼；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詹姆斯·乔伊斯曾打扫过他的房间；罗莎·卢森堡也很不整洁，更别提托洛茨基了。

我真的努力好好表现了。比如说，我每天都把碗盘从洗碗机里拿出来。还有，我给H. 煮咖啡，每天几次。

然而，有一天H. 说该用吸尘器清扫房子了，我回答那可以等到我不在家的时候再打扫，等我去别的地方做研究或者讲课时。

“读读报纸吧，”H. 说，“‘不在家’已经是老掉牙的事了。”

有一小会儿，那句话听起来像一项指控。然后，H. 以法国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盯着我，于是那句话听起来又像是种威胁。

很快，吸尘器的声音响彻整栋房子。

\*

我爱那些我们两人都无事可做的日子，而且目光放远，前方还有许多同样的日子。我们像一对老夫妇，已一同变得成熟而睿智，一个人说上半句，另一个人就能补完下半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不太一致。

封锁期间，我们是快乐的，比那之前的一段时间要快乐。但我希望我们能像那位小说家和他男朋友一样，能像其他同性伴侣一样，获得一种轻松、满足的快乐。

我在花园里找了一个坐下读书的地方。当响亮的音乐从室内传出时，我常常待在室外。家庭音乐<sup>[7]</sup>，也许你可以这么叫它；还可以称它吵闹音乐。

有一天，我走进屋里时看到H. 正把唱针从一张唱片上抬起来。他这么做，据他说，是不想让音乐吵到我。我感到很抱歉，试图假装他的音乐一点儿也没有吵到我。

“你干吗不继续放音乐呢？”我问。

我觉得那音乐很刺激，这感觉持续了一秒钟，然后是两秒钟。我内心的那个青少年苏醒了一分钟。那是发电厂乐队的歌。我停下脚步，开始聆听。我对H. 露出赞许的微笑，我几乎喜欢上了这音乐，可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试图跟着音乐的节奏跳舞。

我对舞蹈的唯一了解来自电影《周末夜狂热》<sup>[8]</sup>，1978年，我在都柏林照管一群西班牙学生的时候被迫看了这部电影。我讨厌这部电影，后来我的一位同事，一位加密符号学家，用缓慢的英语向我解释了这部电影的隐秘内涵，于是我更讨厌这部电影了。

但对我舞蹈的全部了解都来自这部电影。这些年来，我确实也泡过迪斯科厅，但我对后台、侧目送出秋波和含量十足的酒精更感兴趣，对舞姿正确与否则不甚了然。

尽管如此，我还是尝试了一下，在H. 的注视下。我跟着节拍移动双脚，挥舞手臂。

H. 努力抑制自己皱眉蹙额的冲动。

我悄悄溜走了，像一个负罪者。我觉得自己就像歌里的琼斯先生：“这里正发生一些事情，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琼斯先生？”

我明白了，不是我在嘲笑发电厂乐队（我一直这么做，直到这一刻为止），而是发电厂乐队在嘲笑我。

“你不够酷，你不配听我们的歌。”发电厂乐队对我耳语道。

花园里的石榴树上挂着一个吊床。我在吊床上阅读亨利·詹姆斯，深深沉醉其中。

\*

我们在网上订购了自行车。我梦想我们两人在市郊的街道上飞驰，经过一座座陷入忧惧的小屋。人们瑟缩在那些房子里，从一个电视频道切换到另一个，希望得到救赎，同时以祈祷般的热忱不断洗手。

透过窗户，他们看到我们自由地飞驰而过，那场景像一张被遗忘的黑胶唱片的封面——我是这样想象的。

自行车运到了，比预期早到几天。唯一的问题是它们需要被组装起来。

H. 开始研究说明书的时候，我试图溜走。他明确表示他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时需要我在旁边，我坚称自己得去发几封十万火急的电子邮件。但这不管用。他命令我站在那里，要面带关切地看着他，他则躺在地上汗流浃背、骂骂咧咧地质问天上的上帝为什么让厂商不仅送错螺栓和螺母，还少送了螺丝。

我想象网上那位小说家，那位快乐的小说家，和他的男友一起完成了这项工程，两人齐心协力地找到了正确的螺丝。这时我意识到，但H. 并没有意识到，他认为厂商装错了那些细金属棒其实没装错，它们实际上是用来固定前轮的。我想起了本杰明·布里顿、格特鲁德·斯泰因、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他们的伴侣。他们一定知道怎么表现出充分参与的姿态。

由于H. 如此愤怒（不仅是对自行车和制造自行车的厂商，而且对我也很愤怒，因为买自行车全是我的主意），我判断此刻最好召唤出我的另一个版本。我最后一次使用那个版本还是在学校里，当我不理解x为什么等于y的时候。

我装出一副很笨的样子，同时悲伤而谦逊，情绪温和平静，但又深深地投入到面前的任务中。

不久，经过一番挣扎和叹息，自行车装好了。我们戴上头盔和口罩出发，飞下一座小山，满载欢欣和喜悦，以及有节制的放纵，就像高级肥皂广告中的两个男演员。

我有好多年没骑过自行车了。我任由这台机械沿阿德兰特大道滑下，滑上名字优美的松快街，接着是约克大道，然后是马米恩道，最后是阿罗约塞可公园。在这个过程中，我那扭结成一团的精神发生了某种变化。不是下坡的时候，路很平。街上没什么车，只有一些戴着口罩的行人站在人行道上一脸迷惑地望着我们。

我从不知道洛杉矶河有一条支流穿过公园，也不知道支流一侧的河岸上有条自行车道。很难用通常的词汇描述这条所谓的河流。它的名字叫阿罗约塞可河，意思是“干涸的溪”。它确实是干的，或者说足够干，它其实也没有“河岸”，因为它算不上一条真正的河。

等这一切结束时，洛杉矶一定会很可爱。

尽管最近下过雨，这个被栏杆围住、等着汇入拥有宏伟名字的河流的排水口依然没有水。洛杉矶河和它细小的支流一直承受着痛苦，我始终这样相信，它们吁求着怜悯。

但此刻，当我把自行车推上小道，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些这座城市从前一直被隐藏的元素。没有车能开到这里。这个悲伤而古怪的场景的图像永远不会被传送到世界各处。没有“快来洛杉矶吧！来河边骑车！”的宣传标语。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到这里来。

但它几近于美丽的。我不应该嘲笑洛杉矶河。

正当我深深沉浸在这些让我觉得自由的想法中时，H. 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回过头去，看到小说家和他的伴侣，非常幸福的那对网上的那对此刻化身为两个幽灵，正跟在我身后，他们后面则跟着历史上所有幸福的同性伴侣，所有人都在奋力蹬车。我换了挡，甩开他们，朝着H. 的背影，用尽全力追上去。

[1] 洛杉矶东北部的一个街区，以多元化的居民构成和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著称。

[2] 指雅克·马里顿和吉尔·德勒兹，两者均为法国哲学家。

[3] 应该是指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两者均为英国小说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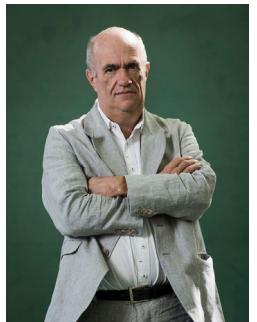
[4] 美国艺术家、作家，著有《我的陨星：若没有随机，便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东西》。

[5] 英国小说家，著有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换位》《小世界》《美好的工作》）。

[6] 出自一首英语童谣：“杰克·斯普拉特绝不吃任何肥肉，他的妻子绝不吃任何瘦肉，但他们两人一块儿，就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7] 正式译名为“浩室音乐”，是电子音乐的一个分支，起源于芝加哥的一家名为“仓库”（Warehouse）的舞厅。此处House一词双关，既指“家庭”音乐，也指“浩室”音乐这种曲风。

[8] 一部由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的十分热闹的歌舞片。



科尔姆·托宾

爱尔兰作家。自 1990 年出版首部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戏剧、文学评论集和散文集。《黑水灯塔船》《大师》《马利亚的自白》都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荣获 2006 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文学奖。《布鲁克林》获 2009 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魔术师》已于 2021 年 9 月出版。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Jeremy Goldberg](#) on Unsplash



小说

# 光之领地

## 津岛佑子 | 新书试读

“不完美母亲”独自带娃的光阴故事，  
直抵女性心理的深井

什么样的母亲会梦见女儿的“死”？

什么样的母亲会把孩子丢在公园里？

工作之余没完没了的家务，噩梦连连的不眠之夜，都令《光之领地》中的这名母亲疲惫不堪。邻居抱怨房屋漏水，丈夫不同意离婚，女儿任性发脾气也逐渐发展成每日例行的狂怒时刻。她不禁自问：“为什么只有孩子的哭闹可以被容忍？”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和不负责任……

《光之领地》是日本文学界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家津岛佑子的代表作，以其亲身经历为素材，讲述了一名离开丈夫的年轻女子在一年时间里独自抚养年幼女儿的故事。小说最初于1978—1979年在日本文学月刊《群像》上每月一章，分12章发表，而后出版单行本。每章以光、水等自然意象为标题，精妙运用短篇连载式的创作手法。小说中的生活日常充满了光，时而让人欣慰，时而让人感到危险：透过窗户的阳光，公园里的斑驳光线，转瞬即逝的烟花，氤氲的路灯和神秘的爆炸——主角世界里的这些余光会在读者脑海中久久不散。这部细腻叙述女性寻求自立的作品，无疑会得到正在摸索“新人生”道路的女性的共鸣。

经后浪文学授权，我们摘选了书中第二章《水边》分享给读者。

夜里，从墙的另一侧传来了流水声。我躺在四楼的房间里，眺望着雨中被街灯和霓虹灯映照得五颜六色的楼房外墙。那流水声微弱而轻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响起的呢？好像我躺下之前就在响，又像是刚睡醒时产生的错觉。

早晨，一打开窗户，耀眼的阳光和车流轰鸣的马达声倾泻而入，天空湛蓝湛蓝的。街上连背阴处都被晒干透了。

我为今天也是个大晴天感到心满意足，去叫醒了还没起床的女儿。夜里下的雨消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连个小水洼也没留下，我一点儿都不奇怪。雨，一定是在像自己的手触

及不到的后背那样的地方继续下着，只真切地留下了遥远的水声的感触，那感触却也不完全像是梦境。

要不是楼下的人开始吵吵闹闹，那天夜里，我一定还会听到同样的水声，第二天早晨也还会有同样的感触。然后，将它淡忘。

早餐的面包刚进嘴，便响起了敲门声。这么早，会是谁呢？我非常防备地开了门。门外是一个四五十岁男人的胖脸，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有点儿沮丧，因为不是分居了一个多月一直都没见面的藤野。

“你弄的水吧？”

那人边焦躁地往屋里窥视边问我。女儿站在男人面前，仰着头好奇地看着我和那个男人。

“水！是你洒的水，还是哪里的水溢出来了？是你干的吧？赶紧想想办法，我们下面都乱套了。”

我终于反应过来，这个男人是下面事务所的人，于是连忙打了声招呼，回答他：

“怎么回事？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呀。”

“那为什么水会不停地流到下面来呢？肯定是你家什么地方的水溢出来了。你要是还不知道，就赶紧找找看到底是哪里漏水了吧。”

这个人是加工纯金徽章那家店铺的老板。实际上，产品也许并不是在下面那间狭窄的事务所制作的，不过，发货用的纸箱总是堆在大敞四开的门口。我有几次看见这个男人从房间里往外搬纸箱，或是拿着账本核对纸箱里的货物。也不知是工作本身就很辛苦，还是他生性喜欢操劳，这个男人常常是早上八点左右就来到事务所，夜里总要待到快十二点。对我来说，是个挺闹心的人，因为我得去升降楼梯口的那扇卷帘门。他应该也觉得不方便吧，因为只要我早上睡懒觉，他就不得不在卷帘门前等我开门，到了深夜他要走的时候，还得隔着门喊我一声。在他搬来两个月后，房东破例给了这个男人一把卷帘门的钥匙，这也让我感觉轻松了很多。

这个男人的妻子是店铺唯一的员工，大概她总是不得不跟丈夫一起忙到深夜。可我几乎没怎么看到过她的正脸。经常看到她丈夫在门口忙着与纸箱打交道，而坐在屋内办公桌前的自然就是妻子了。她总是系着一条围裙，一副在厨房里刷锅的打扮。

男人坚持说漏水的原因肯定在四楼的什么地方。虽然我有点儿担心上班会迟到，但还是把厨房的水龙头、洗衣机、洗手间，包括屋顶的浴室，凡是跟用水有关的地方都看了一遍，顺便也看了看那个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可是一滴水也没看到。

“好像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

我把这话甩给那男人之后，看到女儿比平时兴奋，早餐还一口没动，就训斥她：

“咱们得出门了，赶紧把那牛奶喝了。你又要惹老师生气了哦。”

那男人退下两级楼梯，瞪着我说：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那这处积水是怎么回事？就这儿，快看，自己不出来怎么能看見呢？”

我只好穿着拖鞋来到屋外。那男人粗暴地关上门，指了指脚下的楼梯平台。果然，那儿有一小摊积水。我仰头看了下天花板，发现墙角有块漏水的痕迹。同样的水痕我在房间里的天花板上也看到过。中介当时告诉我，以前这房子漏雨漏得厉害，但屋顶补漏工程做得很彻底。所以我以为那水痕是补漏工程前留下的。

“……我也不太清楚，没想到会积这么多水……”

这时，屋里传来女儿的哭声，我正要去开门，那个男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

“水就是从你们这层漏下去的。这下可好，把我妻子给累惨了。谁会想到早上一进门，所有文件都被水泡了啊。你还是来看一下吧，看了就知道了。”

女儿的哭声更大了。我顾不上那男人，退下楼梯用力去开房门。男人见状，慌忙从狭窄

的楼梯平台再退下一级。

我抱起哭得浑身发烫的女儿，对那男人说：

“漏水的原因肯定不在我的房间里，你能不能再去别处找找原因？我得去公司了，你要是有别的事，咱们晚上再说吧，我六点回来。”

没等那男人回话，我就把门从里面关上了。那人没再说什么，下楼去了。已经到了出门的时间。我用湿毛巾擦了擦女儿紧贴在我肩膀上那涨红的脸，断了吃早餐的念头，急急忙忙地出了门。担心再被那男人叫住，蹑手蹑脚地下了楼。事务所的门敞着，也许是在泄愤，屋里传出他斥责妻子的污言秽语。

三楼漏水这事，我几乎就没当回事。害得女儿连早饭也没吃上，要是平时，她会挥着小手高兴地跟我道别，可那天进了幼儿园，我每走近老师一步，女儿都哭得撕心裂肺的，浑身颤抖着紧紧地抱住我。最后不得不让两位老师一起硬把她领进屋去了我上班也迟到了。比起漏水的事，更让我恼火的是，好好的一个早晨被这件多余的事搅得乱七八糟。有再大的事，也不该跑到人家家里那么嚷嚷吧。我觉得那个男人做得实在是过分，可恨至极，早把夜里听到的那微弱的流水声忘得一干二净了。

雨，一定是在像自己的手触及不到的后背那样的地方继续下着，只真切地留下了遥远的水声的感触

那天中午，和往常一样，我和上司小林在图书馆面对面坐着，吃面包加牛奶的午餐。这时，丈夫藤野打来了电话。“找你的。”接了电话的小林若无其事地把话筒递给我。我说了声“不好意思”，接过话筒贴到耳边。话筒里传来藤野那再熟悉不过的、让我怀念的声音。但在感到“怀念”的那一瞬间，一股异样的愤怒也接踵而至。我想过，要是藤野跟我联系了，我不会因为女儿的存在使我俩的关系复杂化，我要云淡风轻地和他聊彼此的近况。至于为什么到最后是我提出来要跟他分手，当然连我自己也还没搞清楚自己的感情变化，但会试着寻找恰当的语言来解释。可是，真接到藤野的电话了，我却连像平时那样说话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我有点儿在意小林会听见，四年前我也从小林的手里接过一次藤野打来的电话。那时候，我俩刚刚开始同居，还没办结婚手续。忘记是什么内容的电话了，大概是商量晚上在哪儿碰头一起去外面吃饭的事。当时，还是学生的藤野领着大学的奖学金，同时拿着父母给的生活费，所以那是我们四年的人生活中经济最宽裕的一段时间，经常在外面吃饭。我对不用操心柴米油盐的新生活也很满足。那时和藤野通电话并没太在意小林是否听见。

可是，当我放下话筒时，小林抬头对我说了一句：

“要是能快点儿安顿下来就好了。”

我吃了一惊，脸有点儿发烫。一直以为埋头于整理资料和看书的小林，是个对自己助手的私生活漠不关心的老年人。这么说，迄今为止的通话，也都入了小林的耳朵？虽然我没跟他说过与藤野生活在一起了，但小林肯定什么都知道。现在一想，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在这之前，对于上司的这份牵挂，我竟浑然不觉。

“如果总是勉强自己会很累的，特别是你们女人……要善待自己哦。”

我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

小林以前在广播电视台做过播音员。我很奇怪，就他那副沙哑的嗓音怎么会？好像是受私生活方面什么事的影响，在做了近二十年的播音员之后，他开始辗转于台里的各个部门，最终被放在了作为分支部门新设的图书馆。这个六十多岁、态度冷淡又无精打采的老男人，却被电视台里的年轻人亲昵地称为“隐居先生”，喜欢和他一起消磨时间的人也不在少数。人们故意说些他不爱听的话，惹他板起面孔后又取笑他。从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听出来，小林过的单身生活。

被小林那么说过一次以后，我一方面很受用他对我的关心，另一方面又不愿接受他的同情，这让我在他面前的笑容多了起来。小林也常常在我当班的时候，约我出去喝咖啡，下班后带我去他存酒的酒吧喝酒。他跟我说：“你随时可以来这家酒吧。即便是女人，酒这玩意儿也得是想喝就喝的。”话虽如此，我也不可能和藤野去那家酒吧，所以除了跟小林一起去，我一个人没去过。跟小林并没有什么可以畅聊的话题，所以对我来说，小林对我好反倒成了我的负担。无论去哪儿，无论喝多少酒，小林总是板着脸，没再打听过我的私生活，我们说的都是些跟工作和书有关的话题。喝完酒他把我送到车站后，又会去另一条街别的酒吧接着喝。小林爱喝酒是出了名的。

我觉得小林约我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以至于我在和藤野正式成为夫妻的时候，最先想告诉的人不是母亲，而是小林。因赴小林的约而回家晚了的时候，藤野就会责备我：“你是

在愚弄我吧？”被他那么一说，我又觉得委屈，甚至有点儿记恨小林，怀疑他对我不怀好意。即便如此，我还是坚信我和藤野结婚，比谁都为我高兴的一定是小林。

当我告诉小林自己已经结婚，向他鞠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费心时，他苦笑着嘟囔了一句：“跟我没关系呀！”小林的反应仅此而已，可我有一种得到了他的祝福的感觉，笑着又鞠上一躬。

后来，我怀孕了，没再跟小林去过酒吧。我们习惯了在午休的时候，我除了自己吃的，也买来小林吃的面包和牛奶，两个人面对面地享用午餐。有时用我带来的手提式收音机听听音乐，或者用图书馆的磁带听听小林喜欢的老节目。有时会有带着盒饭来图书馆的人和我们共进午餐。女儿出生后，午餐时我也不管小林爱不爱听，经常给他讲婴儿有多可爱、多有趣，还给他看女儿的照片，也曾得意地告诉小林藤野留校工作了，絮絮叨叨地给他讲解藤野想作为终身事业来做的“新电影”。那次，小林也只是听到最后才说了句：“他要是能把自己的孩子拍成电影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小林，不可能没有察觉到从一年前开始，我的话慢慢少了，表情也开始变了。难得的午休时间，因为我要跑房屋中介，也不在馆里吃饭了，这更容易让小林察觉到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在告诉小林搬家的事时，我也没说我和藤野的现状。想起自己当初在他面前那副得意的样子，感到有点儿无地自容。

接过话筒的那一瞬间，我在心里埋怨藤野“怎么又往这儿打电话呀！”小林就在旁边听着，我该怎么回藤野的话呢。我告诉过自己，有话好好地跟藤野说，万一能破镜重圆，没有比那更好的了。可此时此刻，我却惊慌失措地竖起神经谴责起藤野来。现在可不是讲电话的时候，这样会功亏一篑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我一方面很受用他对我的关心，另一方面又不愿接受他的同情，这让我在他面前的笑容多了起来

“好久没见了。还好吗？女儿怎么样？新房子住着舒服吗？咱们是不是该见个面了？欸，你怎么不吭声？旁边有人是吗？哦，那就不勉强了。不过，总能说点儿能说的吧？这可是你丈夫的电话，即使被问起是谁打来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吧？你有没有在听啊？至少也‘嗯’一声嘛，连‘嗯’都懒得说吗？”

我充耳不闻地听藤野说了这么一通，压低嗓音冷冷地问：

“你到底有什么事？”

“哎……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没事儿就不能打电话了吗？”

“是的。再见……”

我把电话挂了。我没敢看小林，低头大口吃面包，最后喝牛奶的时候，抬起眼皮瞥了小林一眼，只见他一只手拿着汉堡，正在看早报。也许是出于对我工作单位的顾虑，藤野没再打电话把我叫出去，我能想象藤野会气成什么样，不禁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愕然，后悔起来。两腿在抖，喉咙深处疼得厉害。导致功亏一篑的不是藤野，是我。我意识到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把装牛奶和面包的纸袋拧成一团站起身来，小林对我说：

“不好意思，能给我来杯茶吗？今天嗓子有点儿发干。”

我终于抬起头来，尽可能地打起精神回了一句“好的”。

我去了屏风后面的厨房，用心地沏好了两人份的茶。腿还在抖。走到离小林的桌子还差一步的地方，脚底并没有被什么东西绊住，我却踉跄起来，手里托盘上的两个茶杯都掉在了地上。我的茶杯没碎，小林的那个大茶杯碎了。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我一边说着，一边蹲下身去捡茶杯的碎片。小林的茶杯摔成了两半。头上传来小林的声音。“小心别划着手，用抹布擦擦就好。”

“啊，好的。对不起，我这就去拿抹布。”

我顾不上直起身来，弓着腰跑进厨房。手里攥着抹布回到小林面前，蹲下身去把抹布盖在还冒着热气的地板上，茶水的余热瞬间传到了手掌。

“真看不出，你这茶杯还挺结实的。”

抬头一看，小林正一只手拿着我的茶杯，和桌子上的茶杯碎片比对着。那碎片应该是我刚才没来得及收拾，随手放那儿的。

“……对不起。”

“不用介意，反正这也是去寿司店时人家白给的。”

“哦……”

抹布里的热气在逐渐消失。我忽然想起早上的事，问小林：

“这水，会漏到楼下去吗？”

“怎么会？不会吧。这点儿水就漏的话，谁还敢住楼房呢。”

小林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那倒也是啊。”

我也笑着回了一句，看了看还湿着的铺有亚麻油毡的地面。拿抹布擦地时，突然眼泪涌出了眼眶。我怕被小林看见，便用左手揉着眼睛，蹲在那儿一遍又一遍地擦着。

过了一会儿，小林去洗手间了。我洗好抹布，收拾完茶杯碎片，开始做借阅卡。这时，早已过了午休的时间。

傍晚，比平时要稍早一些，小林对我说：“今天就到这儿吧，你可以回去了。”我也没再客气，离开了图书馆。女儿看见还没到接她的时间就出现在面前的妈妈，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在附近的店里买了点儿东西，回到了住处。刚一上楼，可能是听见了女儿尖声说话的声音，知道我们回来了，早上的那个男人立马出现在三楼，他身后站着负责管理这幢楼房的房屋中介。那男人的表情告诉我，他等我等得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强忍着想跑下楼梯逃到楼外的冲动，让女儿走在自己前面，一步步慢慢上了楼梯。女儿像只小狗，手脚并用地往楼上爬。

到了三楼的楼梯平台，房屋中介站到我面前，用自己瘦小的身体把那个怒气冲冲瞪着我的男人挡在身后。

“对不起啊……我们等您回来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先生让我打开您的房门，我跟他说，您应该很快就回来了，还是再等等吧。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在这儿等着……”

“明明说过‘刻不容缓’。”

那男人嘟囔了一句。房屋中介像是示意我不必介意那样，冲我笑了一下。

“水漏得挺厉害的，都漏到二楼了。又没下雨，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楼上。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能让我上楼看看吗？”

房屋中介是位清瘦的白发老人。我去交房费时，总能看到那个六十岁左右的女房东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两人看上去给人一种女主人和老管家的印象。这是位沉稳优雅的老人。

我把房屋中介和那男人带上了楼。今天早上看到的四楼楼梯平台上那一小摊积水，几乎已经溢满了整个平台，天花板的水渍也变大了，水滴正一滴接一滴，缓慢地滴落下来。

我让两个男人先在门口稍候，一个人进屋看了一下房间里的情况。和早上没有什么变化，耀眼的夕阳洒满了房间，仿佛置身于一片热气中。女儿高声唱着在幼儿园刚学的歌，寸步不离我左右。

我又去看了一眼卧室。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肯定没卧室的事，只是为了堵三楼男人的嘴才去看了一眼。结果，第一次在那间屋子的墙上找到了昨天没有注意到的很大一片水渍，而那面墙的另一侧正是楼梯。

一听我说卧室的墙上出现了水渍，三楼的那个男人立马摆出一副要进卧室的架势。

“对不起，卧室就别看了吧。你们去看一下楼顶吧，今早我没检查楼顶。”

我急忙将两个男人引向屋内的楼梯。一想到要被他们看到卧室里没叠的被褥，我便紧张得不得了。

浴室没问题。打开通往楼顶的那扇门，我第一个到了外面。眼前那异样的一幕，让我不由得惊叫起来。本该没有一滴水的楼顶，竟蓄满了波光粼粼的水，一汪清水弥漫了整个楼顶。

“大海！妈妈，这是大海！哇，太棒了，好大呀！”

本该没有一滴水的楼顶，竟蓄满了波光粼粼的水，一汪清水弥漫了整个楼顶。

女儿光着脚跳进了水里，一个人大笑着，脚踩手掬地玩起水来。水漫过了女儿的脚踝。我和两个男人想找到水源，来到了水塔前。只见水正从那儿大量地往外冒着，水量大得让人瞠目结舌。

“水从这儿流到那边，来不及从排水口排走，便漏到了楼下。也许是哪里有了裂缝吧，不过……这也太壮观了。”

三楼那男人好像被眼前的情景惊到了，表情反倒平静了下来。

“照这架势，楼下只是漏成那种程度，倒是值得庆幸了。”

“看把这孩子高兴的。”

“我孙子也可喜欢玩水了。”

两个男人眯着眼睛，出神地看着戏水的女儿。

“可是，你就住在这下面，总该听到些水声吧。”

被房屋中介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了昨晚听到的流水声。那缓缓的、遥远的声音。又重新回到我体内的那水声，让我有些猝不及防，浑身一阵发凉。

“这么说起来，的确是听到了……可起床一看是个大晴天，也就……”

“你说这事儿弄的。要是那个时候弄清楚了，就可以早点儿请人来修了。”

三楼的男人说。我语无伦次地道起歉来。

商量好第二天一大早找人来修水塔，两个男人就回去了。

那天夜里，我也光着脚，和女儿尽情地享受了楼顶那片“海”。虽说没什么危险，可置身在那么一大片水里，还是会感到不安，那种不安又引人兴奋。我和女儿在水中嬉戏、捉迷藏，玩成了两只落汤鸡。身上一湿，便感到有些冷。虽说白天已经很暖和了，但毕竟刚进入五月。

回到房间时，听见了刚刚停止的电话铃声，也许那铃声已经响了很长时间。藤野的脸便浮现眼前，但很快又被自己各种开心的样子取代了。那是终于可以和藤野生活在一起时的自己，也是喜不自禁地去区政府办结婚登记时的自己。仿佛还听到了在义无反顾地生下和藤野的孩子后，我问小林时自己的声音：“今后我必须对这一切负责吗？”我看到了点头的小林。同时周围出现了无数的人影，都不停地在点头。

一个多月过去了。在一个多月里，并没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即使发生了，身为我女儿的父亲和我丈夫的那个男人，也无从知晓。日子就这么四平八稳地流逝着。可就是这安稳的生活，却让我对未来越发充满了恐惧。我总是觉得眼前有一个扭曲、易碎的透明体，它毫无安定可言，却又不会倒下，不但不倒下，还试图扎根发芽。而能看见那个透明体的，只有我自己的两只眼睛。我意识到自己开始依恋出现在眼前的这个不安的透明体，否则，我与藤野将无法重新作为夫妻若无其事地见面。以丈夫自居的藤野对我说话的口吻，从一开始就让我别扭。可是只要藤野不主动切断与我的联系，今后我就不得不继续倾听他那遥远的、不明真意的声音吧。

决定分居的是藤野，即使那样，我也不能把他忘掉吗？我又一次看了看浮现在眼前那些人影，那些很像是我认识的人的人影，都在使劲地点着头。

那天夜里，耳畔也一直回响着水声。我被一种柔软湿润的感觉包裹着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水塔很快就修好了，快得让人不可思议。眼看着楼顶透明的积水不见了踪影，女儿和我一样感到遗憾，她在责备理工。

“不许你把水停了。真抠门，讨厌！”

两天后的周日，又花了一天的时间维修了楼顶。傍晚，听说施工结束了，我便想上去看一眼。因为被叮嘱过在完全干透之前不能上楼顶，所以在往楼顶去的楼梯上，我也反复地叮嘱了女儿。

打开门，比我先看到外面的女儿惊呼起来，那声音比看见“海”时还要兴奋。

“怎么了？”我随口问着，也看向楼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眼前是一片晃眼的银色，刺得眼睛生疼。我以为只是维修漏水的缝隙，没想到整个楼顶都涂了一层银色的防水漆。还是春天呢，就这么晃眼，要是到了盛夏，肯定无法直视这银色了。从此，这条街上出现了一片能灼伤眼睛的银色之海，而我们仿佛是漫步在雪原上的人，又像是漂流在海上的人。

银色的海。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景色也太绝了吧，而且这回，这片“海”是任何人也带不走的了。

“好美啊！像星星。”女儿完全被银色的屋顶吸引住了。

藤野的电话是在第二天夜里打来的。我的态度越发让他不高兴了，而我也只能这么做。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一听到藤野的声音，两条腿就发抖。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坐在一个银色星星形状的容器里。容器一点儿、一点儿地加快了旋转的速度，当我回过神来时，身体已经被惯性甩了出去，成了贴在墙上的一个扁片。“饶了我吧！”我这么一喊，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抬头看着我的星星容器说：“你怎么那么没用呢？”

说是我的同学，其实是个彼此连话都没怎么说过的优等生。她总会被选为班长，人长得也标致，身边从来不缺男友。这样一个人，现在居然出现在我的梦里，这事本身就很离谱。我一边想着，一边哭着为自己辩解：“就算你这么说，我，没用又怎么了？没用也一样有把我当成宝的人，真的啊，肯定有。”

那个同学一副难过的样子，摇着头走远了。还是昔日那个美丽的少女。



津岛佑子

走向世界文坛的日本女性作家代表，文豪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与津岛美知子的女儿。毕业于白百合女子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大学期间开始创作，获得了许多重量级日本文学奖项，如川端康成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大佛次郎奖、紫式部文学奖等，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津岛佑子以男性的“不在场”、人际关系的孤绝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真相为创作母体，擅长调度女性特有的感受力和视角，熟稔运用幻想与现实交织的手法，来揭示女性命运中难言的困局和独有的生命体验。不少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代表作包括《光之领地》《微笑的狼》《火之山：山猿记》《宠儿》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Max Zhang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温水煮青蛙， 是青蛙对温水的信任 | 邓小平的信徒⑤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秦先生的故事的第二部分。

最后那几年，秦先生过得并不是太好。管得人越来越多，探索尝试新媒体也不是太成功，领导觉得秦先生转型不力，想跨界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上面又觉得有风险。秦先生当时感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从体制内离开了。“但是你没离开过体制，已经在体制内做 25 年了，离开体制之后呢，从心理上来讲，你还是很失落的嘛，没有人睬你了嘛。”

“当时也有很多人来找你谈，”他提了几个处于不同互联网时代的大公司，“去那里干什么呢？也非常认真地给你 offer，谈深了之后发现也不是你想要的嘛。搞搞宣传啊，搞搞企业大学啊，写写书啊，你不是人家的创业者，你不是人家的一员，融入是有问题的。离已经离了，真正下一步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了虚空里的感觉。”

秦先生说天天也没有什么事，精神状态上就容易出问题，“如果说有危机的话，身心的角度，那一段是危机。”

“一个人体制里太长时间的话，体制里你有无穷的光环。我在体制里还是一个纯粹的管理干部，我有些专业，但是你离开真正的一线的东西之后，你还是像一个当官的。现在你发微信发邮件，没有人理你的。过去，天天都有人请你吃饭。”

“有一两个企业家我还挺在意的。其中有一个还直接跟我说，我觉得你现在没有在《南风窗》那时候状态好。他什么意思呢？”

“这个都无所谓，你会发现，离开你的平台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平台赋予你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所以那时候你能不慌吗？肯定慌的啊。”

“XXX 那里分分钟可以去，但对这种东西你也有怯懦感。你能把人家的客户端做出一个新模式啊？”

“我太太说，你什么也不干都可以，大不了去学校教个书也行啊。但是，”他很明显地停顿了一下，“你要真想教书，你都进不去。你不在他们那个发 paper 的体系里。你觉得你当老师挺容易，你以为你是个总编辑，就去当老师，没有，你去不了。”

“我精神有很大的危机，我儒家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这些东西左右我，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还是要求诸于己，在各种限定的条件中，要往前走嘛。”

在花木那次见面之前，我有四五年时间没见过秦先生。之前最后一次见他，他张罗着做自己的自媒体，我跟所有人一样，不是很理解，跟他说应该有更大平台做大事，但他执意要做自己的东西。事后想来，这可能正是他感觉到“慌”的时候。之后，各自忙各自的事，偶尔会有他的朋友写到他，跟时代已逝的焦虑捆绑在一起，他的文章偶尔也会被我看到，我照例觉得他四平八稳，他的“大视野”始终不是我喜欢的。

“大视野”下的“大环境”在这几年中，倒是变化剧烈。

贸易战了。新冠流行了。中国刚刚被全世界提防，全世界就被中国人嘲笑了。美国看起来不大像灯塔了。华为从一个电信设备商变成了悲情和反抗的化身。脱钩是个话题了。修昔底德陷阱了。塔西佗陷阱了。美国的地产商成了总统。中国的地产商成了囚犯。美国割裂了。中国修宪了。公知彻底成了贬义词。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了。大学生说买不起房子。年轻人对资本宣战。小粉红把手放在举报的按钮上。复旦的老师害怕说错话。他在乎的企业家说错了话，被罚了款，上市遥遥无期。他在乎的企业家在国外……

这些宏观领域里的每一个变化，都在考验着秦先生对中国路径的判断，考验着支撑他的两条路径的长期性。秦先生的大视野忙着去给各种人解释，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告诉大家中国如何走到今天以及——我们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放心吧，不会有问题是。

另一方面，那些跟年轻人有关的信息，秦先生并非不知道，但显然对程度所知不多。秦先生说他的同事体贴，总是告诫团队里的人，谁也不要后台里的负面评价跟秦老师讲，所以他可能接触暴戾之气的机会并不多。我给他讲种种新奇事，他往往会展开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穷在中国不是那么糟糕的问题，现在有这么高的平等诉求？难道仅仅是因为九〇后〇〇后买不起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子？”

“举报这东西是不可取的。举报意味着你不是在讨论问题，你是在利用另外一种力量屏蔽和扼杀你讨厌的对象。”他会评价一件事，但你会感觉他对他评价的人充溢着善意。

说到年轻人就业形势不好。他解释了半天“任何时候找工作都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像是突然想起来一样，“这些人不会把一时找不到工作当成国家这不行那不行的吧。我们现在比当初还是会好一些的吧？”他还是习惯于从公权力角度去切入问题。

说到年轻人“躺平”，试图去否定努力工作的价值。秦先生会说，这种抱怨恰好说明他们骨子里的价值标杆还是成功。

他突然笑起来，问：“所以现在写企业家的报道也是有风险的。”

我们各自有信息茧房。我因为成天搜罗其中信息，所以会有各种变化信息爆炸一样的感觉，充塞耳目；秦先生接触他的那个世界的人，经验老到，处乱不惊，即使惊也要喜怒不形于色，所以看着就要淡定很多。

秦先生自己说，要恪守中道。“我觉得呢，就是平衡。我是其中一直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要恪守中道。”他举胡先生与公知的例子，胡先生在公知还有充分表达机会的那个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平衡者出现，发挥历史作用，一味全是公知也是有危险的。不过，这不在他所能平衡的范围之内，“原来我觉得反公知的力量代表一种思考，是认真的，但现在看，完全失衡了，”他又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真是一个太悲惨的问题。”

当然，秦先生和他老成持重的同龄人们的淡定，语重心长劝说人们“不要担心，不要焦躁”——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历史这样过来，总是有解决方案，物极必返，不会怎么样。他们更乐观。他们有一些专门的词来表达不同程度的乐观。

“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

“以增量解决存量。”

“见到红灯绕着走，见到黄灯抢着走，见到绿灯往前走。”

“从全球范围来看……”

“历史地看……”

这是发展四十年对自己路径的信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今天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给社会示范的信息还是很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各种报告，它的光谱很宽。今天各种各样思想都在这个光谱范畴里各取所需，找更适应于他们心理状态的东西，依赖这个东西往前走。”不知不觉中，秦先生就大视野起来。

“我认为从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降低交易成本，这些人发生的作用更大，还是分不开的。你说国退民进啊，‘民营企业完成历史任务’这些说法，这些说法有没有？是有，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啊，比如说这次座谈会，”当时中央经济领导小组刚刚搞了一次座谈会，“九个专家发言，有些专家去了没有发言，但你看他们这十几个人的思想观点、逻辑背景，并没有几个真正很左的人，可能最左的就是林毅夫了。”

他还是习惯于用“左”和“右”来规范经济领域里的各种思路的争执。另外一个可能在事后隔很久才意识到：他忽略了专家们对风向的把握，以及他们也在不断变化当中。

“我认为没有说的那么悲观，我们也不能把我们读大学时形成的启蒙主义的基本框架试图一夜之间完成。就像美国，《独立宣言》所要求的权利，到1960年代才完全落实，是step by step，逻辑和现代化路径有多样性的。”

秦先生宽厚，是因为他经历过相对宽厚的时代，所以他始终会有期待。隔了一段时间，我才想起也许我该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过程如果无知无觉的话，你以为还是在step by step呢，实际上它只是一次经典的“温水煮青蛙”？

温水煮青蛙，归根结底是青蛙对温水的信任。

\*\*\*

2015年，秦先生迫不及待地把他的公众号自媒体推上线。“我当时为了防止任何的犹豫，一定要早，宁可早点弄，弄的话就天天有个事。”秦先生说那时他还有不安感，别人——跟他前后脚创业的前主编、媒体人们都开始做出点模样了，“从一开始，包括现在也有人说，你不该放弃啊，你该有更大的平台。我那个时候已经跌到谷底了，有地方有机会写字就不错了。”

秦先生说一直到现在，他“发自内心”觉得自己“走对了”。秦先生说他是用一篇一篇文章找到自己位置的。“我是用一篇一篇文章找到自己位置的。我现在写文章不是为了影响力了，我现在写文章都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或者说尽一点责任吧。”

刘易斯·卡罗尔那个红桃皇后的经典形象被前面那个时代的人反复引用。它甚至被叫做“红桃皇后定律”——一个人只有拼命奔跑，以保证自己留在原地。

秦先生那年47岁，即使功成名就，还是担心被甩下来。他对未来甚至不是担忧，而是恐惧。

“做公众号之前，其实你面对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公众号怎么搞我都不知道。”那是决定做公众号之后新的恐惧。

“在你真正离开（体制）之后，你首先想的是要恢复写作者的身份。”

“你毕竟是通过一点点文章，一点点建立起影响力，不断推陈出新，不是被拍死那种。你还要在若干个领域若干个层面上，建构起外部评价非常好的影响力嘛。”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企业家和政府做经济研究的学者专家，他们还是愿意跟你交流。过去他知道你是做媒体的谁谁，但他不知道你是一个写东西的人。现在呢，我真正变成一个创作者，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一个创业者。作为创业者我一篇一篇地写，对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些贡献。”

“这五年，是把这一关真正迈过去了。”

“不一定是往前走。真的不一定。其实，每个人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局限性在哪里。比如说，我现在感觉身体真的不如以前，晚上熬夜肯定是不行的。第二个是，你毕竟是你，我是偏经济和管理，从偏经济角度，你的经济学基础不扎实，管理上看，财务和金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财务是企业管理的真正语言，你有局限。第三个是新技术，不是在一一线跑出来的了解，都有局限性。我确实对几个行业是有一点了解的，那是当时在珠三角骑着单车坐着中巴一点点跑出来的。TCL、美的、碧桂园、万科看他们一步一步从很小的时候做起来，我对这些行业当然有了解。但现在有很多新行业，你对它了解，喔喔，了解程度是有限的，你根本就没采访过。你对他们模式不真正了解。”

“你说是不是有进步，也很难说。但是你毕竟，时代列车隆隆开动嘛，我们这些偏经世致用的，只能死死抓住这个列车，不能被它甩离。你核心还是要非常勤奋。”

“所以，我感觉其实尽量不被抛离，你写东西必须得给读者创造价值。你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观察，绕来绕去核心的价值还是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以述为作，尽可能多看些文献，尽量提供扎实的数据和理由。不是卖弄，不是口水啊，这个我其实，写篇文章还是满用心的。写个东西，中国知网上高频的论文要看几篇吧？涉及数据的，万得的数据要看吧？还有比较重要的研究报告。毕竟跟一般人的写作不一样。看的东西更扎实。”

“有很多思想想法，你有一些社交，你采访别人，你跟别人交流，获得一些信息。跟人有了真实的连接。过去我觉得后悔，过去见过很多人，基本上都是吃饭，广告部安排的，跟人讲媒体架构，一直在重复。不是学习。”

时代列车隆隆向前，经世致用者紧紧抓住。

“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爱丽丝说，“如果你以足够的速度奔跑一段时间的话，你一定会抵达另一个不同的地方。”

“现在，这里，你好好听着！”红桃皇后反驳道，“以你现在的速度你只能逗留原地。如果你要抵达另一个地方，你必须以双倍于现在的速度奔跑！”（《爱丽丝漫游奇境》）

\*\*\*

跟秦先生聊天时，有两段对话印象深刻。

第一段是我们各自的感慨。

秦先生说：“我听你们讲的这个东西，可能真的不存在我们觉得不可动摇的东西啊。

我这里接触得少，如果是这样，是这个基本倾向，那我觉得真正感觉是都变天了啊。”

我说：“你说这是未来的天，未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打击的对象。”

秦：“看来不是啊，我听你们讲的情况，一个是，我更加担心；另外一个是，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大家对这样的现象关注得也是太不够了。”

我：“我们启蒙主义者还是蛮傲慢的。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点上，启蒙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失败了。”

秦：“没有真正的倾听，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

另外一段是秦先生抛出来的问题。

他问：“你们的这个研究啊，假如说学者根据你们的研究，写个政策建议，从国家层面，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如果说做这样的报告，国家应该调整收入分配体制，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比如说啊，应该是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说，我从来没有站在国家那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它似乎也不是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



题图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剧照

## 非虚构 通往自由之路 | 邓小平的信徒⑥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是苏先生的故事。

2001年是苏先生最乐观的一年。有三件事让他感觉十年之内大势不可违。

“1999年不是南联盟轰炸大使馆吗？之后我看中央台不是很过激，稳住了。2000年底美国来了一个梳大背头的特使，不是巴舍夫斯基，大致跟美国达成了入世协议，2000年还有一个南海撞机事件，我们也忍下来了。这是背景，我说的2001年三件事是入世，奥运申办也成功了，还有一个9·11，中国表态支持反恐。当时特别乐观。”

2020年的9月，武汉那轮疫情结束不到半年，我们约在北京远洋未来广场的星巴克里，苏先生抱着一盒口罩，瞅准尽量不影响别人的位置，但是说到尽兴的地方，声音总是不由自主大起来。我们很担心吓到别人——后来他说好久没跟人这么痛快地聊天了。

我和苏先生相识已久，在他最乐观的2001年，他从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回到北京，我们在一家刚创刊不久的财经类周报成为同事。那时，我对苏先生的印象是博览群书，罕见的融会贯通；现在他是不多的始终如一坚持一种“批判”立场的人，经常会被有人说成充满“负能量”。

那天我们的主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觉得过去几十年里有哪些事是重要的”。他讲得最多的是八十年代。

当时有印象，还是很文雅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用的都是“善自珍摄”这样的词，当时根本看不懂这些东西。我觉得八十年代对外交往包括新闻联播还是以儒雅著称的，即使搞批判，那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看广播里面，窗子打开了，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会随着什么一起进来，听着还是有些涵养的。

广播里讲一个女的想穿花裙子，劳动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这个有印象，开始提倡消费了。

十三大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反对票，“这是我国民主生活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播音员声音都抖了，我们听着新闻也跟着心潮澎湃啊。

吏治比现在要严，渤海二号钻井平台我隐隐约约有印象，石油部长辞职，副总理是辞职还是记大过，那几年第出一个事总有一个部长辞职，丁关根，铁道部，在那之前还有一个大兴安岭山火，林业部长辞职。我当时小学四年级，八六年，农村割油菜，我回去帮我小姨家割油菜的时候，在地里，他们那个喇叭，就讲林业部长辞职。我印象特别清楚。

当年党代会开完了还没到人大，谁是新总理还没有选举，《参考消息》《文摘周报》还有这类新闻，有三个人开记者招待会，李鹏、田纪云、姚依林，李鹏做中间了，有港台记者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将要成为总理？”“为什么呢？”“因为你坐中间。”这样的话，那我跟纪云同志换一下。这感觉，耳濡目染，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很多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会对当年充满热情，苏先生也一样，他总结为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个“社会”之所以要打上引号，原因在于我们举的例子大部分并非来自“社会”，更多是来自政府——这或许算是一个隐喻：我们热情地回忆八十年代，锁定目标十有八九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政府。

1980年代的记忆主要由五〇后和六〇后来完成。苏先生出生于1972年或者1973年，八十年代对于他是在七八岁到十七八岁之间，标准的求学时间段，“你那时就是小学生中学生，你怎么会对八十年代这些公共事件这么熟悉？”

“我对公共事件的记忆，主要是有线广播，后来才有红灯，”有线广播，是中国乡村社会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主流配置，它会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档新闻，也会提醒集体化劳动的“社员”定时上工，也可以发放通知，它自己也可以放唱片，它的一个中枢是叫“广播站”的机构，它的终端是与广播站相连的若干个大喇叭，以覆盖某个“大队”；红灯是个收音机品牌，其家喻户晓程度基本上可以用来指代收音机这种产品，“广播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基本上有什么大事都知道。八四年有件大事，粮食，人均首次突破800斤。400斤不是个事儿吧？400公斤。我感觉到那一年可以敞开一点吃了，一星期至少可以吃一顿饺子。”

苏先生家在安徽阜阳，粮食问题肉眼可见，“饿是没饿过，但你看我们吃的杂粮很多啊。白面馍是个大事儿，小时候主粮是地瓜，我们那儿叫红芋，红芋稀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所以一见地瓜我就烧心。他小时候写作文，深谙八股，开篇都要提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别的同学写的就是回农村老家，农民家里也养猪了，粮食也满垛了，白面馍也多了，苏先生独辟蹊径，写肉馅，说以前回姥姥家吃饺子，饺子一煮就烂，为什么呢，因为肉少，容易散，后来一个是一个，因为肉多了。“老师表扬了。说我细腻哈哈哈。”

“你那时候有没有这种印象，每次写作文，开头总是有一个时间节点。我有印象头两次都是十二大召开以后。”他回过头来问我是否有这种经历。小时候老师教大家写作文确都如此，但于我来说，即使写了十二大召开以后，但十二大对我只是一堆毫无意义“按姓氏笔画为序”的人名排列组合。

“所以这算是对公共事件的感受训练？”

“我懂事比较早……”

“为什么你懂事比较早？”这才是关键，为什么信息单一靠着一个有线大喇叭的苏先生可以更早“懂事”？这几乎是我们这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我爸是爱看书的人，他在党校工作，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建什么的，具体教什么他并没有探究过，资料多，能看《参考消息》。我很早就打开眼界了吧。他是党校的老师，农民的孩子，上了当地的师范，之后分配到党校了。”

“他中规中矩，老派。老派的人有三种，一种是死忠的，比较可怕，文革的时候真会打砸抢，真革命；二是看得比较开，为自己想得多；第三种是我爸这种，看起来死忠，不害人，对很多东西很反感，但不会公开反对。”

“我爸就是，他在什么事情开始的时候，中央没有提出明确意见的时候，他不会流露自己的看法。多年政治训练出来的。我小时候听我妈说过，当年他反右的时候就不说话，他本能地觉得我党不会允许大鸣大放。他不是敏感性，而是从人性上，他觉得没有人会喜欢鼓励别人批评自己。肯定就是这样，有些人太理想主义，我爸不是死忠，就在这一点。真正的死忠派，党让我发表意见我肯定会发表意见，而且我还要动员别人发表意见。”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已经 38 岁了，那时候父子之间交流不是特别多。我小时候也挺叛逆的，当时社会氛围父子之间也没有太多交流。”

“那时候县城标配是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在农村还得种地。我跟着父亲在城里上学，母亲农忙时就得回去。暑假有时她过来，有时我们回老家。”这个“标配”也适用于秦先生，实际上秦先生老家的沈丘县大邢庄到苏先生老家界首相距不过二十几公里，虽然分属河南安徽两省。

苏先生的父亲是传统家庭中的父亲角色，不管琐碎的“闲事”，苏先生解释闲事，就是家里的事。他母亲当家。在苏先生看来，父亲跟着党，大体上也是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那时候党也是能引领一些新思潮的，感觉是往前走的。比如跳 Disco 啊，流行音乐啊，他是不大赞成的。学潮之类，他也能理解学生的动机，但肯定还是要听党中央的。”到 1989 年，大的公共事件发生，“他不会说学生胡闹，他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他觉得学生后面有力量。现在看，这也不能说错，政治角力嘛。本来就是如此，只是学生玩得不太溜，不考虑妥协。他们没做妥协的准备。”

“我哥哥姐姐，他们上了大学，我跟他们交流要多一点。”

某种意义上，哥哥姐姐谈论的话题，才是真正打开苏先生眼界的关键。“八七年，我姐我哥都在上大学。他们整天议论政治问题，”1986 年底安徽上海一些大学以“改善伙食”开始有一波学潮，最后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结束。“我哥在安徽大学，现在在我们那的党校，比较正统一点，1989 年我哥已经毕业了，我姐在北京读书。我姐写信回来，讲她对这事的看法。那时候她已经读研究生了。”

苏先生的讲述中，“当时”与“后来”交替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颇高，这毫无疑问说明了他的记忆有不断被放大的原因。“记忆”之所以“深刻”来自于不断被唤醒被重新塑造的过程，这与他持续的思考有关。“1980 年有两件事，一个是审判四人帮，另一个是给刘少奇平反。当时跟着大人去看纪录片，有印象，你后来回想这个事，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我党在不停纠偏纠错，另一面就是大部分人形成了一个印象，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你想刘少奇也是四人帮污蔑的，毛主席受骗了。它的话语逻辑自己就圆上了。”

“当时有个社论你记得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后查了一下，这篇文章并非社论，而是《人民日报》一篇调查性报道的名字，分为上下两篇，发表在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那时候我们认为红色高棉是好的，我们当时逻辑是红色高棉是相当于为西哈努克保驾护航的，越南把西哈努克赶走了，落荒而逃到咱们这儿了，后来又扶植了一个傀儡叫洪森，呵呵，那就是我们当时对地缘政治的理解。”

再晚几年，消除精神污染，批判《苦恋》，苏先生也有印象，他记得他父亲的同事说了一句话，“又要冰封大地的感觉”，他觉得这话说得文雅，这位父亲的同事除了“冰封大地”，还让苏先生“后来”刮目相看——“我很早就知道有梁实秋这个人，他有梁实秋的书，还真挺不容易的。我们那一代小时候哪里知道梁实秋周作人啊，他都有。”

“还有一点可能是小时候娱乐少，我还挺爱跟老人聊天的。”苏先生家所在的阜阳，中原腹地，淮海战役主战场，其实早在光复之后，此地国共双方拉锯战攻守互换多次，王鼎钧回忆录中有描写：

抗战胜利时，沦陷区民众“想中央，盼中央”，不在话下。“拉锯战”前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有两套班底，一套接待共军，一套接待国军。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军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军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听说有个乡公所，高悬蒋的肖像，同一相框的反面就是毛的肖像，若是忽然换了占领军，乡长可以立即把相框翻身。最后国军一败涂地，共产党“铁打的江山”，老百姓也只能有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也只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国民党假道并非因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才失去人民。

(《关山夺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



苏先生的祖父辈老人包括父辈大多亲历，他们所看到与经历的，或可视为“民间历史”，苏先生讲述之精彩与荒诞并不弱于王鼎钧。苏先生从此中微观层面上了解土改、淮海战役、支前、国共双方博弈与攻心战，宏观层面则简洁，是看历史的能力——如果分解开来，或者可以说是对史实的态度，如何判断真实与假相，对人之常情的理解，对鼓动性言论的免疫力。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在于“与老人聊天”本身。我们一定还记得新一代的工业党人郭星与爷爷之间交流的顺畅，“隔代”之间的信任，与面对父辈的叛逆，是心理学感兴趣的话题，毫无疑问的是，苏先生的年少时代，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如今苏先生对地缘政治、历史叙事的兴趣与关注、对“中国问题”的执念，以及种种成就，来自于他早期家庭影响。这其中包括父亲的职业和爱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三个子女两个硕士毕业一个本科毕业，哥哥姐姐的视野，周边亲戚、邻居——或者说活跃的民间思想共同作用在苏先生身上。

研究生毕业时我父亲去世了。那个时候有点了解他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小知识分子，小干部，我不是看不上他，中国这种人还是挺多的。他们是中国的稳定的中坚力量。我对后来的公务员这个队伍也不是很了解，我觉得我爸他们，父辈那一代，他们一辈子，被折腾得满惨的。但他们起点比较低，你知道我说起点低是什么意思吧？起点低就是他们对物质、对好东西也没有什么了解，一步一步听党的话，党能领导搞建设就挺好。他们那一代政治上能有啥追求，在他们看来，政治上有追求本身就是离经叛道。



题图来自 [zhang kaiyu](#) on Unsplash

第一，西德对于纳粹留毒没有清算干净，从阿登纳开始就是卡尔·施米特国家主义法学阴魂不散，还是以国家主义为先，然后再给老百姓一点好处都给收买了，老百姓没有真正的独立，然后又加上斯大林主义遗毒的东德，那德国还是贻害万年的害人精啊，坚决不能统一。后来统一了，回头看统一 10 年，他们这帮人还沾沾自喜，正是由于我们不遗余力的反对，才避免了统一后的糟粕，没有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我们会这么想吗？他们根本跟我们不是一个语境的。

我觉得中国人一般过不了民族主义这一关，倒不见得会民粹，既得利益者不会太民粹。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就那个劲始终没过来。就我们需要打一遍别人或者被人彻底打趴下。



## 非虚构

# 一个知识分子 在他的家庭里 | 邓小平的信徒⑦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是苏先生的故事的第二部分。

家庭是苏先生打开世界的一个开始。他理解了他的父亲，他也会有点惋惜地说到哥哥姐姐，“世俗化了”。

他解释世俗化更像是一种妥协，“就是不那么激扬慷慨，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路愤青到底”。哥哥毕业在党校，现在已经是个老共产党员了，看不得权贵特权，也看不得“左”的那一套，比较“纯正”，让他儿子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要做贪官污吏。姐姐在北外念了七年书，没进外交部，一直在外企，肯定是自由派国际派，也很既得利益，所以不会说什么，更不会公共表达。“所以何以见得是自由派呢？”“八十年代真正读过几本书的人，基本上都是自由派。”我并不像苏先生以为的那么乐观。

我们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话题。

我们跟苏联东欧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我们很早以前聊过，很多情况是先公共再知识分子，先有话语权了，再补知识分子的课。西欧知识分子不一样，哈维尔他们也不一样。

西欧知识分子各有分工，细腻化运作，公共话题得有人关注，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得有一个空间，不能全去谈现代性。有个德国人，叫扬·维尔纳·米勒，有本书《什么叫民粹主义》，《危险的心灵》写卡尔·施米特，《另一个国度》太牛逼了，你就觉得什么真正叫“后民族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

他们当时德国左派，就是 1990 年，不是两德要统一么，他们坚决反对。两条理由，

八九之后，知识分子选择稳妥，快容易出问题。你也可以理解成是知识分子被收买，比如下海就是一种，搞市场经济去了。当时有观点，中产阶级成长壮大自然会形成社会中坚力量，到时候顺水推舟，好像可以水到渠成，知识分子有点懈怠。而且，我们都开始挣钱了，再回计划经济也没有可能啊。

（中产阶级之后）还有了一种侥幸心理。三个事。乙肝怎么能歧视呢？这是人权。人权要说个人的权利，你可不要公开地提人权，人家上面说了人权就是发展权。第二个是小区自治，从自我做起。第三个呢是司法要独立，当时上面也提，结果不了了之。这就是侥幸心理。小区自治了，不就自治了吗？乙肝患者的权益保护了，我们的所有权益不就都有保护了吗？我们过分注重了自治权和产权，产权到位了，他能奈我何？我们那时候，就不敢正面去突破这个东西，不敢面对真正的问题。

那时候还有王朔，解构集权主义，时时刻刻要颠覆权威和各种“崇高”。典型的人物是方文他爸爸，“一辈子都在讲爬雪山过草地，好长时间没讲这套磕了吧？”“一辈子连家具都编着单位的号”，这是一个场景。另一个是他爸一回家就赶紧听广播，他就说，你这就是假装关心国家大事，躲避劳动，让我们干活给你做饭吃。

知识界对“痞子文化”的批判是当年的一个大事件，后来还有二张，张炜和张承志，他们觉得东部阴郁、洋奴，洋买卖。中国的根基在阳刚的西部，也是一种很鲜明的态度。现在想想，多少公共事件都湮没无闻了。

王朔解构了很多东西，比如你折腾爱国主义就又搞到文革去了，所以你不能反市场经济。

苏先生从爱国主义到“不能反市场经济”这个转折就跟中国诸多事情一样，中间存在着一些诡异的逻辑。事后梳理一下，因为对借神圣之名而行残酷之事的警惕，所以要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超然的态度中包括了如王朔对崇高的解构，这其中也包括去市场经济大潮中赚钱。作家阿城总结，“八四年后，世俗间自为的余地渐渐出现，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私人做生意就好像官家恢复科举，有能力的人当然要去试一试。写小说的人少了，正是自为的世俗空间开始出现，从世俗的角度看就是中国开始移向正常”。阿城又说：“1984 年我和几个朋友退职到社会上搞私人公司，当时允许个体户了，我也要透口气。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就被 1950 年代就离休的父亲骂，说老子当年脑瓜掖在裤腰带上为你们打下了新中国，你还要什么？你还自由得有边没边？我这个朋友还嘴，说您当年不满意国民党，您可以跑江西跑陕北，我现在能往哪儿跑？我不就是做个小买卖吗？自由什么了？我听了真觉得掷地有声。我从七八岁就处于进退不得，其中的尴尬，想起来也真是有意思。长大一些之后，就一直捉摸为什么退不了，为什么无处退，念自己幼小无知，当然捉摸不清。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

了一个可以自为的世俗空间。”这是其中关联。

为王朔辩护的另外一名作家是王蒙，他说：“我们必然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我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是王朔！”在后来被认为是以京派与海派知识界的争论中，因为王蒙说得直接，王蒙与王朔被称为“二王”，王蒙还说：“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对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

如此，大约可以看出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为什么拥抱自由市场经济这个通常接近于“右派”的主张，在中国被知识分子引为同道。

之所以重要，它还形成了一种随时解构的风气，对于通常很严肃的知识分子来说，有这样一种缓冲未尝不是增强自嘲能力的一个路径，但它与玩世不恭相关性确实过于接近了。它的影响不可小觑，实际上我们担心在星巴克里过于慷慨激昂招人侧目，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这种担忧：你看这几个人，假模假式的，还把自己当回事了。这是王朔遗风的一种。

苏先生严肃思考中国命运的同时，也会随时解构自己：“我没什么追求，顶多说愿景。追求你得付出实际行动。我觉得自由还是民主，毋庸置疑，首先是民主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你连选票都没有，你怎么授权呢。不用说天赋人权，从小看的历史书，你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你看法国大革命，它也要说，得经过我们同意。”

萧先生在说到法治、民主、自由时，把自由与法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民主相对次要一些。苏先生认为民主更重要，这或许就是英式经验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差异，或许也不代表什么。与我们交流的这四位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点是家国情怀，都想着要给中国的未来提供一个答案。各有各的担忧，这其中，萧先生与苏先生毫无疑问都会被称作“自由派”，而且是历久弥坚类型的自由派，但在很核心的问题上，也各有主张。因为问题很多，中国很大，而且问题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

我们没想到很多事情会变化，谁知道全球化会终结？谁知道民粹和民族主义的声音被互联网放大这么显著？而且这些东西会一块来。

“我的同学啊，大学同学。我们当年学英语，虽然发音不准，他在省内也是外贸系统的。后来去深圳开公司，现在在深圳买五套房，既得利益者，现在巨恨美国，并且他当年发家就是靠给美国人卖电子产品。”

“你了解他为什么靠美国发家反而会恨美国吗？”

“我们学英语的时候，有同学确实是一种折磨，他上学的时候就玩中国范，易经八卦，他就通过这些方式增加存在感，我感觉是他把学英语过程中受到的各种挫折都转化成了对美国人的恨吧？后来跟美国人做生意，可能把对甲方的恨都变成了对美国的恨。”苏先生很快又回到宏观，“从小脑子就给洗的板儿似的，这个不怪他们。其实我觉得我们才是小众。”

“你刚才还在说，八十年代读过几本书的人，基本上都是自由派。”

他未置可否。

知识分子话题从八十年代的眼前一亮过渡到下半程。

\*\*\*

2001年，苏先生和我所在的这家周报做了“入世元年”的特别报道，正儿八经地拥抱全球化。没隔多长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忧虑能不能称职做好“世界工厂”的问题了。同样没隔多久，我们发现关于经济担忧最多的问题不是经济下滑，而是经济过热。我们转过来关心血汗工厂太多的问题，城市化进程当中是不是对农民不太好的问题。房价正式地成了一个问题了。

互联网主要是在电脑上，主要是精英在用，媒体最后的十年好光景，芸芸众生对媒体还是仰慕的。

“那时候媒体有两股力量，一个是人权派，讲案例，环保啊、普世价值这些；另外一个是市场派，以全球采方为准，商业文明，市场文明公开公正，商业文明代表有别于暴力革命。”

“这东西经不起2008年一场折腾，最主要的是两个事情。一是雪灾，让我们意识

到很多问题，继而开始看发展当中掩盖的问题，医改失败，国企改革已经开始反弹，没有节制的改革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没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存在，雪灾让你发现政府动员机制很强，然后更大灾难，地震，地震反倒是让大家有一些乐观的预期，有人说震出一个新中国，主要是说当年社会有很宽松的空间，在地震时发动社会救灾，而且起到了作用；2008年另一个大事是还有家乐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民族主义开始凝聚力量了。算三件事也可以，那一年金融危机开始发酵，在我们这里产生影响要到2009年了。到2009年，西方跌了一跤，风景这边独好了。回过头看，2008年是个转折点。”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了。公知被污名化，宪政也被污名化。从打击大V开始，嫖娼、整肃微博是第一批。苏先生提到这些众所周知的事件，大都发生在2012年之后，回过头去看，2008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它的铺垫和酝酿，还是要从2001年开始。

再早就要在2001年，开始酝酿一种语境，最大的败笔也在那个时候埋伏下来了，就是罔顾中国现实，盲目对标美国。有几个概念显然是搞不到一起去。首先我们那时候采访到GE（美国通用电气）之类的全球跨国公司兴高采烈，谁采访一个雷石东，激动得要死，不用说巴菲特了，微软做专访都是很牛逼的事情；另一面呢，大家还推动中国的扒粪运动，期望由扒粪社会进入到进步社会，“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资本和民主之间是对冲的，资本和扒粪之间更是对冲的。其实在西方，采访比尔·盖茨的人和写扒粪运动文章的人是两伙人，我们居然天衣无缝地把它们融为一体并行不悖。咱们觉得西方的财团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我有一个诛心之论，2008年其实还隐含了一个公知界和全球化破产的元年。2008年之前你采访亨利·保尔森，同时大谈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全球化，三位一体，全无违和。金融为什么自由化呢？金融自由化意味着财阀控制的终结，要批判东亚资本主义。我们要健康的资本主义，要透明化的资本主义，金融透明化的资本主义。你看他们自由化之后，资本放松管制，我们一直在推这个事情，信息自由化导致金融自由化，导致民智大开，导致什么什么……三位一体啊，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再加上扒粪，一个人身上可以达到完美闭环。可能吗？

2008年发现了，金融还是贪婪，资本主义还是贪婪，各种CDS信贷违约调换什么的，这些都是空对空啊，一下子就污名化了。

所以才有“我们一直跟着老师学，没想到老师掉沟里去了”那句著名的话。

在那之前，自由派多简单粗暴啊。政府就是傻逼，不能说任何产业政策，美国有产业政策跟我们不一样。你们就应该看《国富论》，“无形的手”能解决一切。

2005年有一拨市场化医改的讨论。那时候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看出“伪市场化”来的，这实际上已经是污名化市场化的观点了。顾雏军、郎咸平的争论也是在那个时候。

2008年除了隐含的公知和全球化的破产。这一年还有一件事是大政府、大央企要回头了。那时候我在一家新闻周刊，做一个选题，“山东再国有化”，山东今天的没落就是那时候埋下的伏笔。你会看到，那时候市场经济开始往回调了。那还是胡温时代呢。

“最大的失误是，没有一个正常的制衡机制，怎么左右摇摆，没有正常掰回来的机制。你得承认确实有权贵资本主义，老百姓得利不多，包括各种市场化产生弊端都有，我们最大的失误是不能反对，我们只能说好的一面。”苏先生说到了美国1890年的狂飙突进，大资本家——卡耐基、洛克菲勒、J.P.摩根——呼风唤雨缔造美国工业基础的时候，也是美国民粹主义最有力量的时候，它的代表人物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民粹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Populism，他就是农民，小农，你觉得他可能是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力。布赖恩，后来也是民主党候选人，他就给掰过去了，他这么掰一掰还是好一些，至少别在一条路上走到黑，听不到这些人的呼声，这是危险的。”

有一个话语失误，也值得反思。我们为了证明改革开放市场化的有效性，也过于把前三十年污名化了。中国农业发展不光是包产到户释放生产力的结果，小农经济当然有刺激作用，但粮食开始增产是从化肥工业开始的，它与“四三方案”有密切关联（“四三方案”是指1973年中国引进技术的一个计划：“……建议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26个项目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大

型项目”，通称“四三方案”。中国的粮食问题和穿衣问题都依赖这次项目引进而摆脱困境）。

后来发现只要你说过谎，你的话语权就会有缺陷。有人就会说，中国的农业，包产到户，难道不是我们的机械化到了一定水平吗？小农确实不经济，但后来市场化，中国开始世界工厂了，解决了这个问题。要不是这一把，中国农业还是走不出来。世界工厂了，农民出来打工，第一个是计划生育的民间矛盾少了很多，一出去打工，没能力生了；第二个是农田问题，出去打工，就转包，转包就是规模化。我们阜阳那儿没什么人种地，播种机脱粒机，你给他一百块钱，就搞定了。回到小农经济得失，你不争论，连粮食怎么增产都说不明白，更没办法真正建立起改革开放的正面论述。

“所以小粉红们对方方不满是有道理的。”我们接过这个话，“我们其实应该仔细思考一下方方说别人‘极左’的时候，她是在评论一个人的政治光谱，还是引进这个词作为一个‘棍子’打向谁。”

苏先生想起另外一件事：“我们确实有这个问题。当年关于市场和非市场化争论的时候，也没有正常讨论空间。一定要相互污名化，然后摆在老大面前表态，实际上就是让老大来打棍子。”苏先生提到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这位老先生把所有反对市场化的人都说成左派，说他们想回到计划经济那一套。“你不能说市场经济任何不好，在他那里这中间没有光谱。引起上面干预，这种心理很正常很普遍。”

苏先生说了几个他的同行的名字，“我们老中青三代公知，指望不上，党同伐异，特别狭隘。我觉得有些人已经很不错了，理性，懂得妥协，他体制内的高级干部你能让让他怎么样呢？但我们公知觉得不行，说人家无病呻吟，本身没有任何公共探讨空间。互相污名化解决不了问题，你全是道德正义成天想着绑架别人，也行不通啊！”

\*\*\*

2001年前后，对于苏先生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前一年，苏先生有了一个儿子。

2020年，他的儿子在海外读大学。

“我是比较典型的丧偶式教育，大部分都是他妈妈在管，最后形成了精神叛逆。”

“他不像我小时候，他不爱跟老人聊天，也不爱跟我聊。”

“他们一代，好幼儿园随便上，小学也都随便挑。相对来说，没什么规划。”

“也没什么预期。太太也没有。”

“在北京你给他弄套房子的话，就不需要什么，其它随便弄弄。肯定给他弄一套。

我们现在住的给他，我们还有别地方住。”

“北京都有这个意识吧。不用自己奋斗。”

“他第一次反驳我，我说反法西斯战争还要搞个阅兵，劳民伤财啊。他说我们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我们以前的作用没有被西方充分认识到啊。而且，阅兵也是阶段性检阅强军的成果啊。”

“我当时就觉得这不是他的观点，他从网上看到的。”

“我没生气，也没伤心。我想到我们同学。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说法，他们看到的说法都是我们的说法。”

“他们突然用了别人那儿来的一套说法。那种快感，翻身农奴得解放，而且都是国师级的，张维为说了，你比张维为牛逼吗？”

“我儿子看我是一个偏激的知识分子。我爸挺反动的。”

“小孩都有这个时期吧。精神上到一定时候，自我身份认同是通过打倒父亲，或与父亲做切割来完成的。”

“我没有刻意跟他讲过什么。你经常看的这些东西。我经常谈论一些时事。吃饭的时候，看客厅，聊天，看新闻的时候。说一些事情。我就不停地给他纠偏。”

“可能我总是纠偏。这个东西可能不能太过了，我可能太激愤了。他到后来可能就有反感。我就成了恨国党。”

“我自觉不自觉地会表达，你的见识太浅薄了。他会觉得你有精英意识。”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循循善诱一点，应该不会那么激愤。我确实看不惯。”

“高中之后交流少了。本身我也是被动的，以前他会找我。我对我儿子什么政治倾向无所谓。我不会主动去说别人，包括我儿子。”

“他们可能更玩世不恭而已。反抗，我觉得，期待别人反抗，这都是不道德的。”

“再说大势如此，他变成这个样子还安全一点。哈哈哈。我不愿意他太另类。”

“我当然觉得我们是正常人，但你从他们角度来讲，就是他们正常。”

“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清醒。他们连清醒都没做到。我的乐观是他们以后有清醒的机会。”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Mohammad Ali Mohtashami](#)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一个精英家庭和它的教育问题①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是出生于 2001 年的柴子亮的故事。

柴子亮爱琢磨事儿。八天里先后进入到他思考范畴的至少有如下内容：

文昌这个地方房地产泡沫很严重，很多房子都没人住，晚上看灯光，也太不景气了。入住率能有 10%？

这些房子看起来就是为了旅游者准备的，他们好像又不知道有火箭发射，并没有涨价。是信息太闭塞了吗？

买房的是什么人呢？外地炒房的人？这里连个海滩都没有，虽然就在海边。这是被骗了？

只是为旅游者服务，连个正经生鲜超市都没有。

饭店里吃的东西还是本地口味为主，饭店可能单纯靠旅游者也活不下去。所以到底是给什么人服务的呢？

本地有很多吃起来很酸的东西，是因为太闷太热吗？不吃点爽口的东西人们会受不了？

女生不爱摄影。她们只喜欢拍人像。

她们嫌走路累，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家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紫外线太强了。

女生不喜欢看火箭发射这些很重工的东西……

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国在海南文昌发射了一枚火箭，这枚火箭搭载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日月安属，列星安陈？”新华社的专题报道以屈原《天问》中一句诗开头。大约在 10 个月以后，祝融号火星车开始在火星表面上工作。

对于柴子亮来说，这是对他所一直信赖的东西的一次检阅。他喜欢蒸汽朋克，喜欢看《铁西区》这样的大工业题材，喜欢研究修昔底德陷阱，在知乎上研究入关学，

相信只有工业才会创造真正的财富……这些认知在网络上很容易获得共鸣，他们被称为工业党人。当一个国家有能力发射探测器到火星，被认为是综合工业实力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最直接的证明。

柴子亮出现在发射现场五六公里之外的民宿中再正常不过，他专程而来。

柴子亮是我们最早采访的几个人之一，最初我们对在哪里找这样一群人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听别人说有一个项目需要志愿者，他就来了。我们认识他早于他的父母。

柴子亮出生在 2001 年，柴博士的儿子，华中科技大学临床医学的学生，大一，2020 年上半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上海家中上网课。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很认真地准备了我们事先发过去的问题，几乎是一份书面的自我说明。

我爸爸〇几年就退休了，研究周易玄学什么的，现在自己有一个咨询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主要靠他以前的人脉。他以前是阿尔斯通上海这边的总裁，还经常给人上 MBA 和 EMBA 的课，他那公司其实就五六个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待在办公室里。他不是那种百度上有百科的那种名人，但在网上总归能找到他以前的一些采访报道，还有天眼查。

我想知道我们家的实际收入和收入来源嘛。我很喜欢查东西啊，我女朋友的名字，手机号，输入手机号会查到很多东西。你们说年轻人很容易被贴标签，其实各种各样的标签如果交叉集中起来也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属性，比如你看微博标记了一些高中的信息，再看这个人的其他地方标记了大学的信息，那你就很容易知道这个人是谁。网上的性格也是真实性格的一种映射吧，他肯定有某一种倾向，网络上表达更集中一些。

我平时上网主要看知乎，之前上贴吧，后来贴吧散了。主要是看，不怎么提问和回答。其实在用知乎的时候我知道得很清楚，什么时候是在消遣，什么时候自己是把它当工具。当成工具主要是看一些经验，学习知识，都是主动检索；消遣的时候就是知乎首页推给我什么我就看什么，刷头条嘛，跟我看抖音一样。看新闻的话，我会用微博，不会关注谁，就是看热搜上新闻排行。

业余爱好打泰拳，高一时开始的。本来我自学格斗，就是痴迷网络小说嘛，网络文学也可以算一个爱好。我很多阅读都是从网络小说来的，所有的文学网站我都看。我爸爸的朋友里有阅文的高管，就会给我一些账号，可以看很多小说，还帮我要过唐家三少的签名。网络小说里就是打打打这种，我那时候比较中二，就自学格斗。然后我爸爸说这个可以系统一点，就给我报了泰拳的班。

网络文学里有一些东西其实对我认识世界很有帮助。有一部小说叫《手术直播间》，作者本人就是医生，手术描写特别专业，我很喜欢看那个，然后美剧里有个《豪斯医生》，你知道吗？我也看。

那个时候进入我的职业方向筛选名单里有三个东西，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学金融，还有一个是生物学或者生态学。我看我爸妈的一些朋友，学金融的人什么背景的都有，就觉得这个东西的门槛极低；学医的话可以随便转生物或者生态学的，但是反过来不可以。因为你只有学医才能拿到行医执照。学医还是一个很硬的门槛。你知道冯唐先生吧？他就是学医之后再去做金融的，还能写小说。所以我觉得应该先学医。

对学医感兴趣是因为从小对生物和人体感兴趣。我养过特别多的宠物，好几条狗好几只猫，乌龟，蛇，蜥蜴，蜘蛛，蜜袋鼯。我养的都是陆地动物，养水族太费事了，而且资金投入也比较大。光是硬件水族箱，氧气设备，海洋模拟器什么的就很多。我养这些动物都是用零花钱养的。

我家不是固定给零花钱的，就是你需要花什么钱，那就拿着你的项目去找爸妈批，你得写一个报告告诉他们这是什么，为什么你需要这笔钱，你打算是怎么花的，对别人的影响什么的（商业计划书？）对对，就是这个。我就是这样开始买的。

我养的第一个动物是一条狗，农村带来的，小学 2 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的狗和猫都是流浪动物，没有买的。

第一个买的是蛇。初二。因为帅啊！王蛇，墨西哥黑王，600 块钱，60cm，后来繁殖过两次。就是我又买了一条王蛇跟他配嘛，生了蛋也都孵化了。

我最多的时候养过十几条蛇，十几条蜥蜴，七八只龟，我养的都是陆龟，几只蝎子，还有蜈蚣和蜘蛛。以及为以上服务的动物一箱小白鼠，杜比亚蟑螂，然后还有猫和狗。

我觉得他们不算是宠物，因为没有产生什么感情，都是冷血动物。只有我买的第

一条蛇叫小黑。其他的都是用学名+阿尔法，贝塔这样，关系特别亲密才会叫“小黑”。我的老师就说我有研究生物的天赋，因为我没有投射太多的情感。我在养这些动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观察，看他们捕食什么的，死了以后会解剖分析死因。

解剖过一只龟，发现是尿路结石。可能是因为过于干燥，我觉得它应该生活在干燥的环境里，上海毕竟还是潮嘛，但是可能干燥系数调过了，所以还是死了。

除了我买的第一条蛇，我都没有花过我爸妈的钱的。都是以卖养买。我在云山路花鸟市场有一些固定的交易对象，有一次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卖我东西的一个店主因为违反保护野生动物法被判了刑，后来我就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大概是高二时候吧。

最初买这些，是从贴吧啊，线上交易和面交，而且你知道爬行动物很适合快递的，特别是乌龟，冬天的时候就跟一块石头一样。贴吧太神奇了，我跟你说早期的时候巨多大神，就有的大哥你看着说话特别粗糙，但是一开口就特别有料。我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见识到不少人，什么样的人都有。贴吧没落之后就再也没出想过这样的平台。知乎和贴吧比还是差太远了。我觉得贴吧承载了最早的互联网分享精神，我至少赶上过这个时期。后来的社交网络都想着变现，也没有贴吧这样的神奇地方了。

我家有电脑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手机是在六年级，我有自己的电脑要到高中了。其实我不怎么用电脑，没有什么需求，后来买过一个游戏本，叫玩家国度，是我上高中时候的礼物。我爸妈就问我想要什么，我就说想要这个。

我现在的兴趣啊？解剖人的意识和身体，从生物学角度想要了解，那就是神经科学嘛，然后想知道人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有些问题困扰我蛮久的，比如本性和天性，应该是放纵还是克制的问题。比如说我练泰拳，教练要求一拳打到你眼前的时候（突然比划了一个拳头过来）不能闭眼，那闭眼是人的本能，理论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是拳击是要求你违背自己的本能的，因为闭眼你就没办法看见对手的出拳了。这件事要如何去考虑呢？

我对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都感兴趣，后来觉得做一个医生，可以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有天赋，家庭条件也不错，从小到大老师对我也挺好，我应该帮助别人。

我学医还有部分是因为我尊敬白求恩先生，我觉得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没有办法想象有人会承受那么多辛苦然后去帮助别人。

我读的是五年制本科，现在没有本硕连读了，要么就是八年本硕博连读。而且我知道学医是一个地域性很严重的学科，你在哪里读书，你的导师在哪里，可能就决定了你今后的职业走向。我是在知乎上看到的，我也会向我爸妈的一些医生朋友请教。

去武汉是因为高三的时候谈了一个恋爱。高三时每个人都忙，没有人有时间跟我说话，我就有点烦，有一次考数学的时候她坐在我前面，短发，很飒爽，很英气，我就要了她的微信。她去了武汉大学，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同一个地方，就报了华中科技大学，结果她一过去就把我甩了。

不过，他因此爱上了武汉。

我们再见到他，他刚从海南回来。我们跟他说在他去海南的时候，找了他妈妈聊天，他妈妈说他贪玩，但懂事，因为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她接到柴子亮从海南打回来的电话，说给家里寄了一箱椰子，在上海卖十来块钱一斤，但在海南十块钱三个，很便宜。妈妈说前几天在免税店里还打电话给她，问她要不要买点什么，她说你又不懂，就算了。

“我们从上海走的有三个人，都不是同学。男孩比我大一届还是两届，以前去尼泊尔玩的时候认识的团友。华二（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学生，没考好，没考好的意思就是没上交大复旦，只上了上海的一个普通的大学。还有一个学姐，她是摄影师，她张罗，问我去不去。”

“我对摄影没有兴趣，对火箭发射也没有太大兴趣，但一起去会很便宜。就答应了。”

“主要是两拨人，玩摄影的是一拨人，我一个海南朋友，一个武汉的朋友，还有一个海南医学院的同学，我们是一拨人。他们摄影很专业，是纯摄影玩家，他们早睡早起，找机位，太阳落山才回去。拍的照片是可以换钱的那种。”

“我们就是度假模式，每天生活一样。下午两点钟起来，做早饭，然后打牌，六七点钟出去散个步，或者叫外卖，然后回来再打牌，到四点钟睡觉。避开白天。”

“凌晨我们也会出去，在海边。没有海滨浴场，就是散步，但他们嫌累，所以只好打牌。”

“前四天在文昌，住的别墅，七个人三个房间，两个浴室，两百多一个晚上。后两天在三亚希尔顿，最后两天在海口，住在我的海南的朋友的房子里。”

“发射，在中午，我们离发射地点五六公里，不到十公里。声音超级响，嗡嗡嗡地响。”

对于柴子亮来说，这是生活中一次例行的正常的旅行。他妈妈说子亮就是跟她讲，想去看看火星探测器发射，讲一通火星发射的意义以及他对此的理解，其实不讲也没有什么；她一般会例行问一下他都有什么人去，大约花多少钱，他说一个数，在他的压岁钱数额之内，就同意。钱不会是个问题。偶尔柴子亮会耍个小心眼，这边跟妈妈要完钱再去跟爸爸要一点，或者相反，他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来说，这些生活里的小把戏，更多会被当成事后的笑料。

柴子亮用登陆火星来诠释这次旅行的重要性，得到了他爸爸的首肯。柴博士从家国天下的格局来评价：国之重器，亲历其中（虽然离了五六公里），值得；他要去旅游，对家里提要求，潜意识里认为父母都会同意，说明对这个家庭有信心。

父母都说到了“自由成长”。

“你说对发射并没有多大兴趣？”我们注意到他谈话间好像说到这个事。

“也还挺有兴趣的。发射本身没有那么多兴趣，你知道火星探测器的意义，你还知道中国现在火箭发射成功系数，你不会那么倒计时那种激动的。”他想了想，“可能相对于在海里游泳来说，我兴趣没有那么大吧。我到海南是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我从小就在海边游泳。”

我想起柴博士的童年，还有柴博士家庭的水上生涯，这些并不奇怪。

“你这是第一次去海南吗？”

“六岁时来过一次。”这勾起了他的记忆和他独特的思考。

“六岁去过海南，但什么也不记得。柴博士有一次自夸，说自己两岁的记忆都保留着，但他儿子六岁的事都不记得，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吧，“我能记得一些感觉，记得有潜水，做梦会梦到这感觉。但你不记得整个过程，不记得你去过哪里，什么时候去的，都不记得。”

“两岁的时候看过一场赛车比赛，”他继续沉浸在关于对记忆的理解中，“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有时候梦里会出现，在梦里，赛车都在天上飞。这说明小孩看到的世界和实际的世界有偏差。但我确实记得这场比赛。非常片断，非常模糊的记忆。”

“我爸带我去的。”

\*\*\*

那场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的具体时间在 2004 年的 9 月 26 日。我记得那场比赛。

我记得每个看完比赛回来的人都会带着巨大的满足很大声量地与人分享他的观感：太吵了，轰鸣。好像前一天的轰鸣在耳边还没有散去。

比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那也是当年 6 月竣工的一项大工程，投资 26 亿，占地 5.3 平方公里，赛道呈“上”字形，既是上海之“上”，又取“蒸蒸日上”之意，可容纳 20 万人观看，有 5 万个带顶蓬的座位。以当年视角看，是大投资，规模够大。它一竣工就通过了国际汽车联合会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赛道资格评测，可以看作是对上海国际化地位的一个最新的认可。

F1 在当年被看作是各种竞技运动的一个明珠，速度与力量对观看者肾上腺素的提升自然不在话下，它背后隐含的巨大的资本投入、工业文明的无所不用其极，使得它同时成为检验商业组织效率、资源配置能力、国际化水平的标准。只有顶级的国家，或者说，只有顶级的公司才能玩得起这样的比赛，它们看似铺张、无用、极尽不可能的速度追求，同时还会反哺汽车产业——因为方程式赛车的需要而被发明，而被引入到汽车商业化的应用领域。这是商业社会里资本主导的一个大循环。

关键是它出现在 2004 年的上海。在获得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主办过《财富》全球论坛、APEC 工商界领导人峰会这些国际化认证的会议之后，这也是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最重要的一次实践或者亮相。

它的门票是身份的象征。尽管拥有 5 万个座位，但对于当时希望进入现场的人来说，还是太少了。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个活络有排面的人，一个

成功人士，应该而且必须出现在这个场合。而且不止是上海，从北京和全国各地一飞机一飞机过来的精英也会出现在这里。请人到现场观看 F1 比赛，可以展现一个公司的实力，也是对客户的最高礼遇。

这应该是柴子亮三岁时的事，不是他叙述中的两岁，当然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柴博士应该出现在这里，虽然巨大的轰鸣对于小孩子来说过于不友好了，这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遗憾，精英家庭应该给孩子提供这样的长见识的机会。

柴博士对中产阶级家庭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很有一些心得。

“柴子亮想认识我们学校的院士，我说你必须成绩达到前三名。”柴博士说，为什么要认识院士？我们问柴博士，“小孩子认识院士，做做论文，这样有价值，这就是精英家族应该有的事情。”注意，他用的居然都不是“精英家庭”，而是引入了“家族”的概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家族中的例子。“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三流大学，这毕业能干什么？一个月三千多块钱，他就想考东南大学的研究生，我帮他一手策划，考上了，学半导体设计，改变了命运。毕业去了深圳，一年十八万。现在最时髦的芯片设计，现在一年收入都七八十万了。我跟他开玩笑，你都快赶上你老舅了。他管我叫老舅。”

“小孩子就是这样，他高考的时候不懂事，只知道玩。他父亲辞了职在家里看着他，他从五楼爬水管下去玩游戏，那能考好吗？他到我家来找我帮忙，我说我不帮你。他问怎么才能帮。我说有两个条件，一是两个学期必须是班上的前三名，不许谈恋爱，谈恋爱也可以，不要太长时间；二是真要想好，上什么学校，我有前提，你必须自己能考上，分够，我能做的是让东南大学教授不歧视你这二本生。清华北大不讲究这些，面试过去，只要笔试过就没有问题。但东南大学不行，他们不收徐州电信学院这种学校考上的研究生。我说我去做工作，不歧视你。”

“考上了，高二十几分。但他报的那个集成电路专业也有二十几个人排在前面。后来换了半导体设计，才上去。请他们专业的老师，第一是找院长，请他们不要歧视二本，第二是请出题的人辅导一下，点拨一下专业考试的方向，第三是跟他们招生的人打个招呼，如果需要调专业，就让他直接做主。招生是分专业招生排队的，这个专业很多人，另一个没有人，你换到这个不挤的。三个技巧，每件事情都有它核心的东西在里面。你说要我开后门，把不够格的人放进去，我不会做这种事。”

柴博士又补充：“做不公平的事情是侮辱我自己。”

“开后门进哪个学校，换学校，这些你不要找我。我孩子凭真本事，不行就出国。”

柴博士眼中，在哪里上学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他无所谓的，他农村来的，读的是比菜小还菜的学校，柴子亮的妈妈对博士的见解不以为然，“我跟他讲时代不一样了。没有自觉天生就会学习的人，他不信。他从来不管，家长会都没去过。柴子亮小时候做功课，我在边上看着，他都不让，所以学习规矩就一直没建起来。”

柴博士的视野显然更为广阔。“到他而立之年的时候，医学博士，他们这一代人会赶上中国 2030 年，这会是中国大的起飞的机会。戊戌年、庚子年，这些都是历史最低点，你看中国 1840 年、1900 年、1960 年，庚子年都是最低点，现在也是这样。”柴博士保持了他一贯的高屋建瓴的风格，哪怕我们在探讨一个眼前的教育问题。他对教育问题天然具有更多的发言权，这其中原因倒不难理解：第一，他是他那个时代争夺稀缺教育资源争夺战的最终获胜者，读到了博士，出国，并以此为文化资本赢得了教育界的职位，完成了阶层跃迁；第二，他是以教育改革家的身份回国的，实际上也确实撬动了高校教育改革的某个一角，虽然成败不好说，但说敢断言自己在教育界改革上的成敗得失呢；第三，可能更关键之处在于，他以失败者形象离开教育界，以他的性格，这“壮志未酬”更能激发起他持续思考的动力。

“你爸爸是不是‘只管大事’那种家长？”我们求证子亮。

“具体的事都是我妈妈在管。家长会也是我妈去。我爸也去过学校，讲过几次课。每周五晚上有家长论坛，我爸去讲过他在法国的经历，还讲过怎么学英语之类的。外语活动，请会讲英语的家长来做外教。留学回来的，海归，在我们学校有优惠。”这是子亮对柴博士在学校里的记忆。

“我看到他们会害怕，离得远远的。”

“可能是烦，也可能是小孩看家长尴尬，”妈妈不认为子亮是真的害怕，她对教育环节的细微处倒有些细腻的观察，而且，显然她有更多的牢骚，“硬要管的话就是吵，当小孩的面吵，他要做家长啊。他要当大家族大总管这个调调。”博士一直有对“家族”

的执念，或者说有他的责任感。

“他不宽容。他只看结果，结果一旦不好，就又打又骂。”

“又打又骂？”我们第一次听到柴子亮家中的这种教育方式，来自于柴子亮的妈妈。

我们一直以为，柴子亮或者说这一代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与家庭教育有关，与家庭教育中父母扮演的各自角色有关，与某种缺失有关，与过于充盈有关……但还是低估了原生家庭的复杂性。

妈妈有一肚子牢骚：

“他爸爸主要是侮辱人，比如跪下，随时随地地跪……”

“吃饭说说话就开打……”

“我不敢插嘴，我插嘴就让我闭嘴，我一说话吵得更凶。”

“在家里，他就是一个权威，其它人没有地位。没想到吧？一个留法博士竟然是这样子。”

“他说自己是民主自由倡导者，你辩解多一点，他就认为你在反驳他，撼动他的权威。”

“他就觉得说话方式不对，不尊重他，扣帽子，贴标签。”

“你为什么跟我不是一个观点？我白养你了。经常这样。”

“政见不同，很正常，你还一定要扳过来吗？你自己的孩子，如果觉得他是错误的，慢慢说服他不就好了？”

“子亮后来都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他也是较真，就喜欢跟他爸爸争论，观点不一样，就杠。”

“他爸爸就说他又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啊，你这个人，没有用，学了一堆狗屁。说话可难听了。”

而在另一边，柴博士对此则轻描淡写：

“我经常在家里会放一些哲学话题出来，会争论。争论的过程也是学习，比如教他怎么辩论，第一要有目标，第二，让一个人把一句话说完，第三，要慢一点，想好了再说，训练自己，不要有破绽。”

“我不会用观点来压迫儿子，我不给指令，我们往往是争论的。我有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不算数，你的意见在我这里也不算数。”柴博士表现得像个很“开明”的、能听而且很愿意听他人意见的老干部，只是有一种背着手的感觉。

“争论气氛还是好的。有的时候也面红耳赤，但真争起来的时候我就拍桌子了，我说你得对我尊重一点，我养你，给你吃，你可以争论，但不要对我不孝顺。无法无法天嘛，太纵容他了。我说，你赞成专制，我在家里给你们民主。反过来，我民主过去了，我就要开始专制了。柴子亮主张专制，他觉得中国这么大国家，没有专制的话，肯定要乱七八糟。”

“我是给他自由的。他 7 岁之前我是不打的，长身体，不打，打也没用，他还不记事呢。7 岁之后，上小学之后是要打的。”

“鼻子差点让我打歪了。老师让抄写作文，四百来个字，他偷懒，前面抄了，后面抄了，中间没抄。我看这只抄了一百多个字。肯定是说谎。一巴掌打过去，鼻子歪了。告诉他要诚信。你对你父母都不诚信，还能对他人吗？”

“过了 12 岁，就不打了，讲道理。”

“前两个月还让子亮跪过。”子亮妈妈有新的牢骚。

“疫情在家里讨论政治观点，方方什么的，说说就不一样了。然后就生气，人身攻击。”子亮的妈妈回忆发生了什么。

我们认为方方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子亮呢就会质疑，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你怎么这么写。我讲作家亲身经历和了解事情是不一样的。不可能都是亲身经历。一个作家要经历多少东西才能写。我们要有什么事也会跟人打听，就会问朋友怎么说。子亮就觉得，总是“朋友说朋友说”，那就是假的呗。你没有经历，你没有眼见为实，就没有写这东西的资格。还说到方方的特权。好像是动用警车送外甥女去机场。

我说是我们也会这么做。应该多少都会有一点吧。动用关系就会动用特权。转学的事是不是特权。子亮说这就不应该，这就不可以。你动用了的话，你就没权力写。都是网上争论最核心的几个东西。

可能高中生都这么想？要我说现在孩子们就是太闲，太优渥了。不需要为了一碗

饭劳心伤力，有思想这些东西，就是太闲了呗。

政治不在我们生活里，原来压根没想过这事。好像是香港开始闹事之后？才开始有这样的思考，才开始有争论。

后来就不敢交流了。我们就在饭桌上才能说话吗。我们也不想这饭都吃不下去了。跪下来之后也不容易收场。一般是一顿教训，然后叫他起来带到楼上房间里继续教育，然后放子亮回房间，过一会儿可能又觉得不对，再叫到房间继续谈心，是不是这个时候给柴子亮道歉，就不知道了，这时候不再当着我的面了。

多么气人！动不动还要跪祖宗什么的，就是为了给你认个错！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说你态度不好。柴子亮肯定也生气。不是不表现，他不会记仇。知道父母是爱他的。但我觉得这太过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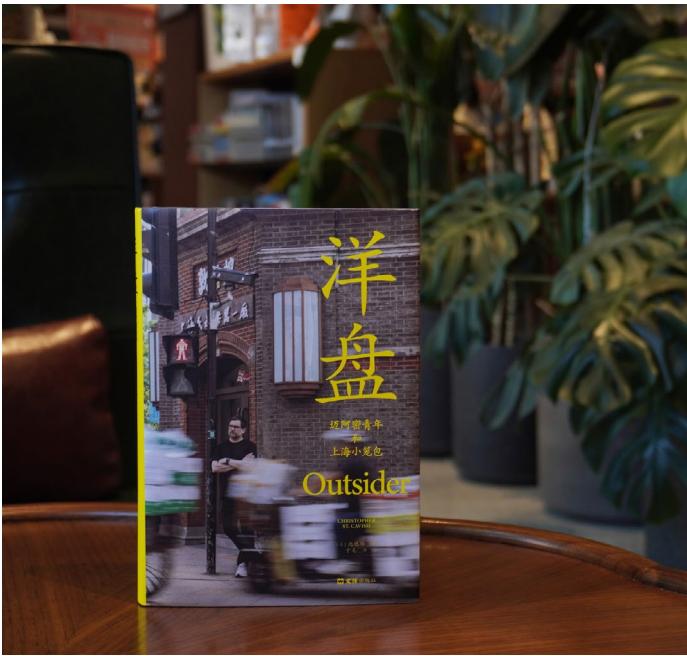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文内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我每次在微信里找 Chris，总是会忘记他很正式地叫自己 Saint Cavish。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问过他这个姓氏到底有什么说法，他不置可否，只是说他父亲似乎查过，祖上也许和东欧一带地方有点关系。那次见面他提及更多的是外高祖父，一个在北京的传教士。他和他的家族在北京办过学校、盖了座挺大的教堂——现在还在，离同仁医院很近，而外高祖父创立的眼科已经成了医院的一部分。他妈妈第一次来中国，他带她去那个教堂，走到那儿妈妈就开始用中文数数：一、二、三……是遗留在遥远记忆里的家族对话，妈妈的父亲，也就是 Chris 的外公在北京长大，精通中文，回到美国有什么不想让儿女知道的家庭对话，可能就会临时切换到中文。只言片语漂移到了母亲的额叶里，又在数十年后在它的母语区闪回。

这些家族史与 Chris 来中国的理由无关，他是到了这里才知道的。

## 非虚构

#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杨樱 | 新书推荐

一个老外如何谋生，如何去爱，  
如何应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的上升与下沉。

洋盘，四川方言中，有洋气、拉风的意思。

上海方言中，则指外来人不太了解本地习俗。作者用作书名带有一点自嘲。

《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是美国作家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讲述他在中国经历的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文章中的诸多篇幅首发于小鸟文学，以“局外人”之名连载专栏一年。

2005 年，24 岁的沈恺伟离开家乡——美国东南部城市迈阿密，以年轻厨师的身份游历至香港，又机缘巧合得到一份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翡翠 36 餐厅的工作，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近 20 年的生活。

从最初跌跌撞撞闯入一座陌生城市，不知道自己能在这里待多久，到骑着挎斗摩托穿越 5000 公里寻路中国，从躲在外籍人士舒适的“泡泡圈”，到花 10 年寻访一位手工锅匠，以《上海小笼包指南》出圈……他穿越在两种文化间，一年又一年，学会了当一个成年人，学会了爱，学会了痛苦，也见证了改革大潮下中国的变迁。

冥冥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而直到来到中国，他才发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深刻渊源。

如今专栏得以成书，想着可以介绍相识经过和个中感受，是为序。



传教士和孩子们在卫理公会大院的家中

不过 2020 年我们见面那会儿，正好赶上他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我应当如何看待自己，和我的祖先相比，我在这儿到底干了啥？

要不要写个“远东往事”？我开玩笑。那时候我们坐在常熟路 Totino Panino，一家很正点的意大利三明治小店。主厨一条大围裙刚够系住腰身，见 Chris 进门就从柜



2015，测量小笼包



2015，上海市区最后的手工锅匠陶师傅

台后面走出来抱住他。Chris 说他在大馆子做了十几年总厨，烦了，余生只想开个属于自己的帕尼尼店。Chris 给上海大大小小的饭馆写评论，知道各种厨师的人生秘密。

当时“小鸟文学”启动在即，我四处找人写专栏——要那种一口气写一年的主题——想到了“好奇心日报”报道过的这个美国人。大家都知道他用游标卡尺评测小笼包，却很少知道他最大的兴趣是和上海各路角色聊天：路边敲生铁锅的大叔，什么人在卖骆驼奶，回收垃圾的人到底如何生活……他中文说得不错，对东亚社会那些曲曲绕绕也挺在行。有一次我们在宁波吃路边馆子，点菜全靠手指，灶台辟出一块摆几个小菜搭配，剩下都是小海鲜，有啥吃啥。吃到某个微妙的时间点，Chris 钻进后厨，我以为他职业病发作，又去做调研，喊老板结账的时候才知道，刚刚老外过来感谢他，还把单买了。可以啊，宁波老板挺高兴。

其实我哪里知道 Chris 有什么“远东往事”，这个名字一半出于戏谑，一半确实认为他不会没有故事可讲：一个在上海住了近 20 年的外国人，他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说起 20 年前的上海——蓄势待发而万物尚且淳朴——那会儿他在干什么？是什么让他待了这么久？这么多年，这个城市这么多变化，他感受到的是什么？

总归有的好讲，应该也能讲得不差。约专栏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



2009 年的上海

“可以可以，这个我可以说。”这两句话后来成为 Chris 那个叫“局外人”的专栏交稿前的保留回答。它的上文通常是我提问后引发的对话：你住过哪些房子？你为什么会从一个厨师变成一个撰稿人？啊，你怎么看在上海的其他外国人，新来的久居的，你们之间的社交是什么样的？Chris 欣喜愉快，觉得这些确实都可以谈谈，尤其是后面那个问题。（Oh，我们都属于 expats，生活在一个“泡泡圈”里。）我们——我和 Chris 专栏的翻译于是——都觉得他写的细节新鲜。认识挺多外国朋友，好像从来没人展开讲讲这些？



2012，在夜店打碟

我也没读到过这些。一个久居上海的外国人的当代生活。美国人梅英东写过北京胡同（《再会，老北京》），何伟写了涪陵（《江城》）和很多地方，史明智写过上海（《长乐路》），但都不是自己的生活。倒是有一位叫扶霞的女士写了自己如何在成都学做菜（《鱼翅与花椒》），但是她真的主要在谈做菜。你可以从一个叫 SmartShanghai 的网站窥视到外国人在上海的吃喝玩乐选择（以及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谈论刚出现的摩拜单车和微信支付时候的口吻），但终究没有人以一种拉家常的口吻，说一说自己如何应对这个大都市的起居饮食社交衰病，一切必要，一切非必要。

从这个角度说，Chris 写的东西可算史料补白。

Chris 信守诺言，“局外人”每月一篇，从 2021 年 1 月一直写到年末。2022 年 3 月 23 日，我们有过一次微信聊天。两个有点惶惶的人交流彼此的小区是不是还进出自如，是不是还敢在办公室继续上班。再下一次联系已是 4 月 14 日早上 8 点 50 分。我们交换了彼此的生存状况（都还行），心理状况（都勉强还行）以及对整体的感受（肯定不行）。

Chris 在那年春夏写完了这本书。他有一回说自己很难写下去，因为要回忆以前的那个上海，在那个时候进行回忆让他觉得有点残忍。但是他不得不写，因为这是让自己保持镇静的唯一方式：至少有事可转移对当下的注意力。

我们再次见面要到秋天。我们坐在咖啡店外面，店员很好心，无法堂食，给了两个小马扎。Chris 不喝咖啡，去隔壁老山东水果店买了个大红心柚，老板在柚子皮上划了一刀，他一边撕扯着柚子，一边跟我讲他的生意糟透了。Chris 原本有个餐饮咨询公司，顾客是上海的西餐馆，他以自己的长居经验和媒体身份为他们提供建议。随着西餐馆大量关闭，客人也大比例置换成了本地人，这生意做不下去了。那时他琢磨着应该研究一下小红书，没准可以打个信息差，挽回一两个还停留在大众点评时代的客户。

还有他妈。他在上海一直很平安，以至于还没学会报喜不报忧，这么一折腾，又把自己经历了啥如实汇报，老太太心惊肉跳，觉得还不回家简直不可思议。Chris 觉得自己傻，不是不走，而是说了大实话。他说自己是走不了的，在这里太久了，迈阿密于他还不如上海来得熟悉。这个他估计不会告诉他妈妈。

“小鸟文学”出过一期特刊，叫《大声》。征集大家最想“大声”说出的话。问了 Chris，他也参加。

Chris 发过来的只有三排英文，是首诗：

Surprised: Where have you lived?

Not surprised: Why do you take it?

I hurt both ways.

过了会儿，他把冒号前的部分全部去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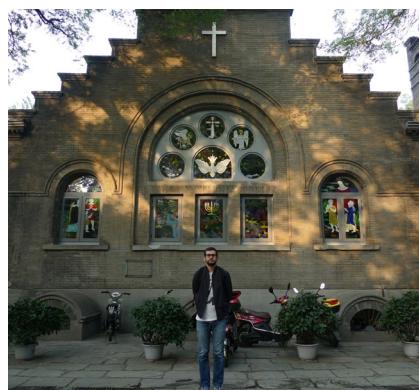
Where have you lived?

Why do you take it?

I hurt both ways.

我琢磨着里面的情感。Chris 补了几句解释，他说无法回答任何这类问题：“你之前为啥来？”或者，“你为啥还在这儿？”或者，“你为啥这么惊讶，你都在这儿住这么久！”这都是春天以来形形色色的人会问他的。

这几个问题再度浮现在我们的对话里，是 2023 年的夏末。Chris 很郑重地找我去家里吃晚饭。番茄罗勒意面。简单却意外地好吃。他把一条帕玛森芝士在面碗上擦来擦去，芝士薄片落在面上，又被热气熏软。我差点忘了他的本职是个厨师。伴随鲜美食物出现的是严肃的问题。“所以……”他有点犹豫，并且决定切换成英文以便更准确：“你怎么看待现在的状况？走不走？如果不会，那你要怎么……”



2012，亚斯立堂

我一时没说话。不是因为问题太大，而是因为我觉得问答双方好像错位了。应该是我来问他这些问题才对。当然我也不用问，因为我知道他自己已经问过自己很多遍了。Chris 对这个待了近 20 年的地方有一种奇怪的怀旧，这里不是他乡，也不是故乡，而是某种让他的生命热情得以持续的地方，比如说，中国的食物。

他家里挂着一幅龙飞凤舞的长卷。他说是 7 个字，让我猜。我本应该想到的，但当时毫无头绪。那上面写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他可以讲很多故事，比如这幅画是怎么来的，比如另一幅巨型照片里闭着眼睛微笑的拉面师傅是怎么回事。至于那首诗，那些问题，他回答不了。



杨 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Raimond Klavins](#) on Unsplash

11月13日

过去的两周，天气每天都很晴朗暖和，但今天清晨出现了几缕云，可能意味着天气要变了。在这最后的几天早晨，日出一小时后，太阳和月亮势均力敌地分别高挂在东边和西边的雪地上空。昨天看到北边出现了高空卷云，预示着气温将会下降：今天早上零下十一摄氏度。娑木渡山上的风刮在身上跟针扎似的，蜥蜴都缩到土里去了。

从日出到日落，雪伊寺的岩羊群走到哪里，我就尾随到哪里，最近几天，那群公羊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整个羊群在雪线上，奔东而去；娑木渡山顶的海拔肯定接近5200米。我采用自己摸索出来的“Z”字形技巧爬坡，时而停下，时而弯腰，要不就跟吃草的羊群打打手势，表示我只是来捡羊粪的，跟它们熟悉的其他人类一样，不会伤害它们。等我爬到雪线时，它们已经开始趴下了；我来到了大约150米外的一个圆丘瞭望台。羊群会在上午十点左右再次吃草，随后午休，然后又断断续续地吃草，直到日落西山。

十点刚过，羊群就开始吃草，同时密切注意其他同类。虽然偶尔会有两只母羊互相追逐，但活动主要是在公羊之间进行的——公羊爬到公羊的背上，放任地在屁股上蹭来蹭去，轻微地推挤。整天跟单性羊群在一起，这种“配对”行为就会变得很明显：这些相互试探、推挤、爬到对方背上、触碰和蹭擦的公羊，似乎还会同吃同睡，此外，这样两只公羊在角的大小、黑色炫耀斑纹的形成以及在羊群中的支配地位方面，都非常相似；这些试验性的对抗和接近行为几乎不会发生在不般配的两只公羊之间。

小口啃掉斑斑积雪，用蹄子刨起尘土后，岩羊才弯曲前膝，优雅地在一块背风向阳的洼地上安顿下来，我走得很近，可以欣赏它们橙色的眼睛和微妙的角尖抓挠技巧，还有以两性后躯为中心的奇怪活动：在发情的早期阶段，臀部受到摩擦和尿液受到检查的母羊很少或根本不理会自己的仰慕者。与此同时，一岁的小母羊则会很可爱地蹦来跳去，以避开烦躁的成年公羊。西边的羊群已可以看到真正的打斗或进一步性表现的端倪了，这边还没有，尽管偶尔会有一只公羊慢慢接近一只母羊，脖子伸长，垂得低低的，夏勒称之为“低伸”动作，是交配的前奏。由于娑木渡的羊群对我已习以为常，所以我可以不用望远镜，轻轻松松地观察它们，可惜的是，等不到它们完全进入发情期，我就必须离开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从东南方吹来了一阵冷风，在这个没遮没盖光秃秃的碎石坡上，我感到很不舒服，加上觉得冷起来了，就缓缓地把羊群赶下山，然后又往西赶，我只是稍微让羊群聚拢了一点，寻找一块岩石或草丛避风。羊群在一道平坦的山脊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而我则舒舒服服地靠在帆布背包上，躺在正上方一丛茂密的忍冬中：正下方就是水晶寺，周围群山环绕，碧空如洗；羊儿吃草，我嚼干面包，沉浸在这纯正的羊的天地里，真是无比美妙。

下午三点左右，在一阵骚乱中，我又把羊群往山下赶了赶，好让夏勒从“察岗”山坡回来不用爬太远就可以仔细观察它们。不料索楠老太太出来捡羊粪，把羊群吓回东边去了。眼下羊群成了一群惊弓之鸟，所以我跟踪时更加小心了，我绕着山逆风爬到一个草丛后面，距离它们所站的那个小斜坡大约五十米，它们警觉地站在坡上，不过方向并没盯对。时不时地，会有一只羊朝我这边扭头，我一动没动，它们的反应也没加剧。这些家伙非常紧张，连沉重的羊角都勃然竖立着，肌肉却跟冻住了似的纹丝不动。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只见它们的毛被山风吹得一团糟。

我想让它们再次掉头往西，于是慢慢坐起来，所有的羊全都扭头看了过来。但这群老是无缘无故奔逃的畜生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看到头顶上突然冒出一个人来，它们反倒放松了一点，低头吃起草来了，好像是不知道我在哪里的悬念才让它们一直提心吊胆的。它们甚至又开始趴下了。我感到很冷，加上受够了它们的无所作为，于是不再奢望目睹科学所未知的山羊般的暴行，粗声恶气地把它们往村子里赶。这一次，它们一口气跑了半公里，直奔几栋房舍东边的露岩而去。

羊儿吃草，我嚼干面包，沉浸在这纯正的羊的天地里，真是无比美妙。

我下山来到通往萨尔当的小径，向西拐往雪伊寺。小径已经笼罩在暮色的阴影中，而不到三十米的上方，岩羊站在上面的那些岩石，却沐浴在阳光之中。此刻，这些生物上演了一场狂野的日落表演，我等了一整天的发情初期拉开了序幕。老公羊纷纷从岩石上跳下来，向其他公羊发起挑战，将它们撵走，年轻的公羊为了母羊和小



羊也会如此，就连母羊也会你顶我一角我顶你一角。在对峙中，岩羊不会像绵羊那样勇往直前，而会像山羊一样，先竖起后腿奔跑一阵，再猛地横冲过去。夏勒迄今为止找到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儿证据。整群三十一只羊都加入了混战，它们飞快地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上，山羊的本性昭然若揭。后来有一只岩羊从山顶上踢落了一块大石头，把下面的羊群都打散了，片刻之后，整群羊都静了下来。

生着一对金色眼睛、长着角的一颗颗脑袋从喜马拉雅的碧空中往下张望，寂静中，最后一颗砾石从斜坡上弹跳下来，不偏不倚落在了我脚边。

岩羊像饱经风霜的老人一样在从容地等我。

现在你看到了我们没有？你注意到了我们没有？

太阳正在向山上退去，而这些生物却依然呆呆地站在它们不朽的岩石上。

我赶紧走进寺院，想告诉夏勒，从帐篷里探出头就可以仔细观察他的岩羊了。但只见到了一张字条，上面说为了拍到雪豹，他今晚将睡在河对岸的“察岗”小径附近：像雪豹这样警觉的生物，根本就不会靠近有两个人的地方。

要是别的法子都不管用，夏勒就会派臧布去萨尔当买一只老山羊做饵来诱引雪豹。我很想一睹雪豹的尊容，但晚上借着相机的闪光灯，瞥上一眼蹲在诱饵上的雪豹，算不得真正看见了雪豹。要是雪豹自动现身，我倒是愿意去看看。要是不现身，出于某种本能（即使现在，我也不明白这种本能），我就不打算去看了，就像我不打算解禅学“公案”一样：没看到，我也很知足。跑了这么远，却没看到雪豹，我以为自己一定会很失望，但我并没有那种感觉。我失望，但也不失望。雪豹存在，它就在这里，它那双霜色的眼睛在山上看着我们——这就足够了。

吃晚饭时，夏尔巴人聊得很起劲，尽量不冷落我，但聊了一会儿后，我就埋头记笔记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聊了。通常情况下都是土克丹唱主角儿，他像大师一样摆出一副催眠的样子，把双手伸在火焰上，用他浑厚柔和的声音侃侃而谈，一次就能让大伙儿全神贯注地听上几个小时。我喜欢观察我们这位邪僧，他长着一双蒙古人的黄眼睛和两只超大的耳朵，每次我看向他的时候，他大多数时候也正在看着我。总有一天，我会问这个黄眼睛的土克丹，他前生是不是一只雪豹或雪伊寺山坡上的一只老岩羊，他不会答不上来的。晚饭时，他带着菩萨般的微笑望着我，那是一种对劫掠和复活一视同仁的微笑，那是一种他与野生动物共有的眼神。

## 11月14日

过了黑河，我爬上西坡小道，走出漆黑的峡谷，来到了阳光下。乱蓬蓬的刺柏里有一只忙碌的小鸟，是一只花彩雀莺，身体呈蓝灰色，顶冠为红褐色，一个劲儿地“唧唧”叫个不停：眼看就要入冬了，它还在忙活什么呢？

明媚的早晨，古老的月亮下，豹子的脚印新鲜如小径上的花瓣。但在离夏勒相机的绊索触发线大约两百米的地方，脚印消失了，仿佛这只猫科动物跳到一边的刺柏丛里去了似的；离绊索触发线更近的两个脚印是前一天留下的。过了下一座嘛呢石堆，小径绕过河流上方的山脊，进入“察岗”下方陡峭的积雪峡谷，雪地上又看见了一些新鲜的脚印，仿佛雪豹为了避开绊索触发线已经横穿山脊，又在下一条峡谷中回到了小路上。在一个脚印旁边有一个失落年代的印记——一块裂开的石头上有一枚蕨叶状的腕足动物化石。

雪豹存在，它就在这里，它那双霜色的眼睛在山上看着我们——这就足够了。

从“察岗”传来了扎玛茹（也叫法鼓）诡异的“咚咚”声，有些扎玛茹是用两块人的头盖骨做成的，这件乐器与用人的大腿骨雕刻而成的冈令都是密宗的法器，密宗使用这两样法器并不是鼓励病态的思想，而是提醒我们今生今世转瞬即逝，借此来加深冥想的深度。或者，那声音也许只是洞窟中的水滴落到铜罐里发出的空洞回声，我不能确定。但这非凡的声音引起了芸芸众生对野山野水的关注：在这面山坡的某个地方，那只雪豹也在竖着耳朵听。

在“察岗”上方高高的山脊上，我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小点儿，夏勒正在那儿追踪雪豹；我用了不到一小时就追上了他。“它把我耍了，”他向我大声招呼道，“本来差一点就要碰到上面的绊索触发线了，它突然掉头爬上山谷，接着越过山脊，到了离我躺的地方不到一百米后，又回到了小路上——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将双筒望远镜移到了“察岗”羊群身上，眼下，西坡规模小一点的羊群也加入其中了。“别看现在我失去了

了踪迹，但那只雪豹这会儿就在附近，正瞅着我们呢。”他的话得到了羊群的印证，上午十点左右风向改变时，羊群突然惊慌失措地跑了起来，丢下这道光秃秃山脊上的岩石和荆棘，夺路而逃，在一片空洞的轰隆声中，冲过厚厚的、硬邦邦的积雪，奔向了水晶山的一个高处。哪怕是受到驱赶，岩羊也不会像这样从人身边跑开的。

雪豹是一个强大的存在，瞳孔竖立，呼吸几不可闻，奔跑迅捷。夏勒悄声说道：“它如果不动，我们就休想看到它，即使在雪地上也不例外——这种生物真的很了不起。”我们用双筒望远镜，一寸一寸地把这面光秃秃的山脊仔细地扫了一遍。随后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多，要是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许会更好。”他似乎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我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幸运，无需承受成功之后的凄凉，无需怀疑：这真的是我们跑了这么远想要看到的吗？

我来了一句“此乃俳句诗人之言”，他明白我的意思，两人会心大笑起来。夏勒给我的印象是，与两个月前相比，他不再那么教条，对无法解释的事情也更加包容了。换了在加德满都，他对自己在旅途中写下的这首俳句说不定会产生怀疑：

负重云中人。

雪中一行黑足印。

倏然了无影。

由于岩羊被雪豹吓得逃到高处的雪地里去了，夏勒得了空，便陪我造访了“察岗”最后一次。在那儿迎接我们的除了来当翻译的臧布外，还有土克丹，几个夏尔巴人当中只有他这么有好奇心，自己会主动过河，爬到“察岗”上来。就连那个“快活又可爱的家伙”，有一次夏勒这么说起过普才让，“对我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一丁点儿好奇心；我边看边做笔记，他能在我身后站两个小时，一个问题也不问。”

雪伊寺喇嘛又一次让我们在石台上等候，但这一次——因为我们是应邀而来——塔克拉札巴准备了晒干的粗粉状绿色牦牛奶酪，还有糌粑和蓝色瓷杯盛的酥油茶，在山间的阳光下招待我们。配上香浓的青奶酪和加了盐巴、酥油的苦茶，糌粑更有特色了，吹着凉爽的风，这顿隐士之餐吃得很香很香。

塔克拉铺上红色条纹地毯，让我们坐在上面，喇嘛也终于出来了，身上裹着那张狼皮。臧布在喇嘛面前显得小心翼翼，土克丹则从容轻松，同时也很恭敬，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他从未摘下那顶落拓不羁的帽子，今天终于摘下了，露出一颗和尚头。我们把画在本子上的画一幅幅翻给喇嘛看，和他谈笑风生地聊了好几个小时，基本上都是土克丹在给我们当翻译。图普朱克喇嘛指着黑河对面的娑木渡山坡，把跟我讲过的雪豹和盘羊的故事，又跟夏勒讲了一遍。

岩羊高翘着角，绷紧侧腹，开始慢腾腾地从水晶山下来，在雪地上刻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雪豹走了——说不定岩羊看到它走了。透过双筒望远镜，不时可以看到一只公羊直立起来，像在雪地上跳舞一样，接着就用后腿往前狂奔，再俯冲下来，用角猛撞对手的角。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多，要是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许会更好。

艳阳高照，雪花飘飘，心灵沐浴在钻石般的光芒中。图普朱克仁波切此时谈起了雪豹，他经常从所在的岩架上看到雪豹，所以描述的情况都很精确，可见他观察得仔细：他知道雪豹在春天的交配期叫得最为频繁，知道雪豹栖息在哪些洞穴和岩架上，还知道雪豹如何刨坑和排便。

离开之前，我把宋渊禅师送给我的那颗刻着礼敬大悲菩萨经文的梅子核拿出来给他看了看，并答应把我从雅木蒂河边茶摊上买来的那个柳条凳给他送来。喇嘛给了我一面白色的经幡——他称之为“风画”——上面文图并茂，是用雪伊寺的古老印版印出来的，这些佛教符号中有一幅山川大神努尔布空岱蓬淳的肖像，喇嘛说，早在苯教徒和佛教徒来之前此神就在这里了：朱拓布僧格依喜率领他的一百零八只雪豹所击败的可能就是此神。努尔布如今成了一名护法，其形象出现在这样的经幡上，常常挂在桥上和高山垭口的嘛呢石堆上，庇佑旅人一路顺风。喇嘛聚精会神地将经幡折起来，然后微笑着送到了我手上。

水晶寺的这位喇嘛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他对自己隐居在寂寥的“察岗”是什么样的感受，他已经八年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了，而且因为双腿的缘故，可能再也不会离开了。臧布跟喇嘛在一起似乎有点拘谨，也有可能是他

自己不舒服或跟我们在一起放不开，我对他说，要是觉得唐突的话，就别问这个问题了，但过了一会儿，臧布还是问了。没想到这位直率而质朴的圣者，听了臧布的问题后，露出一口亮闪闪的大白牙，放声大笑，笑声极具感染力。他指着自己扭曲变形的双腿，不带一丝自怜或怨怼，仿佛这双腿是我们大家的一样，他向着天空、雪山、艳阳和欢蹦乱跳的岩羊敞开怀抱，大声喊道：“我在这里当然很快乐啦！妙不可言！尤其是在我别无选择的时候！”

安之若素，随遇而安，宋渊禅师可能也会这么说，我感觉喇嘛的话似乎直接击中了我的心。我向他道谢，鞠躬，静静地下山：折起的经幡在我的派克大衣下暖洋洋的。酥油茶和风画、水晶山，还有在雪地上欢蹦乱跳的岩羊——已经足够了！

你看到雪豹了吗？

没有！那不是很好吗？

## 11月15日

整个早上，月亮都冰冷地挂在天上，东风强劲，风铃声再响也听不见。那只鸽岩鹑要么已经死了，要不就是穿山越岭，逃到南方去了，因为它再也没有到我的院子里来过。纳姆头上裹着一条毯子，冒着酷寒来到伙房，想喝杯茶；她那一头蓬乱的黑发，和往常一样随风飘扬。眼下白天变短了，太阳在下午三点左右就落山了，黄昏的山中到处可以听到这个野蛮女人的狂呼猛叫，她一面是在唤自己的黑犏牛，一面是为了把狼群吓跑。

我一早就爬到娑木渡山的西北山脊上，从那里我可以看到所有的小径，可以扫视黑河对岸西坡的所有山谷：只要雪豹出来，我就可以看到，要是它捕杀猎物，我会看到鸟儿惊飞。夏勒一大早就过河寻找新鲜的脚印去了：他不想让雪豹干扰到自己对岩羊的研究，可是大型猫科动物的魅力太强了，让他欲罢不能，何况雪豹又是它们当中最鲜为人知的。这家伙一出现，从岩羊老角上闪烁的光芒到一颗石子儿掉到冻地上的响声，整个山水都为之屏气凝神，真是太奇妙了。

太冷了，不能老坐在一个地方不动，于是我就在山脊上来回走动，隔一会儿就扫一眼西头的岩壁，留意着娑木渡的岩羊群，它们的发情进展似乎远远落后于“察岗”的那一群。这面斜坡上有许多化石，多为螺旋形的菊石化石，河中有非常美丽的天然岩石。我喜欢天然岩石，可以说是垂涎三尺，可是它们太大了，无法带出垭口。也许我该拿几块嘛呢石的碎片，河中的岩石，还是让它们留在原地吧。

你看到雪豹了吗？

没有！那不是很好吗？

天冷风寒，令人坐立不安起来，我不自觉地将最后一块巧克力收起来，准备留到翻山越岭回去的路上再吃——这就是我，永远在未雨绸缪，不会得过且过混日子。看到那几个闲散的夏尔巴人，我的不安愈发加剧了，除了消耗宝贵的食物外，他们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不是睡觉就是闲坐着，等待出发。

土克丹和坚赞就像外面世界的使者，来时天上还是一轮满月。现在，月亮渐亏，在雪伊寺这段清如朗月的日子很快就会趋于尾声了。自打他们来了以后，每天都过得挺兴奋，不过有一种力量却在慢慢减弱，魔咒被打破了。

所以我也准备离开，尽管我很想留下来。我一方面揪心于背包里那几封未拆看的信件，渴望见到孩子们，渴望饮酒寻欢，重新过上干净舒适的日子——这一面的我已经面向南方，心越群山而去了。我为此感到难过，于是环顾四周，想把对雪伊寺的感受刻在这本日记里，这份感受非常珍贵，我深知费尽笔墨也不能表达万一；这个地方的美丽我必须欣然舍弃，一如舍弃其灿烂溪水中的天然岩石一样。我对自己的笨嘴拙舌感到很懊丧，这才提笔写日记，但是随便一根羊毛里，随便一根蜡菊的枯枝中所蕴含的雪伊寺风韵都要远远超出这本日记；想从自认为所感知的东西中去谋求永恒，是不得要领之举。

我在自己的瞭望台附近，找到了一个打坐的地方，是山脊上雪融化后一个背风的凹处。寒冷的山风一吹，我的脑子很快就清醒了，感觉也好多了。风，摇曳的草，太阳。垂死的草株和天上南飞鸟儿的叫声，并不比岩石本身更为短暂，也并不更长久——它们都是一样。大山归于寂静，我的身体融入了阳光里，泪水潸然而下，与“我”没有半点关系。为什么会流泪呢，我也说不清楚。

前些日子里，我对山的理解有所不同，从中看到了某些永恒的东西。即使是恭敬地走向它（像登山者那样挑战山峰是另一回事），山的“恒久性”也令我震惊，那种可怕而又不容否认的安如磐石的气势，似乎让我进一步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短暂。这种对人生苦短的恐惧，也许可以解释我们对现代生活中那一点点原始体验的贪得无厌，可以解释为什么暴力是力比多在作怪，为什么欲望会吞噬我们，为什么士兵不愿意忘掉那些恐怖的日子：我们迷恋那种仿佛行将死去却又重获新生的极端时刻。在性放纵中，就像身陷险境一样，不管多么短暂，我们都会被迫进入一个生气勃勃的当下，在这个当下，我们并没有远离生命，我们就是生命，我们浑身都充满了生气；在与另一个人销魂的缠绵中，寂寞消失在永恒之中。但在另外的日子里，这种结合是靠敬畏来实现的。

我在一个狭窄的岩架上滑了一跤，那一刹那，有如无数根恐惧之针扎进了我的心和太阳穴，永恒与现时相交了。思与行无异，石头、空气、冰、太阳、恐惧和自我皆为一体。将这种敏锐的意识延伸到日常中，我们便能时刻体验胡兀鹫和狼的心理，它们自觉是万物的中心，根本不需要了解任何真实存在的奥秘，这种感受令人振奋。我们此时此刻的呼吸中就蕴藏着所有大师想告诉我们的奥秘，有一位喇嘛称之为“当下的精确、率真和智慧”。打坐冥思的目的不是开悟，而是即使在非常时刻也要心无杂念，只专注当下，将当下的正念带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心猿意马无异于“在混沌身上画眼球”。当我看着岩羊的时候，我必须看着岩羊，而不是想着性、危险或当下，因为当下——哪怕在我想它的当儿——就已经过去了。



彼得·马西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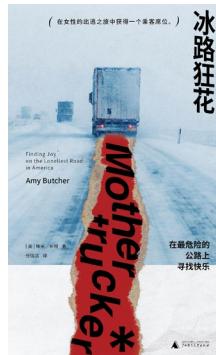
美国大名鼎鼎的旅行作家兼小说家，三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联合创始人。《雪豹》是他的代表作，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外，他还著有《影子乡村》《云雾森林》《疯马的精神》等三十多部作品。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乔伊和她的卡车



## 两个女人、一辆卡车，穿越 666 千米致命冰路

埃米·布彻 | 新书试读

女性在伤痛中野蛮生长、互相倚靠的疗愈之旅

“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关于我们的屈服、倾听和爱，关于我们的守望相助，以及死亡也无法阻隔的情谊。”

埃米·布彻从各方面来看都是美国社会喜欢的那类女性：三十岁，已在一所高校获得终身教职，工作之余为报纸杂志撰稿，玩园艺，有一个看上去温柔体贴的伴侣。光鲜生活背面是无法挣脱的泥沼——埃米长期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生活在巨大的割裂中，在课堂上教授女性文学，在家中向糟糕的爱人乞求爱。

乔伊·维贝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道尔顿公路上驾驶重型卡车，以长途货运为生。这条路坐落于极度偏远荒凉的极寒地区，被 BBC 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乔伊是这条路上唯一一位女性卡车司机。

在某次遭受家暴后，埃米决定“出逃”，前往阿拉斯加，与网友乔伊见面。在道尔顿公路，在北极荒野的狼群和驯鹿前，在乔伊的大卡车上，埃米终于有勇气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乔伊的故事也逐渐浮现……

以下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摘自《冰路狂花》。

普拉德霍湾出现在视线中时，就像天堂一般，万丈光芒从云层洒落。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幢建筑就是上帝的化身，在这里，它是一幢建在挑高结构上的模块化房屋，提供暖气、食物和遮风挡雨的屋檐，以及一个冰沙吧——乔伊打趣说。

我摇下车窗，让风从指隙滑过，雪花在指尖上打着旋儿。

“敬请期待！”乔伊说。

突然，一阵歌声响起，手机嗡鸣着传来爱的讯息，来自萨曼莎、詹姆斯等无数人。我们距终点还有 12 英里，信号只有两格，不足以发出一条报平安的消息，更不用

说发出一张我们的合照，却足以接收此前累积的消息，每声嗡鸣都传达着来自远方的问候。

“帮我个忙好吗？”乔伊问道，她摆出双手握着方向盘的姿势，对我说，“安全第一。”我拿起她的手机，几十条来自全世界的消息一拥而上，在屏幕上闪过。

“别管那些，”乔伊伸出纤细的手指，在空气中做出左滑的手势，告诉我，她只想看家人的消息。

“希望你已经平安抵达，”我大声念给她听，“那条是萨曼莎发来的。还有，别在外面待太久。”

“那是詹姆斯吧！”乔伊笑着说。

这些消息提醒着乔伊她在这世上的位置和价值，是她与世界联结的纽带。她说边开车边发消息实在太危险了，但有时——她微微一笑说，只是有时，当她能看清前方路况，且天气良好，艳阳高照时，她会偶尔允许自己读一条消息。

“一点点爱，一条小小的消息，就能帮助我跑完最后的几英里。”她大声说。

我笑了，试想经历过漫漫长路上的无边黑暗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终于看到天空沿着车的引擎盖变成蓝色，那时能看到詹姆斯的消息，想必对她意义非凡吧。

他说，我想你了，小姑娘。

我留意着我的手机的动静，但它在背包里一声不响。

你真笨，笨死了。我对自己说。

父母知道不要发消息给我，我告诉过他们路上没有信号，只有在安全抵达费尔班克斯之后才有可能发出消息。但我并未跟戴夫说这么多，一部分是因为我要让他想念我，并且告诉我他也想我。

我想让他告诉我，他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他知道出于冲动的侮辱是有害的，对我们的关系没有帮助。我想看到他的承认和道歉，看到他列出举措来纠正此前的种种不当行为，例如接受心理咨询，学习管理愤怒。即便现实总不如愿，但我依旧愿意相信，他终会找到办法来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我这几天的缺席能让他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但我的手机上一条消息也没有。没有承诺，也没有宣言，只有美国边境的工业光辉笼罩在我们四周，物资堆积如山，孤独亦然。

“可以帮我个忙吗？”乔伊问道，“既然有了点信号，麻烦帮我打给普拉德霍湾酒店，号码在快速拨号上，找前台的乔琳，请她帮我们留点上等肋排。”

她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是神圣肉食日。

这是普拉德霍湾的传统，每个星期天，各酒店和工地都会提供一模一样的餐食——“你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一块肉”。

我想象着通红的酱汁在肥美的肉排上晶莹流淌。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没关系，”乔伊说，“我想我们也不一定需要一块巨大的半熟肉排吧。”

可是我已经在幻想那块牛肉了，佐以拌入了黄油的土豆泥，如果有青豆就更好了，这叫我怎么抽离出来！

“我可以再试一次吗？”

乔伊允许我再试三次。

“乔琳肯定在忙。这可能是上帝在暗示我们，会有更好的东西来填饱我们的肚子。”

“也可能上帝是在考验我们？”我试探说，“可能我们得证明我们值得这块牛排？可能祂想让我们臣服于那神圣的、滋补的——”

“肉的力量？”

“这种力量神秘莫测。”我说。

“你对上帝的感知蛮不错哦。”

“我听说祂作工的方式很神秘。”

乔伊笑得眼睛眯了起来：“你总是能把我逗笑。”

“你觉得有可能会剩一点吗？”

“你见过的最好吃、最大块的肉，在一间几乎全是男人的餐厅里，你觉得呢？”

“好吧……”我说，“好吧。”

我努力压制自己对肉的幻想，可除此之外我只能想到加油站卖的方便食品：软塌塌的火腿芝士三明治，里面裹着生菜叶，淋了些微辣芥末酱；一袋玉米片，两颗凉掉的水煮蛋，装在一人份塑料包装袋里。算了，我还是回去我的土豆泥、肋排和青豆的异想世界吧。

我驱使自己继续想接下来的事情。明天早上，我将穿上我的蓝绿色比基尼，涉水步入北冰洋中。此行的刺激和活力将在那一刻达到顶峰，就在北极海岸线上，我将埋头下潜，背对冰冷的天空。这会是对北极的终极臣服，我会请乔伊记录下这一切，发到我和她的 Instagram 上。或许第一张照片里，我还处在震惊之中，咧着嘴浑身颤抖。下一张，我双手高举，摆出胜利的姿势，得意扬扬。可能我会请乔伊拍一连串照片，在电脑上做成定格动画，再配上音乐。将来我要把这段视频给我的孩子们看，看我曾经多么年轻又坚定，无所顾忌。我走进零下 5 摄氏度的北冰洋，穿着蓝绿色波点比基尼，从头到脚都展示着什么叫作强悍，什么叫作对生活说“是”。

“等我们到了那儿，我想带你认识几个女人，证明我不是这里唯一的女性。”乔伊说。

她让我不要误会，她很荣幸我找到的是她。但如果不想让我认识这里的其他女性，则是不诚实的表现。这些女性同样在极地建立自己的事业，忍受着恶劣的气候和孤独的处境，找到了养家糊口的方法。乔伊固然是唯一的女性卡车司机，可在北坡，仍有许多英勇无畏的女性活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这里的女人格外引人注目，”乔伊说，“也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彼此。”

她说我和她们的见面很重要，因为她们的故事也值得一讲。同时也应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到，是什么人在勇敢直面阿拉斯加的残酷极地。

“我想，你听说过——”乔伊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离家出走的巴士男孩（Runaway Bus Boy）？还有熊先生（Mr. Bear）？”

离家出走的巴士男孩和熊先生是两位美国男子，因善于忍耐阿拉斯加的偏远而闻名。克里斯托弗·麦坎德利斯逃离了他那物欲横流的失调家庭，在全国各地旅行，不拒绝搭便车等一切能助他前行的手段，最终，他在费尔班克斯郊外荒野上的一辆废弃校车里安顿了下来。几个月后，他死于饥饿，也可能死于有毒的浆果。但现在，他活在诱人的美式传奇之中：我们永远的少年，身穿法兰绒的彼得·潘，腰间挂着一把折叠小刀。他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追寻着尘世之外的某种东西。

麦坎德利斯如此广受爱戴，以至于费尔班克斯郊外的许多旅行团都推出了主题旅行路线，号称要跟随他的脚步去偏远的森林与河流探险，会途径麦坎德利斯的旧校车和他的遗体被发现之处。

“142 路巴士之旅，一睹克里斯托弗·麦坎德利斯最后的安息之地！”——“迪纳利荒野”导览项目对其如是宣传道。

这里的女人格外引人注目，也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彼此。

据我最近一次查看，这条路线获得了很多五星好评。熊先生本名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是另一位因死在阿拉斯加边远之地而著名的美国男子。特雷德韦尔放弃了他在下 48 州的生活，每年夏天都在卡特迈国家公园和灰熊一起生活。他认为熊是自己的家人，相信仅凭一人之力就能确保熊不会伤害他。

在多数人看来，他是个自恋的疯子，但他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灰熊人》的主角。这部电影由沃纳·赫尔佐格执导，他捕捉到了特雷德韦尔对熊独特的狂热，同时也聚焦于导致特雷德韦尔避世的人性：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孤独。

“真是个疯子，”乔伊对我说，“我才不管那个男人是怎么想的。熊会杀了你，它们想都不用想就会杀了你。”熊确实杀死了特雷德韦尔，不假思索。但多亏了赫尔佐格，我了解了一些乔伊所不知道的事情。我告诉她，特雷德韦尔并不是孤身一人，他死的时候，身边还有他多年的女友阿米·哈格纳德。也只有她，会出于对蒂莫西的爱而陪伴他在夏天前往卡特迈，尽管她很害怕熊，也相信熊可以杀死他们。

阿米身材高挑，有着金色的长发。在一张照片中，她穿着橄榄色运动衫，脖子上围着防蚊网。但在特雷德韦尔所拍摄的数百小时的影片中，阿米只出现了几秒钟。特雷德韦尔在叙事时坚持宣称他独自与熊共处，因此拒绝让阿米出现在身旁。

在电影的结尾，赫尔佐格探讨了阿米在片中的缺席——以这种方式向她致歉——并推测她在特雷德韦尔人生中的存在感比电影中呈现的要强。

我告诉乔伊，和人们所想的不一样，阿米并非和男友同时死去，而是在熊群咬死了男友后，才被袭击而死。在我看来，这表明了她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至死不渝。

“我们应该知道她，”乔伊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们应该知道好女人会为了爱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

我背诵了电影里的最后一句台词，来自验尸官的话：“阿米陪伴着她的爱人、伴侣、朋友——还有熊。最终，临死前，在她身边的是熊。”

乔伊沉默了许久。“验尸官没有骗人，”她说，看得出来她生气了，“别搞错了，她不是因为和熊待在一起才死的。像她那样——像我们这样的女人，我们会死，是因为和残暴的人待在一起。”

即使再也救不回阿米·哈格纳德，我们也要为她正名，乔伊对我说。我们要改写阿拉斯加的故事，从现在起，她将带我开启以女性为主题的旅程。

“我会把我知道的人都带给你认识，”她宣布，“我要让你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道恩。她在餐厅工作，是我的好闺蜜。”

道恩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笑起来像卡通人物。

“让人见了就忘不了，”她说，“你看到道恩就会笑出来，不过我不确定她是否在不在，不知道她今天是否当班。”她解释说，北坡的工人都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轮班：上两周，休两周；或者上两个月，休两周。北坡环境恶劣，尤其是冬天。在这里，一份工作的最大优势是可以时常离开这里。

乔伊说：“大家赚钱然后带回家，回家看孩子、约会，干些要紧事。然后再飞回北极，开始下一个循环。所以即便道恩不在，也会有其他人在，像是萨万娜和珍。”萨万娜、乔琳、珍——正是像她们一样的女性，让普拉德霍湾成了宜人之地，让乔伊的路途有了意义。她们或许不会开大卡车，不懂如何捆绑几千磅重的货物；她们涂樱桃润唇膏，戴十字架或生月石项链，在表象之下，她们有着同样的独立精神和专业素养。

“她们让这个地方变得有趣，”乔伊说，“很快你就会看到，这里的生活只与工业有关，只有工作工作工作。早上，工人们在永恒的夏日中醒来，或者，在永恒的黑夜中起身。钻井工人轮班工作十二个小时，从中午干到午夜，或从午夜干到中午。两周的轮班听起来短，但无不被孤独、寂寞和极度劳累所支配。如此循环，令人生厌。

“他们甚至星期天也要工作，包括圣诞节和感恩节。普拉德霍湾的工人能休息的唯一假期，就是超级碗。”乔伊说。

她告诉我，那里有一家很大的自助餐，供应蟹腿、牛排和大虾。

“现在你就能看到一些工地了，”她指着地平线说，远方的建筑像圣诞灯串一样闪闪发光，“它们看起来很小，但都是障眼法，其中一个里面有封闭式玻璃天井和瀑布呢，瀑布呀！”她笑着，“多数都有日光浴床、篮球场和电影院。”

我们眺望远方。

“还有爆米花什么的！”乔伊补充了一句。

所有休闲都是为了暂时摆脱孤独的纠缠——只能在记忆中重逢的孩子、配偶和家人，相隔数千英里、数个时区的家乡——以及摆脱这无穷无尽的冬天，从十月一直延续到来年五月，天地一片雪白，气温不时骤降至零下 50 多摄氏度，形成人类无法生存的酷寒。这片区域只有六个星期能免于霜冻，到了七月还在下雪。接着夏天来了，带来了无尽的白昼，北极植被在干裂的土地上抽芽：蓝色的勿忘我，粉瓣星点的印第安画笔小花，柔红的柳兰，紫罗兰色的山月桂。乔伊告诉我，盛夏的冻原像草甸一样绿，微风和煦，只是蚊子多，偶尔出现的海鸥会飞来内陆找垃圾吃。

“你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西部，”她说，“还会以为是多萝西的龙卷风搞的鬼。”

但你并不在堪萨斯州，你在阿拉斯加，这里的土地承载着持续的变化。

“我们开采的那座油田……”乔伊说，“它正不断地沉入地下。”

新建的建筑都要先打上混凝土支柱，否则内部热空气的辐射会融化外部，进而形成沼泽，最终整栋建筑可能会被吸入地下。

我们的车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即使在夜幕的笼罩下，我仍能感觉到巨大嘈杂的工业网络向外四射，波及那些游荡的麝牛、驯鹿、熊、红狐和北极狐。

“明天，我会带你去冻原拍一些电视上的那种照片，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

没有血，没有伤口，没有内脏，我是说麝牛和灰熊。你会打印出来挂墙上的那种照片。”我眺望远方，看到地平线上散落着红色的石油钻井平台。我们缓缓驶入城镇，经过了第一栋建在支柱上的房屋。男人们聚在仓库门口和皮卡车斗里，从十八轮大卡车上卸下一箱箱淡奶。现在是四月，天还是黑的，停车场的灯光却把四周照得如天堂般明亮。我把车窗摇下一条缝，想听听外面的声音，乔伊说这是她最喜欢的部分：漫长的独处之后，终于能从声音中得知其他人的存在。

“这是不是最美妙的声音？”

是的。我们周围，男人们在交谈、大笑、吹牛，用一次性纸杯喝咖啡。我们的车开过时，他们微笑着，有人还举起手向我们打招呼。他们蓄着山羊胡，剃着平头，手机挂在结实的腰带上。他们头戴棒球帽，身穿御寒的厚工装。他们穿着公司的雨衣抽烟，雨衣裹住腰部，袖子卷到肘部，他们眯起眼睛看了看天空，打赌雪会在哪停。尽管他们与我交集甚少，但现在，我们共同分享着美国最北端的夜色。

我们应该知道好女人会为了爱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

乔伊把车停进普拉德霍湾酒店前的停车场。

她说：“我相信有这样一个计划，上帝赐予你的东西，祂有一天也会拿走。不管祂设定了怎样的时间线，我都为自己能成为这计划的一部分感到荣幸。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简短祷告一下，感谢仁慈的神护佑了我的安全和健康，我也会感谢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久坐可不容易。”

她双手合十，低头祈祷。

我看着外面乳白色的天地，如同身处魔法水晶球之中。月亮低垂，冰与铁的世界在月光下熠熠发光。

“阿门。”她说。“阿门。”

我们解开安全带，走出卡车，乔伊突然停下来，向我伸出手说：“我很高兴耶稣爱我们。”

看着她的脸庞映在月光下，我的心又一次被击中，与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人。

“我也是，”我说，“我也是。”她笑了：“准备好搞点吃的了吗？”

“剩下的上等肋排？”我满怀希望地说。

“不是啦！她大笑着说“肯定都没了！但如果我了解这些男人——我确实了解——我保证他们会留点沙拉给我们。这么跟你说吧，在世界之巅，没有什么比沙拉更好了。”

好不容易来到世界之巅，我才不要用沙拉来做庆功宴呢。

以下是我吃的东西：一块 T 骨牛排，一条口味一般的炸鱼柳，大蒜土豆泥，杏仁煸青豆，蛋奶芝士通心粉——里面加了淡奶和新鲜的切达奶酪碎。看到芝士蛋糕和软饮机时，我啧啧称奇。在转角处的小白瓷盘里，还有我小时候喜欢的精美糕点：盖了一层奥利奥碎的巧克力布丁，里面还埋着彩色橡皮糖虫。

“我的神啊！”我尖叫道。

“不是的，宝贝，这是人。”乔伊笑着纠正我。她把托盘滑到我旁边，我看到她的盘子里堆满了新鲜生菜、罐头桃子和白干酪。

我豪饮了一口巧克力奶，想着再来个酸橙派或樱桃派。我把鱼柳对半切开，蘸了点第戎芥末酱。

乔伊低头看了眼我的盘子，皱起了眉头。

“没关系，”她说，似乎在安慰自己，“我想你还年轻，够年轻了。我们以后再处理你的问题，你还有时间。”

这并不是我当初想象的极地伙食。这里有迷迭香烤猪排和手搓肉丸，墙边还摆着调味品转盘，黏糊糊的瓶子里装着三种醋和四种辣酱。

“这棒极了！”我说。

乔伊告诉我道恩不在，所以由她来带我参观这间餐厅。她领我来到一整面墙的冰柜前，里面放着不含酒精的啤酒、气泡水、纸盒装巧克力奶、V8 即饮果蔬汁和各种能量饮料。有些品类我甚至从未听说过，除了红牛和摇滚明星，还有叫作“海狸嗡嗡”“毒液”和“NOS”的饮料，有个牌子名称很大胆，叫作“号哭”。

“公司规定，在普拉德霍湾不能喝酒，”乔伊向我解释道，“只要沾一点酒，你就

得丢饭碗。在这种地方可不能冒险，所以只能在饮料上多花点心思了。”

她身后的壁挂电视正静音播放着《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我们四周都是男人，他们嚼着饭菜，用叉子卷起黄油芦笋放到盘子里。他们中间似乎有着某种等级制度。乔伊确认了这一点，她点点头，暗示我看其中一张桌子。桌上男女各半，都穿着海军蓝防水夹克。

“领航员和领航员坐在一起，”她指出，“他们的工作是开着皮卡走在前面，看到有载货宽大的大型卡车就发出示警。卡车司机们坐在一起，”她示意我看向另外一张桌子，“满手油污的人也和其他手黑黑的人坐在一起。”我想我必须破除一个关于油田工人的迷思。接下来我在餐厅遇见的男人们，和里奇、唐纳德并无两样。他们给我看各自石油钻井平台的照片，分享北坡最大的一次风雪，给我看缓冲慢的模糊视频，那里面是他们某天晚上走到外面观赏到的北极光，震撼极了。他们和我谈起那些好女人——妻子、女友、母亲，她们在等他们回家，支持他们从事现在的工作。她们是堡垒的卫士，是他们的基石和背后的力量。

我原本以为这些男人会表现得不屑一顾——对乔伊，对她的工作，也对她身边的我。我承认，我以为越往北走，遇见的男人就会越粗鲁无礼。在我脑海中有一幅图景：那些男人选择生活在美国最后的大游乐场中，正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无法无天，他们可以肆意调笑，讲荤段子，品评我的胸部和嘴唇。而面对这些骚扰，我只能忍气吞声。

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遭受虐待的人，会假设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受到虐待；看到任何与虐待者有相似特征的人，会假设将遭到此人的虐待。内心的慷慨、包容皆离你而去。这样的猜疑毫无益处，只会使人错失快乐。你的智识不断试图去预判、筹谋，然后逃之夭夭。这种“战斗或逃跑”的行为驱使你带着敌意面对这个世界。它不会使你圆满，更不会使你获得力量。

相反，它让我感到十分渺小。

这些男人在我们身边，坐在整齐的长凳上，跟我讲着他们的孩子又抓到了什么鱼，在少年棒球联盟上取得了什么成绩。那些孩子在科罗拉多州、密西西比州、缅因州等。这些男人留着胡须，有着圆圆的大眼睛，他们伸出画满文身的手臂去打可乐，同时讲述着孩子们在充气城堡里举行的十岁生日派对，正计划的浪漫惊喜之旅——去全包式桑德尔斯度假村弥补一再错过的周年纪念和情人节。

来到普拉德霍湾酒店时，他们又饿又乏，空虚寂寞，只能从意大利饺子上收获慰藉。他们想念随处可驾车抵达的世界，可以点到大虾炒面的世界。他们告诉我，这里太艰苦了，那么偏僻，那么寂寞，还好有乔伊永远友善的脸庞和充满活力的笑容。他们深情地说出她的名字，告诉我同一件事：乔伊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

一名男子提出要带我们去坐飞机，或者去育空河淘金。我为自己此前的判断感到羞赧，为自己的偏见感到惭愧。

我笑着回答他，看情况吧。其实我是为了和乔伊待在一起，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也并非感到自己像个不属于这里的闯入者，我只是不想失去任何与乔伊相处的时光。

乔伊搂着我的肩膀，几个男人鼓起掌来。“你做到了，”乔伊说，“你抵达了世界边境。”接着她对人们说，“这位是辣妹，她的名字将会传遍世界。她是我的朋友，辣妹！”

辣妹和“卡车妈妈”，我们举起塑料杯，一杯巧克力奶和一杯无糖杏仁奶碰撞在一起。旁边的男人们也举起杯子，参与到这欢庆的时刻。我们碰着杯，高喊“干杯”，说着祝贺的话语。

乔伊满意地笑着，说：“我们该休息一下了。”我们正准备离开，一名油田工人用右手神秘地打了个手势，说：“姑娘们，如果改变主意了，就冲我喊一嗓子，我给我那台老四轮车加满油，带你们去冻原上走走！”

“这是什么暗语吗？”我贴在乔伊耳边说，而她只是看着我，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可经过大堂时，乔伊在前台停下脚步，转身四顾，在架子间寻找着什么。这时萨万娜出现了，我还没来得及介绍自己，她和乔伊就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尖叫起来。

你做到了，你抵达了世界边境。

“乔伊！乔伊！乔伊！”萨万娜喊道。

“萨万娜！”她们抱着跳着，乔伊喊道，“哦哦哦！这是辣妹！埃米！我的小教授

朋友！”

萨万娜浑身散发着温暖的光，双颊泛着柔和的桃红。萨万娜欢迎我来到普拉德霍湾郊外，来到戴德霍斯，告诉我这里和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只是现在天黑看不清楚。萨万娜的工作是为客人登记入住，办理退房，以及经营礼品店，店里出售糖果、杂志、薰衣草沐浴珠、炫彩运动衫、啤酒杯垫、设计俗套的烈酒杯，还有上面印着“北坡民兵：上帝，枪炮，石油”字样的棒球帽。有的帽子上印着普拉德霍湾的轮廓，最北端绣了一颗星星，下面写着“到此一游”。

乔伊和萨万娜热火朝天地聊着冰钓，我则浏览着店里的T恤，拿了一件绿色的T恤放在胸前比画。T恤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北极熊，它看起来很无聊，表情冷漠，似乎对这个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北极熊下方是黑色加粗的大字“普拉德霍湾”。

我拿着这件衣服去结账，萨万娜转身把它塞进了塑料袋里。

“哇，我也最喜欢这件绿色的。”萨万娜说。

接着她带我们走出大堂，乔伊晕乎乎地靠在我身上，像分享秘密似的低声说：“我从没在这儿过夜过！”

她告诉我，通常她只在这里逗留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用来吃饭聊天，另一个小时去健身房锻炼，举举铁，为穿比基尼做准备。她对我晃了晃手指，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即便是半夜？”我问。

“当然喽。”她笑着说，“得赶回家见老公孩子呀。”

萨万娜转过身笑着说：“但你总会来跟我打个招呼。”

“那是必须的！”乔伊说着，轻轻掐了下萨万娜的胳膊，“运输公司对送货时长有很严格的规定，所以我总是回到冻脚营地才睡——我还是会睡的。这次是全新的体验。”

“这么说，这次算是外宿咯。”我说，“我们可以熬夜，然后给对方化妆！”

“还可以互相做美甲，”乔伊补充道，“谈谈接吻和男孩之类的。”

萨万娜带我们走进客房，那里只有两张双人床、一对床头柜、一个小书架和一台20世纪90年代产的电视机——像黑色的大方块。

这已是我们所需的一切。

我们放下行李，乔伊看向萨万娜，两人对视了许久，一言不发。

“很高兴见到你，”萨万娜最后说，“好久没见了。”

“确实很久没见了，”乔伊说，“我有段时间没工作了！我受伤了！”她抬了抬腿以示强调。

“我知道。老实说，我都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可把我伤心死了。”萨万娜说。

我开始明白乔伊所说的，是这些女人让普拉德霍湾变得宜人，让她的旅途有了意义。她们或许不会开大卡车，却具备不逊于其他人的专业精神，而这种品质往往被忽略。

萨万娜倚在门框上，眉开眼笑。

她说：“好吧，我得走了。你走之前再来找我。”

“明天一大早就去找你！”乔伊说。

萨万娜走后，乔伊环顾房间，咧嘴微笑。

我们坐到床上，打开背包。我从里面拿出专为此地准备的卡哈特背带裤，还有一双羊毛袜和一件依旧气味芬芳的圆领衫，是鲜花和佛罗里达柑橘的香味。乔伊把包包得像瑞士卷似的衣物展开，是一条亮粉色运动短裤和一件诺克斯堡金矿的帽衫。她脱掉衣服，穿上运动裤，在腰间系好松紧带。

“我去健身房骑一会儿动感单车，”她说，“我的精神已经累了，但我的身体不累。”我说我要去洗澡。

“我身上一股尿骚味。”我说。

浴室在大堂的另一边，一条狭窄的走廊里有几个淋浴间和厕所，还有一台用于空间除霉的工业级烘干风扇。水是热的，可廉价织物浴帘在热气的裹挟下不断往我的小腿上贴，我刚用脚把它蹭掉，它又会立刻黏上来。

这里真好，我想——在美国的边境之地，还能有淋浴间可以洗澡，享受着安全洁净、舒适温暖的环境。这本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但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安全了。

接下来，从神经末梢传导而来的喜悦，通过神经递质瞬间席卷了我的大脑，那么简单纯粹的快乐。我是什么时候成了这样一个女人，会因难得的独处而感到愉快舒

适？我是什么时候抛弃了力量和勇气，只为换取一个令我变得软弱的男人？

我闭上眼，回想起7岁那年，那时我十分能干，一个人就能把鱼钩甩进水里，鱼钩划破湖畔绿树映在水面的倒影。

然后想到我11岁时，和哥哥弟弟一道在家后面的田地里奋力拨开灌木，从比我更高的马利筋和香蒲间穿过。

16岁，我乘火车去费城，参观特罗卡德罗剧院和马特博物馆，在那里看到了一柜子有关窒息危害的文件，研究了各种用于扎入和刺探人体的医学器材，还端详过一套整齐排列在书架上的人类头骨。

24岁，我搬去与家相隔五个州的大学攻读研究生，第一晚我一个人在家熬夜，吃比萨饼，喝啤酒，听着流行音乐拆箱玻璃杯。

我曾经是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即便独自一人也不会忘记追寻快乐。可现在，我30岁了，却不知我的快乐都去了哪里，不知怎样才能找回它。

我冲洗干净，用毛巾裹住身体，站在浴室镜前，抚过身上的线条和皱纹，摸着鼻子的曲线。工业风扇在呜呜作响，抽走我身上的水分，我突然觉得有一件事比一切都重要：我是一个带着很多遗憾的女人——做错了很多事，走了很多弯路——但我犯过的最大错误是，让一个男人来决定我是否值得，并且当他说我不配时，我选择了相信他。

从浴室回来时，我看到乔伊把脚抵在墙上，做着拉伸和放松的动作，同时还在用手机软件听西班牙语——动物词汇单元。她不时停下动作，翻过身来趴在地上，用手指按住手机。

“多线程工作。”她解释道。“看出来了。”我说。

“El oso”手机播放道，“El oso”乔伊跟着复述。

我跟她说，尽管我学习了几年法语，还在国外生活过七个月，但我对法语的理解停留在七年级的一次露营。

“Raton laveur，意思是浣熊。”我告诉她。

乔伊笑着耸耸肩：“法国，我一直想去看看。”

“你应该去。”我心不在焉地说，好像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我死之前会去的。”乔伊笑着说，“但这种旅行要花很多钱。”

21岁的我并不懂这是多大一笔钱，当时还买了薰衣草香皂寄回家。直到此刻，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笔钱对很多人而言是负担不起的。

多么希望我可以回到过去，把这趟旅程送给乔伊。

“唔，好吧……”她说。我们人生的差别不言自明，但这也是乔伊最大的优点：她似乎并不在意，也不去评判这些差别。

乔伊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从背包里掏出洗漱用品：一块肥皂、几根牙线，还有一管上面写着“发泡剂”的天然牙膏。

“发泡剂是什么？”

“不知道。他们承诺说里面不含氟和甘油，但我只是喜欢他们的广告语：‘祝你旅途愉快！’，这不就是我在做的事！”她说。

“应该是‘乔伊旅途愉快’。”我调侃道。

她拿起枕头打了我一下。我从包里掏出我的比基尼——蓝绿色，点缀着波点，沿着腰部收紧。



由乔伊拍摄的作者，图片来自乔伊Instagram

“明天我要去北冰洋游泳，”我对她说，“早上 8:30 和下午 3:30 有班车出发，你可以和我一起下水，或者站在岸上帮我拍照。”

对于像我这样不在油田工作的人，搭乘戴德霍斯北冰洋穿梭巴士是进入水域的唯一途径。这也是为何有大量游客从费尔班克斯乃至安克雷奇飞来普拉德霍湾，却只待上一个下午。这趟行程可不便宜，费用包括导游和巴士，还有为防止恐怖袭击而进行的强制背景调查。网站显示，他们保证提供原汁原味的北极体验。浏览评论你会发现，这条路线在老年游客中颇受青睐，尤其是刚退休的夫妇。他们攒了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钱，终于可以一睹美国极北之地的风貌。

“啊！坏了！”乔伊懊恼地摇摇头，“这条旅游线路只在五月到八月之间开放，辣妹，我们恐怕来早了一个月。你可能没看清细则，就连我也没法让他们通融。”

我想拥有一个勇敢的瞬间，想要感受我的身体在北冰洋的寒冷中挣扎，想要感觉自己被净化了，获得新生。我无数次想象过这个画面，想让乔伊帮我拍下来，想把它摆在我的办公桌上。我觉得它应该能代表什么，比如证明我已经找回了一度丢失的东西。

等到有同事或学生问起，我都会酷酷地说：“哦，那个呀，那是我在北冰洋游泳。”然而现在，我不得不在距离北冰洋 8 英里的地方停下来。

北极是什么样子的？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该如何作答。说这里出人意料得整洁、舒适、古朴？我花掉自己一个月都赚不回的钱，飞去阿拉斯加北部，尽情享用全熟牛排、芝士面条和烩土豆？这里精心准备了丰富多样的甜品，用来招待那些温和有礼又充满好奇的男人，他们会兴致勃勃地和我聊他们的孩子？没错，这里有北极熊，偶尔能看到；没错，这里有时会刮大风，但多数时候我眼前都是发霉的地毡，十二小时轮班的工人，以及一盘盘馅饼。除此之外，粗糙的床单、袋鼠蘸酱饼干、《莫里秀》、福克斯新闻，算吗？

有那么一刻，我想笑自己怎么突然这么蠢，居然对一个瞬间如此执着。不管那场标志性的泳游不游得成，能睡在北阿拉斯加的一间小屋里，靴子里塞着几张 20 元钞票，已是特权。也正是这份特权，让我能够离开俄亥俄州。我有足够的实力支付三段航班和一间安全的酒店房间，可以暂离工作一周，并且就算在北极遇到紧急情况，也有医疗保险的保障。在特权的加持下，像我和乔伊这样的白人女性，即便遭遇不幸，也会有训练有素的专业救援人员来搜寻我们，把我们运出北极；即便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至少也会有人来讲述我们的故事。

我爬上床，裹紧被子，头发湿漉漉地披散在棉质枕套上，水沁入织物的纹理中。窗外，油田上的可移动集成房屋里点亮了星星灯火。我闭上眼睛，感谢自己来到了这里，和戴夫之间隔开了一段距离。感谢我们的床和床单，尽管它们有些硬、有些粗糙。感谢乔伊的友谊，感谢我们温暖的房间。感谢这个夜晚，它就像从天堂垂下的一根绳索，把我们牵离公路，远离种种危险。

乔伊爬上房间另一边的床。

“我可以为我们祷告吗？”

“当然。”

乔伊从背包中取出《圣经》，我听见她翻书的声音。“大卫的诗！”她大声宣布。

我闭上眼睛，清空思绪，聆听她的话语。多年来，在戴夫身边，我一直试图扮演另一个人，假装信仰着身边人的信仰以求得到喜爱，以求不被抛弃。但我不想在乔伊面前伪装自己，她允许我看到她的一切，那么我也报之以同样的真诚。

乔伊读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我想象着曾经的我，那个女孩住在青翠的牧场上。我看到幽深的山谷，看到我和戴夫养的小狗，它小小的尾巴疯狂摇摆着。我看到那些夜里，它觉得有必要挤在我们中间，充当我们身体之间的缓冲物。我看到自己蜷缩在马桶后，看到自己站在街上大哭。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乔伊念出最后一句。

我想象着美德，想象着爱，它们像外套一样可以穿在身上。我想象自己去哪儿都穿着这件外套，想象穿着它待在一间没有伤害的房间。

我听到乔伊坐起来关灯，床垫被压得吱吱作响。随着开关清脆的转动，床安静了下来，四下一片空寂。

“我喜欢这一段。”我在黑暗中说。

“是吗？”乔伊笑着说，“上帝是美善的。”

我咀嚼着这句话，上帝是美善的。

外面，雪花在灯光下打着旋儿。接下来发生的事，或许终究是上帝的旨意，也或许是受到乔伊的感染，它的发生是因为我们都感到安全，因为我们的身体都疲惫而温暖，因为我们待在一起。

“乔伊，我的男友戴夫……”我说，“他对我吼叫，他把我逼到角落里，一直吼，直到我倒在地上。”

雪花旋转着，在漆黑夜空画出白色的残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里，因为我觉得必须来？为了让我和他之间产生距离？我是个聪明的女人，乔伊，我真的是，但我还不能清醒地看待这件事。我总觉得来到这里，看看世界有多么美丽广阔，不光是北极和普拉德霍湾，而是一切。我想这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改变。”

乔伊沉默不语。我想告诉她，内心深处我已经开始相信我们彼此相通——我就是二十年前的乔伊，她就是二十年后的我。前提是，我能重整生活，离开糟糕的男人，迎接更好的感情，用我所学的知识做点有用的事。帮助其他女性，就像乔伊帮助我一样。

我告诉她，我倍感羞愧。我的脸在北极的暗夜中烧得通红。

“天哪，我不知道，我那么努力去做正确的事，过去、现在，一直都是。但我总是落到被男人牵制的地步，舍弃我全部的力量、坚韧和优势。这次，我选的伴侣尤其粗暴，但我没有离开他，因为我怕自己已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了。”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的天，这是不是你听过最愚蠢的事？”

我听到乔伊起身，床单摩擦床垫的声音。她坐上我的床，把身子挪到我旁边，一手抱膝，一手紧紧地搂住我。我感到她的手掌覆在我的额头上，她的另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我的手，握住了它。

“不，不，”她重复着，“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蠢。”

除了我的心理医生，她是第一个让我能直白讲出这段遭遇的人，讲出戴夫对我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看着窗外的雪越积越厚，我期待听到充满智慧的话，但乔伊什么都没说，只是摩挲着我的脑袋，开始哼唱一首我没听过的赞美诗。被子下我的身体非常温暖。她的手掌温暖着我的皮肤。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们看着外面的雪花转啊转啊，我逐渐感到恍惚起来。

我快要靠着乔伊睡着的时候，她起身没入了黑暗中。“公路有很多种方法来治愈人，它也会治愈你的。”她说。

我非常想相信她，但如果我们都想错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接着说：“无论如何，现在我知道了。相信我，我说过，我们是灵魂姐妹，对吧。”



埃米·布彻

美国作家，散文家。长期为《格兰塔》《纽约时报》等知名刊物撰稿。2016 年受《纽约时报》之邀撰写的文章《emoji 表情符号女性主义》引起巨大反响。目前任教于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担任创意写作课程主任兼英语系副教授，与三只美丽野兽”营救犬一起生活在俄亥俄州。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McGill Library](#) on Unsplash

## 行者

学习任何真正重要的技能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比如演奏大键琴。首先你需要购买一台，再把它抬到阁楼上用毯子隔音，最后在家人睡着的时间里夜复一夜地练习。在闷声练习数夜后，可以开始尝试《雅克兄弟》，接着是一些尚不稳定的琶音和弦，坚持一阵后便能弹奏亨德尔的曲子了，愉悦也随之而来。愉快地演奏大键琴、长号或者其他乏味的乐器——比如心灵——都是终生事业。当然，一生也并没有那么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尽快开始学习。蟒蛇宝宝学习如何收缩，克莱兹代尔马宝宝学习如何被驯服，野马宝宝学习如何不被驯服，山雀宝宝学习如何发出唧唧啾啾丁零当啷的声音。

破壳而出后，白颊黑雁的雏鸟会发现一直以来向往的热源是自己的父母，隐隐约约察觉到的光线则来自太阳。假以时日，他们还会了解什么是苔藓地、莎草地、迷迭香草地，以及格陵兰岛上的其他绿地，知道虎耳草初尝发苦随之回甘，明白飞翔是代代相传的技能。再到后来，他们会长出强健的羽翼代替柔滑的绒毛，长途飞行至赫布里底群岛过冬。他们会飞过水面，飞过森林，飞过卡兰尼什的巨石群，飞过管理动物的人类的头顶。然而在最初的七周里，他们只是毛茸茸的行者。

如果只是如此尚且可以称之为现实。不过现实总是比想象中艰难。虽然幼鸟要在几周后才能学会飞行，但刚孵化没几天的他们却不得不飞离巢穴所在的四百英尺悬崖。父母无法携带他们下山，也无法整日从山谷带回微薄的草料，至少无法坚持数周。家长飞走，孩子只能跟上。这有点像是要求消防员在出生后的第四天就奔赴火场。消防员、解经师和墨西哥流浪乐队都需要经过数年的培养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就连彼得·皮尔斯也不是在威格莫尔音乐厅的舞台上横空出世的。谁能想象婴儿时期的彼得·皮尔斯大唱“市民们，我来解救你们了”呢？

## 非虚构

# 一座纸上动植物园， 走近诗意图怪的微观宇宙

艾米·里奇 | 新书试读

一场精骛八极、  
心游万仞的自然之旅。

《万物交响：驴子、随笔与喧嚣》是一本奇妙的文学故事集，一本关于宇宙、自然与日常生活的书。作者艾米·里奇以顽皮狡黠的方式观察世间万物，描述的对象从小小的飞蛾到中世纪手抄本上的野兽、花朵，从刺猬的烦忧到蓝莓的善意，从动物到植物，从星空到海洋，从大自然的宁静到喧嚣，不一而足……

经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授权，我们摘选了《行者》和《急板乐章》两个章节分享给读者。



白颊黑雁  
Charles Tunnicliffe. Barnacle Geese

当然，在格陵兰岛树木丛生的时期，鸟类可以在木兰树上筑巢。刚出生的雏鸟会等到小羽翼干透后开始磕磕绊绊地自己吃草，尽管那模样十分滑稽。但后来树林结冻倒塌，没有树林便没有秘密。部分鸟类决定带着他们的秘密离开海岸去往岩石岛屿——这一选择颇为巧妙。还有一些选择了不那么巧妙且更易引起眩晕的地点。白颊黑雁的飞行能力仅仅稍强于矮种马，可他们仍然需要飞跃悬崖，在地面没有人举着斗篷的情况下。

所以雏鸟很快便意识到蛋内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蛋壳足够坚固，能支撑成年白颊黑雁的体重；足够宽敞，能容纳被迫聚集的成员；足够约束，能免去所有责任和义务。无论好鸟蛋还是坏鸟蛋（有的鸟蛋会爆炸），都是合格的决定论者，能够为所有的生活状况找到前因。合格的决定论者就像是弹球游戏、阴影，以及发条鹅诞下的锡蛋一样——发条鹅本身也是决定论者，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基于钥匙转动了多少次，面对哪个方向，底部塞了几个蛋。不过一旦她下了蛋，便也绝了后：因为锡蛋无法孵化出锡制决定论者。决定论逐渐消亡。

开始孵化后，没有谁能预知自己的未来：父母可能会将鸟蛋放置在朴树、仙人掌、蕨菜或不可理喻的悬崖边上。对于部分鸟类而言，自由是有趣的。朴树上的鸟儿可能会享受那即将到来且不可逆转的自由，但对于需要自行离开巅峰的白颊黑雁来说，自由仿佛应召入伍。

长大后的小鸟或许会表示抗议：我是口袋里的零钱吗？是你临时捡来的吗？但刚出生三天的幼鸟还不足以懂得怎么发脾气，也不懂任何人都可能是临时捡来的；却足以被饿死，足以感知到某种深刻的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一旦消失，他们便会从悬崖飞驰而下。妈妈在的时候，巢穴舒适贴心；妈妈不在了，便是流离失所，他们就

像太阳飞走时的地球。

有的鸟类则过着值得被歌颂的生活。蓝山雀一天能被母亲哺喂上千次，蛇鹫的母亲会给孩子带来去了头的蛇。鹤鸵的母亲从不飞离，因为他们并不会飞。有的鸟儿会出生在两千根羽毛组成的膨胀式巢穴或温馨狭小的碟状巢穴内，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吹毛求疵，妄想自己的孩子在学会飞行前就开始飞行。他们的第一次飞行可能是从一段原木上掉下来。在原木上下飞来掠去的小鸟或许就是精灵和仙子的灵感来源。

小行星的后代是最轻松的，比如巴堤斯帝纳星系里的成员，每一个都在太阳系周围跌跌撞撞，冒冒失失的这个叔叔、那个女儿、各种祖先，在卫星上弹跳，震动不同的世界，留下他们的印记，他们的克罗科环形山、德雷贝尔陨石坑、布莱格撞击痕。巴堤斯帝纳小行星可能并不是灭绝恐龙的罪魁祸首，但如果确实是，那他们一定早就忘了这件事。他们从来不会失去冷静：当家族分崩离析，只会繁衍出更多的小行星。如果曾经出现过一位堂兄阿隆佐，那么现在可能就有 17 个堂兄阿隆佐。

不过白颊黑雁没有冷静可以失去，他们失去的只有温暖。他们比岩石更加忧郁，不可分割。岩石不会因为离别而悲伤，也从未经历过艰难——或者可以说，我们只会见证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岩石身上发生。但艰难能够激发不可能之事：从不会唱歌的人那里听到歌曲，在唯物主义的思想中发展形而上学，让小小的行者学会飞翔。艰难就像是有人敲着平底锅跑向你一样。起初母亲的飞离也许是一种对毅力的考验，雏鸟发誓会等到她回来的那一天。而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誓言也愈发绝望——我会等到你不再回来的那一天，等到永远的最后一天。

然而，如果你太过饥饿，便连靠近食物也无法做到。食物是不会追着你跑的，你只能自己努力，以免为时已晚。饥饿感变得尖锐，耐心沦为诅咒，心脏失去血色，白颊黑雁雏鸟从不会停止跳动。旅鼠和鸥鸟等潜在观众也从未停止喝彩，但我们难以观赏几乎不可观察的画面——灰色的毛球从灰色的悬崖上滚落——以及往往以不幸为结局的故事。只有他们的父母最终出席，在碎石坡上等待重聚。

荒谬的垂直线下方可能是广阔的高原。高原自身的第一反应或许也是感到荒谬——荒谬地广阔，荒谬地平缓。能够整日啃食羊胡子草是多么荒谬的事情！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连羊胡子草也会显得平平无奇。甚至草莓都会成为既定事实，与日常拼写无异，除非你想尝试使用以撒以撒族或约塔约塔族的语言进行拼写。如果你认准了既定事实并且遵循英文的拼写方法，那便可以继续发展你的强项，获得一些结果、地位、优先级。有的人想要进入聪明阶级，有的则希望进入永远阶级，还有的人只想每年有两周的时间在土耳其式浴室里以有益健康的方式挥汗如雨。



白颊黑雁，出自《美国鸟类》  
(John James Audubon's Birds of America)

地位理应与视角相称：站得越高，看得越远。但那些自诩比起雏鸟更无所不知的存在可能会对宇宙视而不见。被困在格陵兰岛悬崖边的白颊黑雁渺小无助，只得望向如鬼魂般惨白的月亮，如意趣般消逝的迷雾，望向层层叠叠的乌云，和眼下的冰山与绿谷。在这幅全景图中，他们唯一看不到的是自己——尽管这并不一定对视野造成任何影响。但如果同时满足某些要素，他们也能够充分认识自身。站在山顶朝着背阳的方向看去，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巨大阴影，周围还有一道光晕。雏鸟、将龙船举过头顶的维京人、穿着过冬外衣的白鼬，都是可以被放大的——没有谁会因为过于微小或庞大而无法被放大。

如果故事里的某个角色做了极其危险的事情，比如从悬崖上跳下，一般来说他的脚下会架起一座桥，或者他会变身为一只海鹰。勇气通常由魔法验证，而魔法总是轻便的——英雄从来不会变形为河马。但对于白颊黑雁而言，魔法是不存在的东西：雏鸟一旦离开崖边就会开始下坠，不得不受到轻风、岩石、失望的威胁。空气乐于承受傻瓜，但地面不能。

梦想化身为鸟儿的人们所想的不是羽翼未干就不得不窘迫下坠的幼鸟——在世界

之巅孵化而出的脆弱幼鸟，他们不得不跳下悬崖，不得不拿出与年龄不符的勇气，几乎还未积累任何时间或物质，目光可及仅有月亮与太阳、山脉与峡谷，以及似乎没有来源的风。

乱七八糟的风：如果没有其他的验证方式，那么只能交给风，交给天气来验证，无论我们的经历长达三天还是三十年。如果你感觉到微风吹拂着你的羽翼，细雨落在你毛茸茸的头顶，那么这便是在经历天气了。与“摔跤”“口哨”“飞行”一样，“天气”在英文中也可用作动词。你不仅仅是天气被动的承受者，不仅仅是被淋湿的，被风吹的。天气是我们之中最具临时性的，也是最不具临时性的。我们经历冬天，经历夏天——不过对于从未孵出、从未离开舒适巢穴的小鸟来说，并非如此——在春天起跳，在秋天下坠。

## 急板乐章

一开始是没有“土拨鼠”这个词的。那时没有土拨鼠的存在，也没有祖母或者事件协调员的存在。早期虽然也会发生事件，但它们就像通古斯大爆炸那样缺乏规划。过去什么都没有，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词语。在某种程度上，词语缺失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如今的你在见到某些人的时候的确会只想让对方住嘴。我们的星球变得比其他星球唠叨得多，只有在与老鹰或天使相处时才有喘口气的机会。老鹰从不解释任何事情，不可见的天使也不健谈：可见性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

不过，你仍然时不时地会遇见既可见又健谈的存在；然后你便只想让对方住嘴。这永远不会在海王星上发生。除此之外，所有花朵，以及有关花朵的词语，让我们能够沉浸于野花的各种八卦，比如金防风过早开花，艾菊又怎么叛逆了，茄子如何爬上老实的植物，圆齿野芝麻昨天晚上在风中狂舞。(圆齿野芝麻的可见度异常之高。)

野花的丑闻也是可以谈论的。有的事情可以谈论，有的则不可以，就像有的事情是可能的，有的是不可能的，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一年级学生希望长大后成为可能的存在——宇航员和消防员，但幼儿园的孩子想要变成猫头鹰、汽车和三明治。还有一些遥不可及的人士仍在谈论不可谈论的事情，比如：时间有多快？时间加上时间是什么？一小时有多少个瞬间，一下午又有多少个不远的将来？多少次快才能构成一次慢？

某一天，我找到一本勃拉姆斯的钢琴曲谱，开始慢慢地，非常慢地，比缓板还要慢地弹奏一首幕间曲。我认为那首曲子在这种节奏下是最绝妙的，但后来我在广播里听到别人急速地演奏同一首幕间曲——我弹一遍的时间，她可以弹四遍。在这种情况下，四次快可以构成一次慢。我父亲九岁的时候，他的父母让他在教会演唱《圣城》这首歌，还有他四岁的弟弟丹尼负责踩动自动钢琴的踏板。起初歌曲正常演唱着，但到了后来，丹尼便坚持不下去了，踩踏的速度越来越慢，父亲本杰不得不越唱越慢，直到“耶——唉唉唉路撒——啊啊啊冷，耶哎哎——”这个词唱到一半时戛然而止，观众放声大笑。接着丹尼又找回了力量，歌曲继续，之后又再次放慢，停了下来。

时间似乎就是这么不稳定，一会儿比急板更快，一会儿又比缓板更慢，而我们总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跟上速度或放慢到令人尴尬的节奏。不过无论快或慢，还是断断续续，一首歌曲总会结束。一个小时也像一首歌那样，终会过去。许多事情都有着三叠纪时代的特征。孟德斯鸠为自己命名，蚊子也是如此。温泉部落的人们从冬天居住的村庄搬到夏天居住的村庄再搬回去。冰柱被动地形成，又被动地融化。有些人失去了自己的名声，有些人则失去了自己的独木舟。牛仔失去了牛，成为孤独的“仔”。民族诞生，接着扩散蔓延。与此同时，长颈鹿的表现过于良好以至于我们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你还会发现有的人整晚阅读着《他们为什么不听？》之类的宣传册。时钟一丝不苟地嘀嗒作响。人们周而复始地打着招呼出现，又周而复始地说完再见后消失。普遍性不断得到补充，但你从未真正与普遍性问好或告别。

对于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言，更多事情并没有发生。许多人没有出现，许多人出现了但只是昙花一现。埃克哈特大师不是昙花，但也没有开上玛莎拉蒂将通古斯的所有森林夷为平地的事件没有影响到德里、基多或康涅狄格州的温斯特德。甚至玛莎拉蒂出现之后，也没有影响到所有人的认知，就像同样没有多少人知道五十雀一样。许多人一直未能拜读《白鲸记》，所以他们也永远不会意识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为阅读这本书做准备。

而一切正在发生以及尚未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来到了此时此刻——比教会寿命短得

多的猫跑来跑去，比教会历史更悠久的树木屹立不倒。然而我们仍对时间一无所知。在无数时间过去以后，依然对时间一无所知。不过可能有些事情要等到你被叫作祖母时才会明白，比如时间的节奏，比如祖父母们总是念叨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或许所有的慢能够累积成一次快。或许这就像是手握着一杯水坐在花园里，某个激动不已的人跑过来告诉我们：“水是蓝的，水是蓝的，看到了吗？水是蓝的。”但当我们看向杯子，水并不是蓝色的——它看起来是透明的，就像是稀释剂一样。我们把它加进威士忌，加进牛奶，使之更加清澈、清淡，喝上去更接近清水的味道。只有一样东西是水稀释不了的，那就是水本身。水加上水再加上水就会变成蓝色。越来越深，越来越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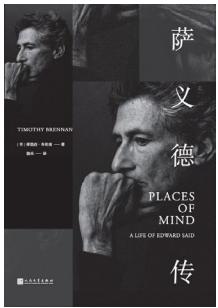


艾米·里奇

作家、教师、合唱团钢琴师，现居芝加哥。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于爱荷华大学获得非虚构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位。2008年，荣获罗娜·贾菲基金会作家奖。2010年，荣获怀廷作家奖。2011年，荣获手推车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非虚构

## 萨义德： 一片土地，两个民族

蒂莫西·布伦南 | 新书试读

追踪萨义德思想演变的轨迹

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裔美国知识分子、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爱德华·萨义德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突破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名著《东方学》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每个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做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必读书。

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在开罗度过青少年时期，未满十六岁就到美国读高中，毕业后入读普林斯顿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既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又在电视节目上进行辩论，他的写作和演讲改变了大学的面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来自边缘地带的作家和学者提供进入大都市的机会，并且永远改变了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舆论风向。

蒂莫西·布伦南历时八年，广泛征阅相关文献档案，包括萨义德未发表过的文章、小说草稿、私人信件等，采访了萨义德的家人、朋友、学生甚至对手；他追踪萨义德思想演变的轨迹，再现萨义德每部著述的缘起与影响，撰写出这部关于萨义德的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性传记。

经99读书人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十一章《一片土地，两个民族》分享给读者。

1993年以后，萨义德的政治生活几乎完全围绕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建立一国的目标展开。他不得不认同乔姆斯基的观点，即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直接要求建立巴勒斯坦国，等于“给以色列右翼创造天赐良机”。因此，两人急于区分行动实施的先后顺序。前者需要分阶段进行，首先是两国方案，然后是调解、边界的消融，最后类似联邦制安排，引向一个双民族政体。

在构想实施之前，萨义德再次受到来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方面的攻击。他在1993年的《原则宣言》，即官方称为《奥斯陆协议》之后（1995年又签署了一个单独协议）所写的文章和接受的采访，最终可以汇成五卷。起初，协议得到的热烈反响，巴以两阵营的关键人物均对协议的签署表示欢迎，相当一部分公共舆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表示支持，尤其是在美国。

在巴勒斯坦领导层看来，《奥斯陆协议》的主要成就是在西岸和加沙有了小部分自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了立足之地，而耶路撒冷的地位、非法定居、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或承认巴勒斯坦是主权国家等内容都没有涉及。协议确立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称赞，萨义德却独自扛起重任，指出这是一种背叛——并非一次完全圆满的协议，如媒体描述的那样，而是“和平进程的终结”。据他儿子瓦迪说，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始终没有走出愤怒的阴霾。

盟友恳请他不要在沙上画这道线。无论协议尚且存在哪些缺陷，坚决表示反对会有使其孤立的风险。策略上说，更好的方法当然是等待时机。萨义德却仍然对协议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抨击，而在那之前，他一直持和解立场，更显得后来的抨击之猛烈——正如奥戴德·巴拉班（Oded Balaban）在《另一个爱德华·萨义德》中所做的观察。此文最初是以希伯来文写就，发表于设于海法的刊物《眺望》上。巴拉班写道，尽管萨义德引来颇多非议，他在大部分时间里所持立场都是非正统的，他在本阵营的人之前率先承认以色列国，强调犹太人遭受的苦难，而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的，并且坚持双方应该互相承认。

如果有人格外留心就会注意到，他的合作者显然始终包括研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犹太裔人士，他也愿意与并不赞同或讨厌的发言人接触，如米歇尔·莱赫纳拉比，即使后者想划清界限，又如美国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动用过《出埃及记》的神话，仿佛只有犹太人经历过流亡。他甚至持续接触持异议的以色列记者，以及新派或修正主义历史学者，如汤姆·塞格夫（Tom Segev）、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和艾兰·佩普（Ilan Pappe），他们并不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萨拉·罗伊（Sara Roy）对加沙地区的研究，尤其令他觉得受益匪浅，罗伊来自（波兰）罗兹隔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她选择住在文化多元的美国，而不是以色列，对蓄意令加沙地区经济“去发展化”的做法进行了抨击。相应地，这里提到的许多人也承认他们能够做的研究获益于萨义德的开创之举。

埃尔默·伯格拉比便是其中一位默默无闻的盟友，美国犹太人反复国主义联合会的创办人兼主席，主张“人文普世主义”，认为犹太教是宣扬人类普遍珍视的价值的宗教，而不是以色列国所代表的那种例外。矛盾的是，“拉宾—阿拉法特握手”后，以色列认可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对话，反而让上述交流少了禁忌。同时，《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以色列一方勉强有了微小让步，萨义德个人前往巴勒斯坦变得容易。“自从1947年底离开巴勒斯坦，”他思索道，“这是我第一次能正常访问西岸、加沙、以色列。”

协议本身的签署过程如他们认可巴方政权的过程一样，没有遵守民主原则。哈楠·阿什拉维（Hanán Ashrawi），巴解组织一方的关键谈判人之一，在《此端之和平》（1995）中回忆，协议是在挪威奥斯陆完全保密的状态下达成的，没有经过任何公论讨论，甚至没有人告知巴解组织谈判代表团关于协议的细节。在她从突尼斯赶赴华盛顿参加第十轮谈判时，协议便直接交到了她手上，并且告诉她内容已无法改

变。她知道在 1993 年 9 月初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件，当时一位同事打电话给她，隐约地表示“秘密渠道传递了信息”。阿布·阿拉 (Abu Ala) 和哈桑·阿斯弗尔 (Hassan Asfour)，两名学院中人，对巴勒斯坦现实全无了解，在阿拉法特的副指挥官阿布·马赞的指示下签署了和平协议，尽管有挪威外长的见证。这两位在谈判中本处于边缘位置，没有读过任何巴解组织方面的报告，如细致的事实研究或应急策略备要。

阿什拉维对阿布·马赞直言：“这会事与愿违。”的确，任一个关键目标都没有达成。以色列承认的不是巴勒斯坦的自治权，不是承认巴勒斯坦可以建国，而是认可巴解组织有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允许其返回加沙和西岸城镇杰里科。正是在这一旗帜下，阿拉法特称巴勒斯坦运动得以保全。正如阿什拉维的观察，灾难性后果接踵而至。既然巴解组织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整个阿拉伯世界便会开始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

萨义德却独自扛起重任，指出这是一种背叛——并非一次完全圆满的协议

认为这一协议是一种投降，萨义德不是唯一一个。他却是唯一狠狠地讽刺它是故意断了退路的协议。他把阿拉法特比作以色列的布特莱齐，即南非班图斯坦的长官，并且把新组建的巴勒斯坦政权比作德占时期的法国维希政权。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萨义德汇编了三部文章结集，以似无穷尽的创造力讨论其他可能性，试图从自传、轶闻、抨击言论和哲学思考中提炼出新东西。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远非简单的专栏文章或偶尔为阿拉伯语报刊撰写的文章汇编。这是他所思所写中最凝练、细致的一部分。而且，三部文集总共超过一千页，却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余的大多刊登在阿拉伯语小型刊物上。

在《和平与不平》(1993) 中——“这是第一部我以阿拉伯读者为预想读者的书”——描述了白宫协议签署仪式之“粗鄙”，“羞辱人的场面”——亚西尔·阿拉法特等于是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被悬置而感谢每一个人，以及比尔·克林顿的表现，“愚蠢的庄严，如二十一世纪的罗马皇帝，引导两个臣属国王，走完恭敬的和解仪式”。面对萨义德的谴责，阿拉法特的回应是在西岸和加沙禁止贩售萨义德的著作。萨义德的宣言也令不少最亲密的盟友感到措手不及，比如萨米，他担心进行单枪匹马的谴责会让萨义德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萨义德气愤地反驳，友人的立场与越战期间保持沉默的人类似，不算什么策略，仅仅是机会主义。

《和平与不平》的核心口号——“一片土地，两个民族”，从这一刻起标志着战斗上的新方向。这背后有着多重结构上的关键变化。首先，一直以来，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处于杂居状态。许多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公民，他们认同以色列，希望在以色列国内争取平等权利。讽刺的是，以色列用来修建、扩展非法定居点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这让他们在流离失所中还能有一份经济收入。巴勒斯坦年轻人可以看到阿拉伯语电视台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会将自己的处境同外国的同龄人相比，渴望得到消费满足和一点点正常的生活，而不是永远处在围困中。在之前针锋相对的情况下，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活动者拒绝访问以色列。他们鄙视以任何方式将以色列合法化的观念。但是这会引发不利后果，巴勒斯坦人无法获得物质援助，专家也无法靠近，一国方案试图纾解这一问题。历时五年的逐步完善，萨义德的后奥斯陆立场有了最清晰的公共表述，那便是刊登于 1999 年 1 月 10 日《纽约时报杂志》，题为《一国方案》的文章。

严酷的地理现实让人觉得别无出路。《奥斯陆协议》赐了“七处不相连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地，约占土地的 3%，周围皆是以色列控制的土地”。萨义德意识到，主张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平等地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这听起来似乎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在领土已支离破碎、充斥军事恐吓和禁令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巴勒斯坦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国家更前路惨淡的愿景。萨义德一直为之奋斗的两国方案已毫无实现的可能。如果说之前或可寄希望于美国始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对未来领土权的承诺，巴勒斯坦的土地却已成为被犹太人定居点和持续的军队驻扎切割了的小块土地，实际上令两国方案愈发渺茫。萨义德推断，因为以色列策略的整体目的是让有朝一日建立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所以它在让人相信那些老骗局这一点上，是做得太成功了。他呼吁的并非建立一个国家，那已经存在，只是形式是执行隔离的国家，施行两套不同且不平等的法律、权利和特权。

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的乐观氛围中，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主、世俗国家的主张虽然鲜见支持者，却并不算是新发明。最早可追溯到 1948 年，也有充分的历史因素提供支持。作为身处中东地区的基督徒，萨义德与其他人一样，必须参考殖民地

历史，非常清楚基于身份分配权力的多种族政治安排所埋设的陷阱。在沙姆地区，法国人采取的制度是代表制与宗教身份绑定，将议会划分出相应的百分比。比如按照惯例，若非遵循宪法规定，黎巴嫩的总统要由马龙派担任，总理要由逊尼派担任，议会发言人由什叶派担任，外长留给东方正教会。为了驾驭各个教派，为每一支教派赋予各自的组织权力，这种安排等于是将身份差异固化成正式的政治结构。想要理解萨义德对一个犹太国家或穆斯林国家的憎恶，必须记得他对早前实施的失败制度十分了解。

萨义德是迄今为止最有国际声誉的巴勒斯坦发言人，但他同时是不受巴勒斯坦新政权欢迎的人，正如他不止一次向阿拉伯听众演讲时所指出的。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萨义德说自己每年写出二十四篇供媒体发表的文章，相当于一个月写两篇。他坦言这是一种挑战，面对要么迅速遗忘、要么拒绝倾听的公众，反复条分缕析是容易让人灰心的任务。关键刊物是《生活》，一份泛阿拉伯立场的报纸，创立于黎巴嫩，编辑部设在伦敦，发行量有二十万份，编辑人员来自多个国家；《金字塔报》是报道阿拉伯世界新闻事件的英语报纸，总部设在开罗。起初，萨义德用阿拉伯语写文章，据他的助手说，行文清晰流畅，而编辑希望交过来的是英语稿件，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雇员翻译成阿拉伯语。可是那些译文往往辞不达意，需要由萨义德的伊拉克籍助手赞妮布·伊斯特拉巴迪或玛利安姆修订后才能刊登。

萨义德是迄今为止最有国际声誉的巴勒斯坦发言人，但他同时是不受巴勒斯坦新政权欢迎的人

定期为在阿拉伯世界发行的报刊写文章改变了他的文风。1990 年，在致《杂志》编辑阿卜杜拉曼·拉希德 (Abdulrahman Al-Rasid) 的信里，他坦言：“我之前从未有过阿拉伯读者，现在每个月都要为他们写文章，这对厘清思路和精炼表达是很好的练习。”消极一面是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与阿拉伯刊物相比，我可以在英语、法语或美国刊物上更自由地表达。”几个为巴解组织出谋划策的人逐渐理解了他抨击《奥斯陆协议》的立场，包括阿什拉维，勉强答应参加在白宫前草坪上举行的签署仪式，事后回想，不得不承认果断的决裂会是更好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萨义德发现了更贴近读者的讲述声音。多年来，他可谓始终批评着美国流行文化，明言那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言过其实）。“娜吉”（他这样称呼女儿）进行了反驳，让他注意爱尔兰创作歌手西尼德·奥康纳，并且告诉他，奥康纳的音乐批评了主政英国的撒切尔，奥康纳支持爱尔兰共和军。娜杰拉执意要父亲听奥康纳的歌，最后他评价她的音乐令他觉得兴奋，她写的歌词让他想到叶芝。娜杰拉进一步告诉他另类摇滚歌手阿妮·迪弗兰科为《国家》杂志撰文。而儿子瓦迪则厌恶古典音乐，责怪父亲的品位不够蓝领，并且力求阐明重金属摇滚体现的政治反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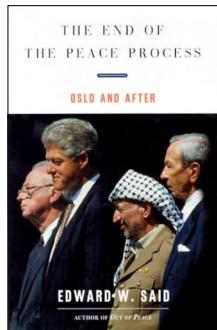
读者可以在萨义德的文章中读到琼·科琳斯、玛丽·泰勒·摩尔、黛安·基顿和约翰·勒卡雷等人的名字，其实他初次涉足流行文化多与殖民地、阿拉伯世界有关。比如，他撰写了关于阿拉伯传统音乐最杰出的女歌手乌姆·库勒苏穆、关于阿拉伯电影、著名埃及肚皮舞者、电影演员塔西娅·卡里约卡，马耳他裔漫画家乔·萨科画出了在被军事占领的土地上的日常生活，以及他还是孩子时在埃及看过的《人猿泰山》系列电影。这些文章以及有关巴勒斯坦的政论文章，让身在美国的他有机会重温故土，它们捕捉到另一种心绪。心绪的改变与他于 1992 年 6 月前往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地有关，就在确诊白血病后。四十五年来，这是他第一次与玛利安姆、瓦迪、娜杰拉一起返回故土，“带我的家人看看我出生的地方，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我上过的学校”。身患白血病的消息，与日益加剧的政治隔离迫使他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

199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午夜，萨义德致信朋友，说自己的战友艾克巴尔·艾哈迈德几小时前在伊斯兰堡去世，因结肠癌手术后引起的并发症。听闻噩耗，他立刻去了艾哈迈德在纽约上西区的公寓，慰问其遗孀朱莉，返回后匆匆写了这张便条。在那个熟悉的房间里，更容易回想起有多少次，好友赤足盘腿坐在地板上，手持一杯酒，估量一场政治危机或依次以四种语言背诵一首诗，不知不觉时至凌晨。萨义德深感悲伤，同时掺杂着懊悔。二人最近刚刚因为一个印度科学奖项起了争执，萨义德希望艾哈迈德能帮忙，确保坎提·拉伊获奖，这其实是异想天开，他却觉得好友可以发挥魔法般的作用，因此当艾哈迈德表示无能为力时，他很生气。在萨义德自己也如此虚弱之际，痛失好友更是致命一击。而且事后证实，艾哈迈德本不该死去。

收治他的巴基斯坦医院缺乏必要设备，无法应对化疗引发的常见的不良反应，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夺去了他的生命。

进入二十一世纪，萨义德便向自己的主治医生拉伊坦言，想写一本关于艾哈迈德的书，阐述他的行动主义。艾哈迈德本人谦逊，羞于书写自己。他没有留下重要的著作，只有零散发表的政论文章，后来以结集出版，乔姆斯基撰写了前言。“另类广播”主持人、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大卫·巴萨米安对其进行的一系列采访里，保留了一部分艾哈迈德富有同情心的抗争、敏锐的观察和极吸引人的、大多数靠口耳相传的经验之谈。萨义德发现艾哈迈德没兴趣做笔记，对赞誉也表示漠视，这与二人共同履行的政治承诺一样吸引人，并希望捕捉他未能记录下的知性思考、精神的闪电。毕竟，正是艾哈迈德在萨义德学术生涯之初告诫他如果想达到目标，需将重点放在道德鼓动上，而非军事行动。早在 1970 年，艾哈迈德向阿拉伯学生组织（Organization of Arab Students）演讲时，就阐述过这一彼时尚不流行的观点，即构建公共联系比游击战更重要，这对萨义德的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 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时，上述观点显得更加宝贵。萨义德认为，当时媒体舆情左右着那场冲突的走向；他愈发相信那是“形象与观念之战”，争夺焦点便是要让巴勒斯坦故事像以色列哈斯巴拉（字面意思是为外部世界准备的信息，而更口语的说法是“宣传”）一样严丝合缝、有说服力。为争取自由而采取的斗争法仰赖“灵活、流动的政治力量，他们更依赖主动性、创造力和出奇制胜，而不是把持固定位置”。



《和平进程的终结》

《和平进程的终结》收录写于 1995 年至 1999 年的文章，试图呈现如何将它实现。这本书代表着后奥斯陆时期萨义德最具创造力的政治思考。艾萨克·牛顿、西奥多·赫茨尔、纳尔逊·曼德拉和伊丽莎白·泰勒——均在书中进行讨论，对一国方案做了更强烈的召唤和更深的哲学思考。还讨论了不同的知识分子，有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马提尼克诗人兼议员埃梅·塞泽尔，同时尝试抛开国别政治的宏大叙述，像《最后的天空之后》，关注巴勒斯坦普通人的生活。这方面的成果，尤其体现在书中最打动人、实地走访后写成的文章《看望瓦迪》《巴勒斯坦见闻》和《西岸日记》中。

献给儿子的那一篇尤其让人难忘。在并非来自父亲的压力下，求学纽约、非常美国化的瓦迪自学了阿拉伯语，1994 年，大学毕业后，选择去开罗美国大学继续学习。之后，又立刻表示自己想在巴勒斯坦待一年。他的父亲起初不敢相信。意识到瓦迪是认真的，萨义德便想追问这一行为的潜在意义，因为他自己一直不愿意做同样的事，即便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压力迫使其做出这样一个姿态。比如他的老友、同人艾布·卢霍德辞去美国西北大学的教职，人生最后十年选择在拉马拉的比尔宰特教书。《奥斯陆协议》所意味的溃败，加上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均促使萨义德寻找与巴勒斯坦建立更私人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像以往那样前往中东的短期旅行，为了拍摄电影或做一次讲座，1997 年 2 月、3 月，还去了一次西岸，为 BBC 拍摄影片《寻找巴勒斯坦》。瓦迪的创举让萨义德思考再三。学生阿什拉维当时为在拉马拉的巴勒斯坦当局工作，深知萨义德渴望被生活在本地的巴勒斯坦人接纳。他依然被当成外人，这让他深受伤害。瓦迪不仅指出了路径，更打开了门，为父亲制定计划，开车载着父亲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做好后勤，向他介绍这块土地的日常运作，最关键的一点，是让萨义德结识了巴勒斯坦的年轻人，没有瓦迪，这绝无可能。考虑到本地的父权文化，萨义德与儿子瓦迪一同出现就表明了巴勒斯坦在他们心中占据重要

位置。

《奥斯陆协议》使巴勒斯坦人无法继续争取民族独立，或者可谓从反面实现了巴勒斯坦人的夙愿，这取决于从哪个视角观照。无论怎样，那已不再是萨义德追求的目标。他更无所顾忌，愈发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更致力于完善其巴勒斯坦主义这一理念，彰显包含属性，其中包括跨越既定的或本地的归属属性。然而此时他却无法像写作《东方学》时一样，有左翼倾向的社会共识可与之共鸣。

因此，秉持批判精神的最后一部作品收录 1995 年至 2003 年的政论文章、在他去世前不久汇编完成，《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2004），此书对“9·11”之后公民自由式微、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发动长期战争、美国本土令人心惊的威权主义趋势进行了猛烈抨击。行文中，萨义德无法容忍“知识分子群体不假思索的声援”，觉得“‘专家们’（最糟糕的当属猪猡【福阿德】阿贾米）”颜面尽失。他谴责 2001 年 10 月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代表了他称之为“美国政策的以色列化”。美国似乎变得越来越像由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主宰的国家，“在我看来，已成了世界的威胁”。

这并不是说萨义德的焦点已完全转向国内议题。他的著作在世界各国都有拥护者，在中东地区却要面对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在以色列和周边土地，他的影响力已十分深远。在以色列学术界，尤其是年轻一代，视《东方学》为必读书目。萨义德的著作也与以色列国内反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浪潮形成很好的呼应，以及针对以色列发布的各类白皮书的抗议，这些白皮书堂而皇之地宣称以色列是秉持包容原则的多元文化社会。

为了揭穿白皮书的谎言，米兹拉希犹太人发起了真正实现多元文化的运动，他们引用了萨义德的论述，反复书写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东方犹太人有着相似的感知力和命运，始终乐于见到在中东地区多民族共存。种种障碍并未完全阻止他的著作在中东流通。《巴勒斯坦问题》的希伯来语版早在 1981 年就面世了。此前一年，友人沙哈克从以色列写信来，提到“你在这里已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东方学》的阿拉伯语版比较拗口，《文化与帝国主义》篇幅较长，又旁征博引，这两本书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不如其政论文章大，《流离失所的政治》中收录的文章影响尤其深远。尽管到了八十年代，萨义德在中东地区已有颇高的知名度，却并非以文化或文学批评者的身份著称——《世界、文本、批评家》由叙利亚文化部组织翻译成阿拉伯语，没有获得正式授权，只能在叙利亚国内流通。纳贾·阿塔尔是出任文化部长的第一位女性，四次邀请萨义德来叙利亚，而萨义德每次都断然拒绝，他无法忽视叙利亚本国的镇压，而且，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叙利亚出卖了巴勒斯坦人。她无疑和其他人一样，意识到萨义德的伟大之处——或许这是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唯一成就——即让人领会到知识分子能够起关键作用，是社会良知、症状诊断者和议程制定者。

他的著作在世界各国都有拥护者，在中东地区却要面对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

巴勒斯坦知识界对萨义德留心提及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遭受的苦难愤愤不平，萨义德提出“美国应当是我们竭力争取的关键”，即着重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那是以色列的政治生活所根本倚仗的，而此观点也引发过于狭隘的争论。萨义德反复呼吁，在深耕巴勒斯坦事业上需要更多“创造力”，也引用过塞泽尔的那句诗“在胜利的会合点有所有人的位置”，尽管颇具哲理，在许多人看来却离战场过于遥远，无法与眼前的暴行——如加沙危机，人们的房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以色列的推土机铲成一地瓦砾——产生联系。即使是那些拥护《奥斯陆协议》的人，也并不认为那是迈向独立、具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一步。所以有人不禁觉得当萨义德写出“流亡对我来说像更加自由的状态”，或得出巴勒斯坦“经历了沧海桑田……我们离它越来越远，这不是用果树营造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不相信最后会有返家的一幕”这样的结论时，难道不该视为背叛？在许多活动家眼里，萨义德的言论不仅与现实脱节，更暴露了他的美国腔调。

尽管受急于事功者的非议，萨义德却绝非在曼哈顿高层公寓里坐而论道。哪怕是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萨义德仍听从阿什拉维的建议，出任巴勒斯坦人权委员会理事，也为新政府架构下的其他组织工作。筹款、拍电影和抗议并未停息，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从下面这个事例可见一斑：一心向学的易卜拉欣·阿马尔到达伦敦时二十一岁，随身只带了一条牛仔裤和两件 T 恤，以及一只小手提箱。他听了萨义德在议会大厦的讲座，排队等待上前和他说几句话。他顺便提到如果能获得一些经济资助，他就可能继续学业。萨义德回答他会留意自己能做什么。阿马尔舒心地离

开了，同时确信这位“巴勒斯坦人中间的传奇人物”（他这样形容）一走出演讲厅便会把承诺抛在身后。不出一个月，他收到了一封封信，信里有一张一千五百英镑的支票。

在写作和言说中显现的新趋势并非源于疲惫或挫败，而是因为种种困顿的现实。没有主权，迫使巴勒斯坦人把民族主义重又想象成宽泛意义上的苦难，而不再是基于血和土的归属形式。相反，以色列的民族理念则借鉴了十九世纪的欧洲，如先后在以色列和法国受训的学者尤利·埃森茨维格（Uri Eisenzweig），赞同萨义德就犹太复国主义领土提出的“想象的空间结构”。此种判定是“巴勒斯坦的风景：含糊的诗歌”的核心，他与艾布·拉霍德·哈立德·纳塞夫（Khaled Nashef）等人许久后在西岸的比尔才特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的主题，旨在揭示以色列考古学的种种虚构之处。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简言之，就是在巴勒斯坦创造了一片欧洲殖民地式的飞地，而巴勒斯坦人应格外注意不要重蹈覆辙。

2000年6月底、7月初，萨义德全家去黎巴嫩探亲，并做了两场公共演讲，返美后却遭遇媒体的声讨。一些官员和记者称他是恐怖分子。按计划好的日程，萨义德在演讲之余会前往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那里被以军占领了二十二年，终因黎巴嫩人的抵抗而撤出。

在参观过臭名昭著的基安监狱后，萨义德与几名记者交谈，身旁还有家人和这趟南部之旅的组织者、好友法瓦兹·特拉布勒西。他们往与以色列交界处的“法蒂玛之门”走去，在那里，在黎巴嫩这一边的栅栏前面有一堆石块，还站着三名真主党官员。按照惯例，官员邀请访客朝对面投掷有象征意味的石块，一段距离外就有一座哨塔，访客能看清那里未被占领。旁人用阿拉伯语鼓动萨义德扔石块，特拉布勒西也想扔。萨义德的石块没抛出多远就落到地上。一名来自《大使报》的摄影记者和来自灯塔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跟随他们来到法蒂玛之门处。当晚，摄影记者把照片拿到萨义德的旅馆住处，请他看一看。此时，好友——小说家埃利亚斯·扈利的妻妹看到了照片，问萨义德能否把这张照片传给法新社，那恰好是她工作的地方。萨义德不觉得为何要拒绝，便同意了。



黎巴嫩真主党也在本地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相关影像。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扔石块不过是扔扔而已，由此引发的声讨令他们深感古怪。始终提倡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实现和平的萨义德被塑造成只想动武的反犹狂人。纽约小报《每日新闻》在第二版刊登了萨义德投石块的照片，拟了具有挑衅意味的标题《哥大教授承认投石》。在激烈的媒体挞伐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帕弗拉·赞恩在采访萨义德时尤为无礼，以致萨义德决定从此不再和美国主流媒体浪费时间。一片哗然之际，亲以色列的教员、学生和捐款人一连数月策动哥大校方解雇萨义德，至少要迫使校方公开谴责萨义德。一些来自医学、商学、工程院系的教授尤其恼火，向教务长办公室轰炸了多达五十通电邮和电话，并说服了一位董事。

数位同事一起声援萨义德，舆论主流也支持萨义德。风波中，哥大教务长乔纳森·科尔时隔两个月，才应学生团体领袖的要求发表了官方声明。这封长达五页的信援引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哥伦比亚大学学院系手册》，指出萨义德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不会遭到指控，仅仅是因为萨义德的政治观点，让这张照片引发争议。通过援引学术自由，科尔的声明有效地平息了风波，而余波又持续了数周，始终没有彻底结束。对萨义德的批评并非全部来自亲以阵营。有些盟友认为萨义德在采访中故意把投石行为往小里说，强调他扔的只是“鹅卵石”，没有瞄准任何人，仅仅是“象征性的开心手势”。面对诉诸武力的以色列，他们问道，何不大胆投石，扬眉吐气一次？投石举动本身是一件小事，却让一些人开始质疑萨义德一生的志业，由此引发的风波令萨义德陷入深深的抑郁。



蒂莫西·布伦南

美国作家、文化理论家、比较文学教授，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人文学院。著有《以世界为家：如今的世界主义》《借来的光：维柯、黑格尔和殖民地》《萨尔曼·鲁西迪和第三世界：关于民族的神话》等。文章发表于《国家》杂志、《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伦敦书评》等许多刊物。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Clovis Wood](#) Photography on Unsplash



由此导致的雌性数据空白随后被伪装成了知识。人们假设雌性不会竞争，就是基于这种观点——事实上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

鸟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长期以来，鸣禽悦耳的叫声一直被认为是性选择的典型案例：为了成功胜过竞争对手，以赢得异性的喜爱，雄性的装饰性特征演化得越来越精致。鸟鸣声可能看起来代价并不算大，但记住所有这些歌曲需要更大的大脑，这对以飞行为生的小动物来说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和体力的事情。事实上，众所周知，在不需要唱歌的冬季，雄性鸣禽的大脑会萎缩。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雌鸟根据自己对美丽的标准，对最悦耳或最美丽的雄鸟进行了数千代的选择，最终可能会产生显著的效果。”

就像维多利亚时代晚宴上的女士一样，雌鸟没有理由竞争。达尔文理论堵住了她们的嘴，她们的主要作用只是聆听雄鸟那花哨的歌唱表演，并不情愿地用交配来奖励自己选中的情郎。任何被观察到唱歌的雌性鸣禽都会被当作爱唠叨的怪胎。她们的歌声落入了科学界置若罔闻耳朵里而被置之不理，理由我们太熟悉了：雌性鸣唱是“内分泌失调”的结果，或者像雌性羚羊的角一样，只是与雄性共享遗传基因的非适应性副产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化生态学教授娜奥米·兰莫尔告诉我：“公认的观点是，如果你听到一只雌鸟歌唱，那是一种无功能的畸形变异——说明这是一只体内睾酮过多的老年雌性。教科书中对‘鸟鸣’的定义是‘雄鸟在繁殖季节发出的复杂声音’，所以鸟鸣实际上被定义为雄性的声音。”

这种长久以来的分类方式严重惹怒了兰莫尔。在过去的 30 年里，她一直在研究雌性鸣禽的复杂发声，并努力让人们听到她们的声音。她是一个先驱科学家团队的一员，这些科学家厌倦了以雄性为中心的关于鸟鸣的教条式定义，开始自己搜寻所有可用的科学数据，证明有 71% 的雌性鸣禽绝非哑巴，而是会唱歌的。

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叫声值得倾听；这些鸟类“天后”发出的声音挑战了达尔文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

根据兰莫尔的说法，一个半世纪以来对雌鸟鸣叫声的忽视只不过是古旧的性别歧视下的又一个牺牲者。这种偏见主要源于鸣禽的地理分布。鸣禽所属的雀形目是鸟类中最大的一个目，有 6000 多个物种，占所有已知鸟类的 60%。这些鸟的定义特征是具有高度特化的、能够在树上栖息的脚趾，以及肌肉发达的喉部结构——鸣管，使其具有灵活发声的能力。除此之外，自由演化还创造出了秀丽的山雀、翱翔的雨燕和浮夸的极乐鸟，以及无数其他形式。这 140 个左右的科共同归属于脊椎动物中最多样化的目之一，这要归功于最近地理时空的爆炸性辐射演化，使雀形目鸟类能够扩散到全世界。唯一听不到鸟儿歌唱的大陆是南极洲。

尽管鸣禽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但过去只有欧洲和北美的鸣禽得到了较多的研究。这些物种基本上都是候鸟，来自最近分化的被称为雀科（Passeridae，归属于鸣禽亚目）的类群，其中雌性的声音确实没有那么华丽。而那些唱歌的雌鸟，如欧

## 非虚构 “她”的力量：鸟类“天后” 和狐獴女族长的故事

露西·库克 | 新书试读

让雌性动物告诉你《自私的基因》中  
不会讲到的事情。

《物种起源》问世 10 多年后，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第二部杰作《人类的由来》。这本著作概述了他关于性选择的新理论，解释了他观察到的两性之间的深刻差异。如果自然选择是为了生存而战，那么性选择本质上就是为了争夺配偶。然而，在达尔文看来，这种竞争主要是雄性的事情。受限于其所处时代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达尔文认为雌性的力量是通过“相对被动”和不具威胁性的方式实现的，她们“作为旁观者站在一边”，观看雄性虚张声势的表演。

真的是这样吗？

在《“她”的力量》中，露西·库克的目标是揭穿动物王国关于性和性别的过时叙事，她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偏见，将各种雌性动物的真实行为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交配后蜘蛛的同类相食到狐獴女王的血腥统治，我们将发现“她”并不像我们印象中那样温柔、被动、温顺和充满母性，也将重新认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她”的力量。

经鹦鹉螺·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摘选了《争强好斗的只有雄性吗？》一章分享给读者。

在过去的 10 年里，人们才知道，雌性羚羊和猿类也会为交配而激烈竞争，就像《乔弟海岸》中的星期六晚上一样。达尔文承认存在“少数异常案例”，即竞争激烈的雌性扮演了“完全属于雄性”的“颠倒”性别角色，但这些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例外而被搁置一旁。

达尔文狭隘但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导致接下来的 150 年里，对同性竞争的研究都集中在雄性之间对配偶的竞争上，而雌性好斗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学界忽视了。



欧洲知更鸟。  
图片来自 Jan Meeus on Unsplash

洲知更鸟（欧亚鸽），其两性的外形往往非常相似，因此雌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吵闹的雄性。

在兰莫尔的故乡澳大利亚和整个热带地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达尔文住在那里，他会在灌木丛和后院里听到数十种雌性鸟类的鸣叫声，从看起来像电锯的琴鸟到精巧的细尾鹩莺，她们发出的声音与雄性一样婉转。

“作为一个研究鸟鸣的澳大利亚人，你会非常清楚文献中存在的这种误解。我在文献中读到鸟鸣只来自雄性，然后出去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到处都是歌唱的雌鸟。所以我几乎不可能注意到这种异常现象。”兰莫尔说。

据了解，大约 4700 万年前，鸣禽最先在澳大利亚演化出来。鉴于雌性鸟鸣在其起源地盛行，兰莫尔和她的同事想知道她们是否一直鸣唱。因此，她们创建了鸟类系统树来复原其祖先状态，并推断出最早的雌性鸣禽确实是一群喧闹的天后。

“这真的让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兰莫尔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古老的澳大利亚鸣禽和歌唱的雌性都被认为是另类的。现在，事实证明北半球的鸣禽才是另类。”

兰莫尔的发现确实意义深远。事实证明，雌性鸣唱并不是最近才在热带地区发现的某种演化怪癖。雌性鸣禽一直在歌唱。发生变化的是，在一些北温带地区，最近演化出来的鸣禽家族的雌性出于某种原因停止了歌唱。这是一个与达尔文提出的框架完全不同的演化情景。

“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雄鸟会唱歌，而是为什么一些雌鸟后来会失去歌声。”兰莫尔对我说。

与雄性鸟鸣不同，对雌性鸟鸣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不过，似乎雌性鸣禽主要使用它们的发声能力来与其他雌性竞争。她们唱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繁殖地或配偶不受其他雌性侵害，或引诱雄性伴侣远离其他雌性。这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炎热国家更有意义，那里的繁殖季节很长，鸟类夫妻全年都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中。

“雌性保卫自己的领地是有真实作用的，因为雄性可能会死去，可能会与她分离，或者在隔壁与另一只雌性偷偷交配。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雌性都需要保卫自己的领地免受任何入侵者的侵犯，甚至可能需要通过鸣唱来吸引新的配偶。所以在这些热带地区，雌性鸣唱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兰莫尔说。

在欧洲或北美，情况则截然不同。那里的大多数鸣禽在冬天会向南迁徙。当这些鸟类在春天返回繁殖地时，雄性通常先到，然后拼命唱歌以建立领地并吸引配偶。雌性在选择雄性之前会“货比三家”，在某些情况下，性选择会让雄性的歌声更加婉转。然而，繁殖季节很短，所以雌性在再次南下之前，必须尽快开始交配和繁殖。因此，她不太可能与其他雌性争斗，对雌性鸣唱的选择压力就减小了。

显然，鸟鸣对雌性和雄性来说一样具有适应性。巧妙的实验甚至表明，就算是很少唱歌的雌性候鸟，如北美黄林莺，如果其他雌性（即便是模型）侵入她们的领地，也可以被诱导开始唱歌。



北美黄林莺。图片来自 Patrice Bouchard on Unsplash

这些雌性鸟类在巢穴附近和领土内进行声乐斗争，给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带来了问题。这种僵局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演化生物学家的症结所在。

“并不是说达尔文错了。在某种程度上，雄性候鸟的鸣唱仍然是通过性选择演化而来的。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不是鸟鸣的全部演化过程。”兰莫尔告诉我，“我们现在意识到，鸟鸣确实具有更广泛的功能，包括对各种资源的竞争，而不只是为

了争夺伴侣。因此，我们现在认为鸟鸣是通过社会选择演化的，而不是通过性选择演化而来的。

社会选择的概念是由理论生物学家玛丽·简·韦斯特－埃伯哈德在 1979 年提出的。韦斯特－埃伯哈德意识到，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过于狭隘，无法解释由竞争繁殖地以外的领域和资源而非竞争交配权力所导致的精巧特征的演化（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

韦斯特－埃伯哈德并没有试图诋毁达尔文，而是提议扩充他的理论，让性选择成为更广泛的社会选择概念的一个子集。就像达尔文本人所做的那样，她用大量的生物来阐明她的理论，这些生物的华丽特征或两性异形无法仅用性选择来解释，而是可能根据季节和情况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她概述了蜣螂的角、野鸡的尾巴、巨嘴鸟的喙、鸟类的歌声，以及蜜蜂和黄蜂的支配行为，这些都可以用更广泛的社会选择（如果不是性选择）来解释。

尽管如此，这个观点仍然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动物学家认为没有必要在演化论中再引入另一种选择形式，更不用说这是达尔文以外的人（还是一位美国女性）提出的建议。但是，随着对雄性引人注目的表演技巧之外的社会竞争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达尔文对性选择的定义不够广泛，无法解释鸟类鸣叫或雌性鸟类鲜艳的羽毛和装饰物等复杂特征。更糟糕的是，达尔文狭隘的视角“模糊了我们的观点”，并助长了一种科学偏见，即认为如此复杂的特征和两性异形都只是为了成功交配，而实际上它们通常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竞争有关。

这些争论很可能继续下去。无论我们管演化出这些惊人特征的力量叫什么，越来越明显的事是，雌性与雄性一样喜好竞争，只是侧重点不同。雄性主要是为了获得雌性而发生冲突，而雌性更有可能争夺与生育力和养育后代有关的资源。尽管她们的努力可能更加隐秘，但雌性竞争在塑造演化道路方面与雄性的打斗一样具有影响力——甚至可能影响力更大。

### 致敬繁殖后代的首领！

在动物中，母系制度并不是女性主义者的伊甸园。通常，险恶的生殖暴政的暗流，操纵着团队合作和剥削之间的界限。这一点在可爱的电视明星狐獴（Suricata suricatta）的集体生活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狐獴暴力的等级社会制度与其甜美可爱的银幕形象并不一致。

我承认，不被狐獴迷住很难。我通常对传统意义上的可爱免疫，更喜欢那些奇奇怪怪的生物。但几年前，在参观南非的卡拉哈里狐獴项目时，我却完全被这些群居的小东西征服了。狐獴是狂热的喜剧演员，还喜欢用后腿站立，以致人们很难不把它们比作人类。他们天性喜欢挖洞，一旦在一个地方停下就会非常激动地挖掘，只不过通常收效甚微或一无所获。狐獴不时跟蝎子打架，或者在阳光下打瞌睡时翻倒，仿佛滑稽的小丑表演。然而，在闹剧的背后，狐獴社会更多地类似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而不是卓别林的影片。

狐獴通常以 3~50 只为一群生活，其中一只占优势地位的雌性垄断了 80% 的繁殖机会。其余的狐獴“平民”——她的亲戚、后代和一些雄性“游民”——帮助进行领地防御、哨兵守卫、洞穴维护、保姆工作，甚至哺育统治者的幼崽。这种只有少数个体进行繁殖而其他个体帮忙的分工，在科学上被称为“合作繁殖”。这个词总是让我觉得委婉过头了。狐獴的表面友情并不是通过愉快的合作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公然的暴政来实现的。

狐獴社会的基础是亲缘关系密切的雌性之间无情的生殖竞争，这些雌性在怀孕时随时可能杀死并吃掉彼此的幼崽。这种吃掉幼崽的热潮受到万能的雌性首领的控制，她对进行繁殖的下属采取零容忍政策。她的目标是，在统治期间，阻止她的任何雌性亲属生育，并让她们代为照顾她的孩子。这消除了她的幼崽可能遇到的任何不必要竞争，并保护它们不被吃掉。这也让她得以将所有精力投入繁殖更多的幼崽。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战的重要位置。作为群体中体形最大、最暴力的狐獴，她将通过强夺、身体虐待、诱捕和谋杀来达到这一目的。

领导位置的空缺并不经常出现。一般来说，这个职位只有在女族长死后，比如死在了鹰爪下或敌对的狐獴群手中后才会空出来。然后，最高职位落到了群体中年龄最大、体重最重的雌性身上，很可能是女族长的女儿之一。

从这只狐獴继承至高无上的地位的那一刻起，她的体形就会增大，体内的睾酮水

平会上升，她对所有其他雌性的敌意也会激增。她会对那些在年龄和体形上与她最接近的个体（最有可能是她的姐妹）表现出特别的敌意，而她们也是她最大的生殖竞争对手。

“如果你是一只雌性狐獴，你最好的选择——你生活中的希望——就是有人吃掉你的母亲。剑桥大学行为生态学家、卡拉哈里狐獴项目创始人蒂姆·克拉顿-布罗克教授，用他字正腔圆的英国口音在电话中向我解释道，“可是，如果你的母亲被吃掉的时机不合适，那就不好了。最有利的情况是，当你是团队中最年长的下属时，你的母亲命丧黄泉。然而，如果你的一个该死的姐姐得到了这份工作，她就会把你赶出家门。”

25年来，克拉顿-布罗克一直在记录野生狐獴的家庭生活。他解释说，被赶出家门的不仅仅是女族长的姐妹们。在统治期间，任何已经达到性成熟并可能进行繁殖的雌性，甚至还没能尝试交配就会被赶出群体。

更致命的是进入邻近狐獴群的领地。每个狐獴群都有大约2-5平方千米的活动范围，受到严密的巡逻和保卫。由于合适的洞穴和食物是稀缺资源，邻近的群体之间竞争激烈，经常发生激烈的战斗。根据克拉顿-布罗克的说法，他的研究区域里有好几个交战的帮派比邻而居。因此，一只流亡的狐獴会不可避免地进入竞争对手的领地。她一旦被领地的主人发现，就会被驱赶出去。如果不幸被他们抓住，她就死定了。

就算流浪的雌性狐獴没有被敌对的狐獴群杀死，还有数十只眼尖的捕食者等着把她当作盘中餐。狐獴觅食的软沙只能在干涸的河床、草地和沙丘上找到，这些地方几乎没有植被覆盖。这让饥饿的狐獴暴露无疑：在开阔的地方埋头挖沙子时，捕食者将一览无余。由于没有哨兵监视捕食者并发出警报，一只孤独的狐獴很容易被无数空中捕食者、野猫或豺狼抓到。

正是卡拉哈里沙漠的残暴赋予负责繁殖的独裁者必要的影响力，来执行她极端的管理政策。独自生存是一项极限运动，对许多动物来说，要么合作，要么死去。再加上卡拉哈里沙漠是一个古老的沙漠，大约有6000万年的历史，它拥有演化出一些严重扭曲的“合作”关系的完美条件。除了狐獴，这里还有蚂蚁、白蚁，以及斑鸫等集群鸟类，还有达马拉兰鼠的庞大穴居社群。为了生存，这些动物都走上了繁殖极权主义和与此有关的“合作”道路。

旅行作家A.A.吉尔曾经指出：“这里没有浪漫。卡拉哈里沙漠是一种不道德、不受监管的市场力量，是一种由专业人士践行的纯粹的恶性资本主义。”

如果“少女”狐獴发育得太快，而她又冒失地被流浪的雄性狐獴推倒，惩罚将是迅速而致命的。怀孕的从属狐獴将被首领毫不客气地驱逐，随之而来的压力通常会导致她流产。如果她设法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足月妊娠并在巢穴中分娩，女族长将杀死并吃掉任何不受欢迎的幼崽（通常是她自己的孙子孙女）并将该雌性从群体中驱逐出去。

如果这还不够恐怖，那么除了被驱逐，这些最近失去亲人的雌性狐獴还有另外一个“合作”可能。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她们可能会被允许偷偷溜回群体：为她们凶残的母亲哺喂幼崽。

哺乳会严重消耗从属个体的能量储备，但如果这样做，她们就会被流放或孤独地死去，这些被奴役的雌性别无选择。这种威胁解释了天性自私的个体的奇怪的利他主义行为。照顾首领的幼崽是一种惩罚形式，或者是为她们的错误行为支付的“罚款”。考虑到该群体中雌性之间的亲属关系，她们共享部分基因，帮助抚养母亲的后代至少意味着自己的部分基因也能流传下去。这种遗传联系加强了从属个体做出牺牲的动机，并为合作提供了一些遗传优势。如果一名从属雌性设法取悦了首领并在群体中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总有一天她也有机会继承首领的头衔并繁殖自己的后代。

“作为一名未成年的雌性，你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母亲将你踢出群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必须按照她的规矩来。她比你大，有能力把你赶出去。所以你只能祈祷她被吃掉。”克拉顿-布罗克告诉我。

你并不会看到从属雌性联合起来推翻雌性首领。“结成联盟并‘篡位’，那是灵长类动物会做的事，”克拉顿-布罗克解释道，“狐獴不会结盟。她们非常愚蠢，肯定不是你确定保险方案时咨询的合适人选。”

只有当领导地位不稳定时，才会发生叛乱。假设一个虚弱的雌性因为年龄最大而继承了首领地位，但她可能不是体重最重的。此外，尽管首领强大，她也可能会生病或受伤。然后社群系统就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混乱，几个差不多的候选继承人会为争夺首领位置而大打出手。除了对彼此的攻击升级，她们通常都会怀孕。结果就变成了一场吃掉幼崽的比赛。出生的第一窝会被怀孕的雌性吃掉，然后是下一窝。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最后一窝幼崽出生，无论它们的母亲是谁，它们都将是最仅有的幸存下来的后代。在一项研究中，248窝记录在案的幼崽中有106窝未能走出巢穴，这表明这些幼崽都被杀死了。

狐獴的文化是紧张而嗜血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000多种不同哺乳动物的致命暴力行为，结果揭露了狐獴是地球上最凶残的哺乳动物——甚至击败人类，坐上了残酷的头把交椅。每只刚出生的狐獴都有1/5的概率被另一只狐獴杀死，凶手很可能是雌性，甚至很可能是它们的母亲。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狐獴并不适合被选为有益健康的家庭娱乐形象，或者给值得信赖的汽车保险供应商代言。这种动物可能看起来可爱又滑稽，还被贴上了合作的标签，



狐獴。图片来自 Andy Holmes on Unsplash

“你经常会看到狐獴女族长驱逐她们的大女儿。她们真的很残忍：女儿如果不走，就会被杀掉。如果你观察一个狐獴群，就会发现其中基本没有4岁以上的从属雌性，因为雌性首领会在她们2-4岁之间把她们驱逐出去。所以她们都离开了。”

这种驱逐遵循着一个陈旧的虐待升级计划。初级欺凌行为始于直接从下属嘴里掏出食物。在电视剧中，这可能像一个好玩的小插曲，但事实则非常黑暗。卡拉哈里沙漠中的食物非常稀少。狐獴可以吃的大多数生物为了保护自己，都演化出了有毒的装置：比如注入致命神经毒素的蝎子和从肛门高速喷出沸腾酸液的甲虫。这些都需要在吃之前先除去毒液。但是，首先必须得找到食物。沙漠中被太阳烤过的地面可能会像混凝土一样坚硬。我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蝎子洞，然后花了10分钟时间，艰难地试图用镐挖出一只蝎子。而狐獴只能挖得动软沙，并且可能要翻动堆积如山的沙土才能找到可口的东西。因此，抢劫来之不易的食物不仅是无礼的行为，更是对昂贵资源的霸占。

接下来是身体虐待：雌性首领会通过猛击其他个体的臀部以及随意撕咬尾巴、脖子和生殖器，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肉体欺凌可以加强首领的权威，并且还有额外的收益：由此产生的压力也可能会降低受害者的生育力。然而，她的主要目的是让受害者的生活变得非常痛苦，以至于她们会主动离开这个群体。

“驱逐始于霸凌。尾巴根部的咬伤很常见。当你看到一只狐獴的尾巴根部有一块裸露的皮肤时，那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离开种群的。”克拉顿-布罗克解释道。

与持续不断地被抢夺食物和啃咬生殖器相比，被流放听起来像在公园里散步一样轻松。但在这里，唯一比雌性狐獴首领更难以忍受的是卡拉哈里沙漠本身。没有多少环境会比这片广阔的半干旱大草原更严酷。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降雨都是一种模糊的记忆；每天的温差可达45摄氏度。在盛夏，白天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而在冬天，夜晚可能会结冰。如果不能在公共巢穴中拥抱着亲友温暖的身体，流浪在外的狐獴很容易在夜里一觉不醒。

但其实每只个体都只为自己而活。没有神会创造出如此有缺陷又血腥的系统。但演化确实让它产生了，而且不知何故，这种系统不仅有效，还非常成功。雌性狐獴首领一年可以繁殖三四窝幼崽，而体形相近的其他哺乳动物通常只能一年繁殖一窝。一位名叫马比里的传奇雌性狐獴首领在长达 10 年的统治期间，成功生育了 81 只幼崽。

鉴于每 6~7 只狐獴中只有 1 只能够有效繁殖，雌性狐獴繁殖成功率的差异甚至比互相对抗、竞争首领地位的雄性更大。克拉顿—布罗克告诉我，尽管马鹿付出了所有的努力来长出巨大的角、与竞争对手搏斗并积极充实了庞大的“后宫”，他所记录的最成功的雄性马鹿终生也只生育了大约 25 只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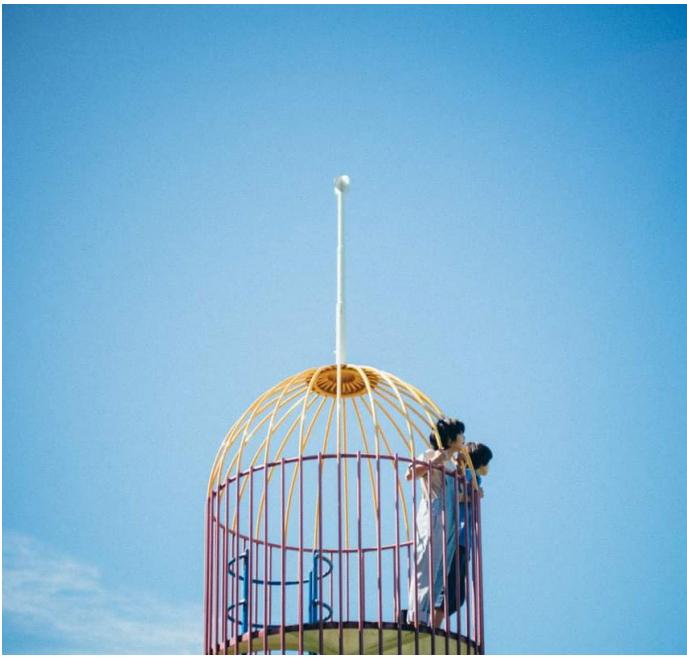


露西·库克

《国家地理》探险家，获奖电视制片人和主持人。她在牛津大学师从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后，成为英国与美国自然历史广播和电视节目中的熟面孔。她也是受欢迎的 TED 演讲者、畅销书作家，前作《树懒是节能，不是懒！》入围 2018 年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短名单和美国科学促进会青年科学奖短名单。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怪物》(2023)剧照

## 专栏

# 071 徐雅珺 既然我们都是 有不同症状的人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精神分析家在国内看到的和实践的事情。

徐雅珺 2016 年底回国之后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是和丈夫一起定居昆明，这是出于躲避雾霾和控制生活成本的考虑；第二个是在落脚之后做一个读书会。这个行动重要又明智，初来乍到昆明的徐雅珺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从而建立起来自己的工作网络和朋友关系。

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她是一个希望在“社会”里开展工作的人——把“希望”改成“必须”会更准确一些，毕竟她从事的拉康派精神分析本来就主张在社会背景下开展主体分析。不过在徐雅珺工作的精神分析领域，不同人对专业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感知、反馈都很不一样，否则满宇在推荐她加入接力访问的时候，不至于特别提出她曾为城中村的流动儿童提供精神分析角度的帮助。

“当我们的社会高速发展，我们会说要为此付出代价，但如果我们连这个代价是什么都不清楚的话，这个牺牲对很多人而言无法选择，也无法被看到。”徐雅珺在 2018 年受访时说。当时第三届中法精神分析研讨会刚刚结束，她的发言主题与流动儿童有关。

徐雅珺是一个精神分析家，四川大学毕业之后，在巴黎第八大学完成精神分析硕士，接受精神分析导向的个人分析七年，督导两年，如今在昆明有自己的工作室。徐雅珺和满宇、刘洋一起发起了“一个人的社会”项目，你可以在满宇那期接力访问里看到更多细节。而她和昆明本地某个 NGO 一起服务于流动儿童议题，这个契机则来自读书会。这个过程为期两年，直到 NGO 机构发生变动。

跟小朋友工作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我需要进入他们的世界，比如我需要去了解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一起做游戏、画画、玩泥塑……这些工具是一个辅助。通常语言

表达能力比较好的孩子，我也通过他的话语来进入他的世界。他们也会跟我讲梦、跟他小朋友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父母之间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是怎么想的，等等。

这些是日常的事情，但是日常的事情能够呈现出所谓的主体性。打一个比方：有些人碰到比较强势的人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慕强，这就会导致他们可能在亲密关系里陷入到一种被对方控制的、很痛苦的境地，这种状况不止会在亲密关系里边重复，也可能会在比如跟朋友、同事的关系里边（重复），这跟主体性有直接关系。

小朋友在讲这些日常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是 ta 反复碰到的这些困境和 ta 自己无意识的选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会在会谈时去讲这个部分。

后来，徐雅珺也为“一个人的社会”参与者、艺术家唐浩多提供问题儿童的咨询。唐浩多在海口的“伴伴杂货铺”是一个特殊的儿童活动空间，当地社区里一些精神和物理意义上都没有着落的孩子在那里找到支持和信任。而唐浩多本身，则在“一个人的社会”里得以直面自己和父亲的扭曲关系，他在此后涉足儿童心理问题的实践，在徐雅珺看来是一种出于个人直觉的行动，和她在法国实习的时候看到的社区支持异曲同工。

法国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医学中心”，里面有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社工，每个社区都有，有些是专门针对儿童和家庭的。学校也有心理咨询师，如果一个孩子的情况严重到参与学校的正常课程有困难的话，有另外一个机构叫做“白日医院”，里边有老师专门制定针对孩子进度的课程，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活动或者是治疗——整个知识体系是全方位多样性的。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在我实习的时候，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孩子碰到了困难，有一个团队为了解决问题去想办法，制定针对这个孩子的方案。

我在法国另外一个机构实习过，他们专门针对社区里边的成年精神病患者——通常是比较严重、融入社会生活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指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这个也不现实，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就会遭遇那种恶意的目光、语言上的贬损。如果他们一个人去面对大环境的话，真的是挺困难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机构提供了一套非常完善的机制。有很严重的病人需要长期住院的话，有一个住院机构（负责），然后另外有一个过渡机构，就是他们出院了之后，自己生活还有点困难，就可以在里边过渡，这里活动就相对丰富一点，也很日常，比如会有比较多的医生护士发起工作坊，或者由病人自己发起的工作坊。一楼是咖啡厅，卖小零食或者咖啡。病人买东西还可以赊账，不能超过 10 欧。不同的时段，有一个护士和一个病人搭配来经营吧台。二楼也会有一些活动的地方，还有一个小乐队。临时人员，比如我们这种实习生去了，可以去做一个汉语工作坊，大家想学中文就可以参加……也包括比如读新闻的工作坊，每天由一个病人组织，护士给一些支持……

我跟机构主任聊天，知道法国的整个精神病学曾经有过一个反精神病学思潮，整个欧洲都会有。比如最早的时候，特别是随着福柯的批判，大家会开始觉得以前的精神病院并不能真正帮助患者获得康复，反而会让他们——因为确实没有考虑过医患关系本身对于病人来讲意味着什么——本身的症状变得更严重。思潮比较极端的时候，有人认为应该把精神病院都关掉，让病人都回到社区里。结果其实完全不行，因为这些病人是不可能融入其他人的生活的，然后也有一些悲剧发生。

主任说他年轻的时候也被思潮影响，然后有一个病人发作严重，幻觉妄想的时候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他反思之后又重新搭建起了这个体系：医院这块是必不可少，也要加上逐步过渡的过程……这个体系翻译过来叫做“体制心理治疗”，但“体制”这个词我感觉在中国的语境里边不是很能对应上，法语其实是“组织化建构”的意思，中国不一样。

这个里边有共产主义的思潮，主任也会介绍共产主义跟精神分析的结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实践，回国之后也对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国内的精神治疗刚刚起步，只靠我们做心理工作是根本不够的，需要社工、需要比较良好的自治系统，孩子碰到的问题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支持或者是解决。

徐雅珺在提到她在“一个人的社会”里起到的作用时，会说自己提供了“一种知识性的支持”。不知道为什么，在做接力访问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受：我主要在和一个专业人士就她的专业进行对话。关于自己，徐雅珺说得很少。她是 1987 年出生的兰州人，父母都是铁路系统的工人。童年的時候，她承担了很多来自妈妈的情绪，此后一直在为这些情绪对自己的影响寻求某种回应，她从心理学转向拉康派的精神分析，是因为她

觉得心理学追求的普遍性不足以回应个体的问题，而精神分析可以。

当我问她为什么愿意回国的时候，我听到了两个比较熟悉的答案。一个是“国外的文化和语言很难让我在精神分析领域做比较深入的对话，并且他们的体系已经很完善了，我能施展的空间有限”，另一个则是“国内的大环境再怎么样，不影响具体的事情，还是可以找到不同的做事的方法”。

与此同时，徐雅珺也看到了国内精神病治疗还是以药物为主导的现状。“很多医生他们会说，这个病人为什么不跟我讲，比如说病人的幻觉和妄想，医生认为，给病人做个量表，就能够通过量表来反映病人的情况，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有被害妄想或者其他特别的情况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如实回答量表问题的……”

“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医生每天要看的病人的数量巨大，可能分到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连10分钟都不到，问不到什么，然后简单粗暴的开药，药物病人吃了也没什么效果，之后也不愿意来了，但是这个医生可能误解药物起效了，其实不是这样。”

这和她在工作室里看到的问题是一致的：对于那些前来求助的“问题”孩子，学校的第一反应是“别让学校承担责任”，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劝说家长办理休学。与此同时，家长有时候也不理解孩子的情况，认为精神问题只需要进行某种矫治就可以解决，如果各种方式沟通依然无法让家长理解——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徐雅珺的工作就无法进行。问题落在流动儿童身上，则会变得更糟。

疫情三年，她能看到整个社会情绪出口的改变：出口越来越集中，形态越来越单一。

“社会更开放，更具有包容度，其实是更好的，它能够让这些——情绪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创伤也好——呈现出更多不同的样态。恰恰在大的公共话语变得越来越单一的时候，比如说封控这种大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情绪出口都集中在这一件事上去了。可能在疫情前，我们各自都有各自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小众，但因为这三年公共话语的缩减，很多交流都停止了，很多活动都进行不下去了，大家生活里的主线变成健康码、测核酸这样的事儿，大家就容易针对它去表达情绪。”

但与此同时，徐雅珺也强调个体的创造性——在创伤的基础上。

好像流行话语会特别喜欢去渲染“创伤”这个词。与其说创伤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不如说它是我们在面对一个事件的时候所采取的立场和位置。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没得选择，但是也是因为我的工作，我能够看到人创造性的那一面，即便在很艰难的处境下，我碰到的这些孩子，一旦给予ta支持，ta是能够呈现出来各种可能性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刻介入到孩子的困难当中去，但是我知道，对ta来讲这也不意味着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可能时机还没有成熟，再过一段时间，ta大一点的时候，有自己决定权的时候，能够远离家人的症状，解决自己的问题。

**Q: 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 还蛮多的——我觉得“有趣”可能跟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关系——对我来说，上个月我父母回老家了，我整整有三周的时间都在带小朋友。陪小朋友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她讲话开始进入从词变短句子的阶段，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惊喜，陪她画画、抓小鱼……这些我觉得都很有趣。最近在听的一些比较好的播客，我觉得也蛮有趣。

**Q: 让我想起达尔文用一种研究的态度看他刚出生的女儿。**

A: “分析家”跟“父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我们是能够分清楚的。我们也是有不同症状的人，然后不可避免的，孩子会去承担我们的症状。每个人都是这样。

**Q: 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长远的问题倒是有，近期倒是没什么。长远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跟更多的精神科医生建立起联系，让他们能够了解一些精神分析的视角，能够形成一个合作网络，让他们给到病人的药能够有更准确的支持。这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努力去做的一件事。

**Q: 你希望找谁来接力？**

A: 艺术家武老白，他做了很多社会实践的艺术项目。



杨 樊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Natalie Parham](#) on Unsplash

## 专栏

# 072 郭晓东 他不曾看到自己所期待的电影生态，于是自己做了一个

杨樱 | 接力访问

在许多“战友都倒下”的时候，  
他为什么还在？

郭晓东 1998 年上大学时在宿舍里卖打口 CD 的事，在我们的对话里一共出现了两次。

我们约在北京宋庄一个叫农贸市场的地方见面。这实际上是一幢红砖小楼。我去的时候一个女生站在门口，问我是不是来看片子的。我后退几步，抬头看看，想确认自己没来错地方。过了一会儿，郭晓东到了。

郭晓东对访问有自己的安排。我们先参观了“农贸市场”，这个功能改了名字没改的大楼如今更像一个老办公楼，上下两层，隔成若干间，整个被郭晓东租下来变成独立电影工作室，调色、剪辑，还有一部分内部放映都在这里。剪辑室暗不透风，一个男生站起来打招呼，门边里简单卷着铺盖，看起来工作的人也住在这里。

聊天被安排在米娜餐厅，郭晓东的解释是，这是见证了诸多独立电影诞生的地方。地方不远，但我们开车去，随车的有餐厅的主人米娜、也是郭晓东的合作伙伴，还有跟着郭晓东学习剪辑的青年导演光东。没什么来由，他开着车，提起 1998 年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在宿舍里卖打口 CD。

那时候在北大推广一些很小众的音乐，实验电子、即兴爵士、新古典什么的……形式就是打口 CD。做这事不能计算时间成本，计算时间成本就赔得一塌糊涂。你得去各地淘。五道口、海淀图书城，全国各地的碟过来，到北京之后 15 一张。那时候都先到广东沿海，最早就是垃圾，按吨卖，然后有人就去批发、分类，看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什么音乐，就这么一首一首地过，到了北京上海这些洋垃圾就会涨到五块钱一张，然后再精细分类，10 块

钱卖给我们这样。事儿特别有意思，它就是一个垃圾销售网络，一层层抵达我们这些年青人，这些对消费欧美音乐文化最感兴趣的那帮人，这是了解西方音乐最直接的途径。那时候网络还不普及。

在郭晓东说到 Napster 的时候，车停下了。我们进入餐厅，在靠窗的大桌子旁坐下，摄像机架了起来——看起来聊天同时也是一部关于郭晓东片子的素材——我背对摄像机，从一个很笼统的感受问起：他这么多年做独立电影的种种，从一个行动者而非仅仅是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似乎哪里不太常规？郭晓东带着有备而来的表情，开口重新说起打口 CD，仿佛刚刚在车上我们已经聊到这里，只不过被下车打断了一样。谁也没解释摄像机的事。

我当时在那个学校卖了三年打口 CD。1999 年卖到 2002 年。在宿舍里的时候店就开，不在就不开，也算一个小生意，也像刚才说的推广文化，也有交朋友的意思。一开始这个事的气质就有点像你说的，别人不太清楚这是在干什么，因为肯定不赚钱，交流分享的人也不多……（你想认识谁？）我用它来认识世界，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接触世界的最快的途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要出国什么的……通过音乐，通过歌词，通过音乐的做法，我看到的不同的世界的样子，是一种懵懂，但也是一种回应，一种想要去改造或者是融入更大的世界的愿望，包括可能带着别人一起。有这种心态在，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事儿……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后来电影对我来说很重要，一直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不管从业人数有多少，一路一直在一起做的人有多少，我都比较想去用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去做出我的回应。

郭晓东出生于 1980 年的北京。父母是高级工程师，也希望他成为工程师，所以他 1998 年读了北京大学电子学系。独立意志就发生在卖打口 CD 那会儿，他知道有更大的世界存在，但不知道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关系。和很多人一样，他毕业时报了托福考试（报名费是去银行柜台转账交的），但是没去考试，而是随着一个中法工程师交换项目去了法国。

郭晓东的豆瓣电影页面显示，他是导演、制片人、剪辑师和策展人。推荐他来接力的小泉说，郭晓东发起的诸多项目，比如“新亚洲影志”、“新亚洲电影奖”和“庐舍社团”，都有“一种自我组织感在其中，自由自在也联结互助，让人羡慕”。前两者旨在促成亚洲不同国家的电影人互相交流，“庐舍”比较特别，是疫情期间诞生的女性电影人剪辑驻留活动，为的就是在不确定性生活里寻找持续工作的可能。

搜索“郭晓东”，把同名的明星信息排除，就只剩下他做工作坊的对外招募帖子。郭晓东并不以明星创作者的身份知名，他只是不断把可能一起工作的人归拢到一起，共同分享理念、技巧，甚至美学。有那么几年，他每周都会在北京工体的灯笼酒吧放独立电影，同时邀请导演到场交流。酒吧在一个地下室里，他开玩笑说，在地下看地下电影，有点那意思。“那会儿大家敢讲话，我还记得大家现场那种投入的状态。”最早一部片子是关于客家文化的，联动了国内另一个策展人的客家主题研究。

从工程师到电影人是个微妙的转折。郭晓东学了法语，去了法国，确实也准备去做工程师（申请信上写着，“为中国入世做一点自己的努力”）但“去了以后发生了其他新的变化”，他找到了之前一直寻觅的发现世界和回应世界的方式——通过看电影。

电影最初只是他和法国社会之间的润滑剂。他本来就爱看电影，初来乍到，这个社会没让他感受到多少热情友好，上学也“没啥感觉”，电影就成了他赖以熟悉生活的媒介。但是出于某种他也没有说清的原因，他觉得“做电影这事我也能行”，于是看电影成了另一种学习。

为此他买了一台机器，把法国付费艺术电影频道的内容刻录成 DVD。这台机器二十余年还保存在家中，包括几百份刻录的盘。他在报纸上裁下每部电影的介绍，作为封面插在包装盒里。这台机器花了他半个月的奖学金，大约六七百欧，“当时国内高级职称的工资也没多少，其实我没有什么理由去瞎换（专业），但我最后放弃了奖学金。”他基本没有为自己换专业的动机给出什么解释，但详细说明了在法国这件事的可行性——当一个人出现学习某种东西愿望的时候，找到学习的路径就不太难——有赖于这种可行性，他成了一个电影学专业的学生。



《车失》海报

后面的事情，大致来说，就是郭晓东从一个技术导向的法国电影学校转去艺术方向的瑞士电影学校，在那里毕业，并在 2008 年回到北京，以毕业作品的名义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车失》，讲北京奥运期间一个保险销售员，挨家挨户去敲门去卖保险，然后反复碰壁的故事。片子是纪录片。在跟着保险员东奔西走的过程里，郭晓东看到了很多人，经过很多奥运建设场地，也拍下了倒计时。“我觉得那个片子讲了中国奥运会前后一些人的状态”，他由此作结。包括这部片子在内，郭晓东做的作品都不在他父母的理解范畴之内，这种被称为作者电影的产品，仅仅出于个人意愿，而不是更宏大的目的——赚钱、得奖、人尽皆知——是他们不熟悉的，也是大多数人不熟悉的。

我问郭晓东，你希望用电影干什么。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特别想用它去回应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去回应社会——我觉得电影还是在回应，它并不能真的改变什么。更早的时候我做电影是想要改变什么，后来就觉得挺失败的，不管是一种价值观，还是说人的状态，都觉得很失败。一个电影好像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但是回应是一个态度。我们还愿意去回应。

(片子的意义是) 20 年以后还有人在看，了解当时那个时代，知道还有人在那个时候做这样的表达，我觉得也是一种安慰。慢慢等人去发掘。可能是给未来一个希望。

郭晓东的作品列表包括：以制片人的身份参与《梧桐树》《树房子》《暮色撩人》《列车消失的那天》等亚洲与国际合制电影项目；以独立剪辑师的身份参与《轻松 + 愉快》



《列车消失的那天》海报

《清水里的刀子》《之子于归》《时来运未转》等多部电影的后期制作。

让他不太一样的主要是社群。灯笼的地下放映在 2015 和 2016 年达到最佳状态，后来灯笼经营遇到困难，且这种地下放映本身也有风险，郭晓东就转化形式，与各种艺术机构合作，流动作业，反而把电影人的交流规模做得更大。这也是“新亚洲影志”的来由，它表现为一系列的电影工作坊和交流，你可以理解为，让听得懂彼此说话的人有机会坐在一起。

2018 年，宋庄农贸市场的工作空间启用之后，这种“一线”的交流变得更多、规模更大。一直到被疫情打断之前，郭晓东持续邀请国外的电影人来开设工作坊。国内也有类似的自组织创作小组，比如“草场地工作站”，但彼此之间并无联系，对郭晓东来说，做这些事情无法盈利，它最大的功能是支持：对于试图从事艺术电影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资源支持；对于一起做事的伙伴来说，是对彼此价值的认可。

郭晓东说，所有这些事特别重复，从挂幕布到摆桌椅，再到交流里对自己各种想法的说明。不过他是一个喜欢重复的人，就连做电影的时候也是一样，重复元素的使用可以降低成本，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观念的重复、做法的重复，会体现在我们的艺术品位里”。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特别追求“我得跟别人不一样，我连跟自己都不能一样”。我们做的事情好像也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真正做起来，其实我们一直在重复循环里面。你问我动力是什么，其实就是惯性，这个惯性来自内心的一些原动力。自己更年轻的时候，当时想要去改变世界，只不过今天不再去讲这个话了，是吧？已经不是那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的能力其实也比较有限，我觉得能影响到周围的人就好。

我不想去做一个所谓的权威，然后那样的去影响别人。有一个法国人说我，“我看了你做的这些事情，我认为你是一个方法论者，你喜欢研究方法，通过方法去解决问题，就解决你现在的问题。你愿意改变方法和创造方法，迎难而上。”当我有一些经验以后，让这些做法能够有一些带动效应，然后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做事情，然后使得这个东西得到一定的传播。

有一些对电影的看法——都不是做法——慢慢的去传播，映后交流就是很好的传播方式。有没有不一样的解读，使得大家感觉耳目一新，这个都非常重要。这种小群体分享，大家在一起共度一段时光，然后能够去谈一些东西，所谓的方法论最后就落实到这些小的事情上面。

疫情的时候，“新亚洲影志”的交流被打断，再度恢复似乎也并不容易。但郭晓东还是



希望可以攒一些事情来做。这其中包括一次在新疆进行的工作坊，原计划是“兵分四路”，由一个资深电影人带着参与者进入新疆的某个区域，最后汇总成一组覆盖全疆的短片。但因为疫情封控，最后只有导演顾桃带领的阿勒泰线成行，其他导演都被阻滞在路上。

之所以选择在疫情时候的新疆做事，也来源于郭晓东平时组织大量交流时对创作者的观察。“我们团体里出现了好几个新疆作者，我们会觉得新疆是一个对未来而言非常有可能性的电影世界，它是未知的，对全世界来讲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去走走，去探索未知。”“纪录片我倒觉得不是新疆导演的创作强项，剧情片可能是，因为生活里的各种故事、各种状况，使得他们能够提炼这些东西，去做出很新鲜的表达。”

而女性电影人创作驻留活动“庐舍”，则是直接来源于疫情期间所有人被隔离的状况。为了继续工作，郭晓东发起了这种基于共同居住的创作方式。不过发起之后，他倒是一个不怎么出现的人。豆瓣上一个叫做《一场女性电影人的集体修炼与自我蜕变》的帖子记录了2020年这个活动的发端。6位女导演带着需要深化剪辑的作品入住野长城脚下的擦石匠161号院子，还有另外9位常驻的工作人员，和10位轮岗驻留的嘉宾，时间是20天。第二年，驻留的地点变成福建龙岩的培田古村。除了生活，大家最主要是讨论电影后期技术，尤其是剪辑。

“我做理工科，从来不相信感觉，我觉得事情都是计算出来的，你有把握，你得有所有的资源，然后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你才能做这个事儿，包括对外部大环境的把握。以前一定这么想。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得靠感觉。你想一想觉得十有八九能行，那就行。新疆也是，凭感觉，我觉得是能做的。”郭晓东说。

他能看到一些趋势，这或许是所谓“感觉”的来源。同样基于这种不充分的线索，他觉得现在做艺术电影，或许得跑到“外面”去看一看，建立更多跨国的交流。

“更早的时候，越南、印尼、柬埔寨的电影人都是在国外发展的，不是真的本土电影人，但现在，有的国家85后、90后冒头就比较明显，经济发展速度快的东南亚国家，85后艺术家已经很活跃。我们看到他们在大量的涌现，新世界在表达，就好像印尼电影新浪潮那样的状态。这些都和人有关。”

我问郭晓东做这么多事的钱来自哪里。他说，有一些是老本——他在2009到2014年之间没怎么做电影，而是做了一些商务贸易工作，当时中国大量购买知识产权，从中推动高端商务旅行和洽谈需求，而他就做了一段时间这些，这些钱让他花到现在。

值得解释的是为什么他一心投入艺术电影，真回到国内又罢手五年之久。“(因为)我回来以后，发现并没找到一个所谓的组织，或者是跟我比较像的做电影的人，在做电影这件事上我就没有太大的突破。”

从这个角度说，2014年郭晓东决定重新开始捡起电影这个“最初的爱”，就应该已经决定不再等待自己期望的“环境”出现，而是自己创造一个。

另外的资金平衡主要来自于活动的模式。比如宋庄农贸市场是集资在做，偶尔也会有朋友的赞助。工作坊自给自足，如果不考虑每个人投入的时间，那么收入和花费大抵相当。郭晓东强调了“不算时间”，这让我想起他淘打口CD的时候，那也是一项不能计算时间成本的事情。“很多人没看到，我们的时间投入成本太大了”——正因如此，这些活动注定都是非商业的。它成了生活本身。

与此同时，他说他和一起做事的伙伴都是“低社交”状态，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除了生活，就是在工作室和工作坊里，而当电影上映，和观众接触的时候是最有意思，“你会感觉现场有很多小气泡在飞，观众的表情和眼泪，就会变成那种小气泡。一部电影和观众见面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对我们来说，无论题材是什么，手法多前卫，都是正常的。”

在农贸市场，大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处理郭晓东称为“创意型电影”的产品，比如我们聊天那会儿在电影院上映的《火山之恋》，把影像素材加以重新整理在纪录片里混入虚构。这里面有剧情片，也有纪录片，有实验电影，图形电影，有后期的剪辑和调色，还有更早期的剧本开发。

那部《车失》，后来郭晓东给父亲看过，得到的回复是：“你应该早点给我看就好了。”他没问这句话的意思。他自己对此有个理解：也许父亲的意思是，早点给他看，还能有点新的意见可以给他。

我没有继续问他和父亲的相处模式。也没有问郭晓东和工作室来来往往成员的相处模式。很多青年电影人都叫他“郭老师”。我们聊完的时候，一旁的摄影机就关上了。

有意思的，我觉得打破了普通展销会那种很死板的感觉。

**Q: 没想到答案是一个营销案例.....**

A: 而且你想，同时能看见那么多外国人，还是很有趣的，是吧？

**Q: 那倒是，我会忍不住想他们为啥还在这儿。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一棵臭椿树的问题。我的院子有一棵，长得很快，房东说一定要除掉它，因为北方农村人不喜欢臭椿树。我觉得还挺好的，它正好长在我的门边。连根拔除不容易，得找工人，这事儿就一直搁置了。臭椿树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锯了依然会长出小芽，现在它有点发展得像一株灌木了。

**Q: 你要找谁来接力？**

A: 米娜就很好。她做这个餐厅。然后同时做纪录片，身份非常多元。她也经历了一个不同的时代。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Q: 最近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A: 去参加一个葡萄酒的活动，每人发一个小背包，是一个可以把红酒杯放在里面的袋子，你可以把那个东西背在身上，到每一个摊位前去尝酒。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挺有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Manon Boyer](#) on Unsplash

## 专栏

# 073 羊羊 为土地、空气和水打官司， 为人而坚持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环境公益诉讼律师是如何工作的。

从开始做环境诉讼的 2011 年算起,今年是羊羊这份工作的第 12 个年头,严格来说,应该刨去中间她去援藏的那年,不过援完她又回来了。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起步时间也差不多是 2011 年,12 年过去了,羊羊数了数,她在全国的同行不超过 10 个,而她经手的案子,一办就是 10 年。

一个案子走 10 年是什么感受?

“就是拉锯战。中间可能会涉及到各方利益,法院、当地政府、被告。不是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就会被解决。”羊羊说:“如果我现在新接一个案件的话,我不会去预测它(需要)的时间。”

有必要先说一下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羊羊作为诉讼代理人,代表一个公益机构提起诉讼,实际上她真正为之打官司的并不是人类,而是空气、土地和水源。一个官司打赢了,赔了钱,受益者也并不是污染地所在的居住者,换句话说,如果居民要求经济赔偿,他们必须自己请律师,向污染企业提起诉讼。每次到现场,羊羊都需要把这件事和当地居民解释清楚,即便如此,帮助她调查取证的人依然不在少数。地方的的确确是被毁了。

羊羊出生于 1982 年的甘肃。她原本是个商业律师。要说对法律有多热爱,最初也谈不上。但是羊羊似乎总是这样,一件事开始做了,她就有耐心让它持续到底。大学本来报的是金融,后来调剂到法律,法律毕业总得有个证明,就考了律师资格证。在她最初工作的西安,薪金过于微薄,于是她就跑去了北京。

在北京她遇到了一个同事,此人熟悉公益,并对羊羊说,你的性格适合去 NGO 工作。这是羊羊第一次听说 NGO 的存在,她的直接反应是“崇高和伟大”。这个词组在我们后

来的对话里被重复很多次,一次是她描述给自然之友投简历的时候,以及她接到邀约去工作的时候。当时这个“行业”几乎不存在,羊羊也从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当然,NGO 也还没遇到行业变化的外力。羊羊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那件前后持续 10 年之久的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案。

当年提议羊羊去 NGO 的那位同事,一直是一个商业律师。

羊羊还记得自己当时给“自然之友”总干事的书面回复。她说,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案很复杂,估计得需要两年。后来这位总干事离职,又来了新的总干事,人走了一波又一波,这个案子依然没有结束。

现在搜索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案你会看到它被称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里的里程碑案件。铬渣属于危险废物,遇水转化为一类剧毒品六价铬。多达 14 万吨的铬渣从 1989 年起持续堆放,到诉讼结案之时,已经累积堆放达 22 年,一墙之隔便是南盘江(珠江上游),没有任何防渗措施,工厂紧邻农业用地,几个村子的村民因为污染无法种植庄稼、罹患癌症。结案之后法院调解协议确认了赔偿和被告责任,即便如此,也并不代表污染会在人的生活里彻底消失。

“虽然案子结了,村民家的地还是那样。一户村民家紧挨污染源,没人去修复,被告和政府都不管。官司打赢了你觉得很厉害很高大上,但其实里面有太多的无奈了。”羊羊说。

如果去看羊羊代理的案件进展,复杂(她会说无奈)的情况基本上是以下三类:

1、官司打赢了,但是具体的环境、人的生活没有被着手改善;

2、官司得到支持得以推进,但是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机构推诿,就连当初举证人都会发生动机变化;

3、官司根本无法推进,比如说,连污染物的性质与否都无法达成共识。

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同时发生在羊羊现在手上的案子。案子地点是广西恭城海洋山保护区里的磨底塘村。1988 年,恭城瑶族自治县矿产公司开始在此地探矿采矿,1996 年在村子背后的山中修建选矿厂,进行铅锌矿的粗提炼。矿厂在主河道上游,因为暴雨溃坝,天然河道就成了尾砂库。河水带着污染长年累月冲刷下去,尾砂进入日常用水,留在土里,留在作物里,人和动物都得了“怪病”。

“自然之友”的介入时间是 2016 年 8 月,公益诉讼提起时间是 2017 年 3 月。2020 年 12 月,该案在广西桂林中院第一次开庭。直到现在,羊羊还在推进二审。复杂之处在于,最初支持羊羊调查取证的村民,有一些因为被施加压力,有些因为收到了私下赔偿,渐渐愿意站出来举证的人就越来越少。唯一坚持和羊羊一起工作的是磨底塘村大队的大队长。不过准确的说,羊羊是他等来的人,不然在之前 30 年的时间里,他也在上告、被拒和继续上告的循环里摩擦。不管是威胁还是利益收买,他都不曾妥协。挪走尾砂是他唯一想达到的目的。

危险废物,羊羊称为“危废”,每年雨季都会被冲刷得更厉害。羊羊为了解决源头问题,不得不去当地公安局刑事报案,还带上了之前做的现场检测报告。但是在报案做笔录的过程里,她就看到警察在不断给人打电话,2 个小时后笔录做完,对方决定叫上环保局一起去现场。至于报案之前的插曲,其实是羊羊先在北京打了举报电话,再转至当地环保局,结果环保局承诺调查但又临阵违约,羊羊坚持,但对方第二次承诺又第二次违约。羊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刑事报案了。

当时笔录全部都做完以后,5 点多说要去现场。本来他们说是第二天,但是我怕中间再一沟通,政府部门都知道就不让去了。其实那个地方挺远的,开车两个多小时,去的话可能天都黑了,但是我又怕明天不行了,我就跟警察说那个地方不远,很快,一个小时就到了。

当时正好赶上桂林发洪水,带警察看现场要从河里走,在石头上来回跳,又是晚上,我就直接掉水里去了。公安局政委反应很快,一把就把我从河里捞出来了,我全身湿透了,没办法,继续带着他们在河里走。政委可能都觉得不太好意思,说你们工作可真辛苦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没事,你只要能去可能就代表有一线希望。

后来我就一直等他们的反馈,但反馈一直没来,按理说公安局受理以后应该有反馈的,但我没有收到。我们还同时向二审法院申请现场勘察,法院同意了,来的那天,被告手上就拿了一份检测报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我们举报以后,环保局去委托一个检测机构取样做的。那份报告显示,(危险废物指标)全部都不超标。

他们在每个取样点上做了标记,用油漆刷了数字,就很清楚,所以我和同事一起去现场核对了一遍,发现取样的地方都不是尾砂,就是他们故意取了土、沙子和石头,肯定检测不出来它是危废。

所以这个案子搞了这么多年,一审、二审,连选矿尾砂到底是什么性质都一直搞不清楚,

当地政府一直在瞒报，（有）中央督查也瞒报……我觉得我们尽了特别大的努力，但是效果都不明显。面对这种阻力，我觉得可能我能想到的办法我全部都想了，最后的结果可能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

（当年）一开始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时候，想着说让当地环境要恢复，那个时候想的还是环境，因为还没有和当地人建立联系，没有产生感情，但是真正介入案子以后，可能更多发生联系的是当地村民。我觉得虽然是公益诉讼，但实际上能帮助到这些人的，我的关注点就发生了变化。一个地方去十几次，我和我接触的人都有很深的感情。

羊羊确实接触到了她做商业律师接触不到的人。当年抱着“高尚伟大”的感受进入NGO，工作至今她总结收获，觉得是自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感知力。但她发现，在和过往的同事朋友聊天的时候，这种感知是无法传递的。对方经常羡慕她可以去各种地方，走入大自然，也没有职场压力，至于羊羊工作内容里的现实，经常会被忽略甚至质疑。

我记得当时《隐入尘烟》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聊这个电影。因为我去过很多这种村子——其实这种人非常多的——但是和其他律师朋友聊起来，他们都不相信中国现在真的有这样的人在，他们觉得是电影杜撰出来的，中国没有这么惨，然后我就说服不了他们，他们都完全不相信。

我当时也挺震惊的，就是没有想到大家因为工作成长经历不一样，接触的事物不一样，可能会产生这么大的认知区别。

我去过的一些癌症村或者污染的村庄，比电影里面的环境要差多了，根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村民家客厅没有，沙发电视这些都没有，（是）水泥地，墙也是黑的，光线也不好，非常压抑，就几个小板凳。还有那种水源被污染的，（村民）买不起饮用水，纯净水也不贵，5块钱能买一大桶，但是他们也买不起，他们就只能喝被污染的水，就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跟朋友聊起来，他们就说，那他们出来打工啊。对，但是对当地人来说，那是非常难的，他们出不来，一个是可能没有文化，有些甚至不认识字，他们不敢离开那个地方。不像我们想的很简单，污染了就出来打工什么的，对他们来说，那是赖以生存的土地。

羊羊其实很少和人交流案子，她获得的支持可能来自其他的资深环境律师，也可能来自愿意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当地村民。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心大”的人，之前商业律师的训练让她在做公益诉讼的时候可以同时从原告和被告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过这只是一种思考站位，具体到人的接触上，那些和她一起抓起危险废弃物，让她住在家里的人，还是让她很受触动。毕竟她可以离开，而这些人无地可去。在那些一打就是很久很久的官司里，她觉得这是可以把事情做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她是被信任的。

羊羊喜欢西藏，也喜欢云南。喜欢植物花草和小动物。如果仅仅看她朋友圈，你得在一堆美好的生活摄影、藏滇风土里多加留意，才能看到她转发的公益帖子。里面大多数和她曾经办过、正在办的案子有关，但也有别的公益人受伤的故事，专访的故事。她给别人加油。

她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们聊到她出生地玉门，5岁那年离开，后来寒暑假还常常会去。如今玉门因为石油枯竭城市凋零，她还从兰州开车回去看过一趟童年住过的房子。

“从兰州到玉门有多远？”

“怎么也得有1000多公里。”

通话结束之后她发来消息兰州到玉门900公里。又补充下了火车坐一个多小时汽车，公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汽车在柏油公路上起起伏伏，有些坡度很大，有点像过山车，心脏会失重。

这很像她会在朋友圈写的东西。她确实极少谈起自己的工作。

#### Q: 你最近遇到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 家里有300多棵植物，每次浇水都要浇很久。但我很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照顾一下我的花花草草，发现它们每天的变化，这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里是很平静的，没有什么杂念。我觉得植物对我来说是一种疗愈，心真的可以放空。

另外一件对我来说有意思的事情是金缮。我自己很喜欢陶瓷，金缮材料就是淘宝上买的，我在Bilibili上自学的，它没有那么难，就是需要耐心。因为每一个步骤之后都要晾干，所以你修一个碗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样子。因为我喜欢瓷器，有磕碰我也很心痛，就从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在练习。

#### Q: 你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可能就是我的生存问题。咪咪打针吃药很贵，还要还房贷，我还在持续做公益的话，压力就是挺大的。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 Q: 你想找谁来接力？

A: 因为桂林这个案子认识的王医生，在广州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关心医疗系统内部问题。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四，2023.10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